

伪满洲国秘事

伪满洲国军简史

上

前　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伪满洲国军，决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伪军，也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傀儡军，它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由日本人军官团直接指挥中国士兵、由中日两国人混合编队的准关东军部队。

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州国”傀儡政权，距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作为殖民主义统治，它给东北的社会造成了深重灾难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民族对那段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围绕东北沦陷时期“满州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东北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那段历史及那段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也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去审视。

近些年来，在东北沦陷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史学工作者不畏艰难，宵旰茹苦，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出版了一批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为全面揭露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东北的社会和民众的生活，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在东北沦陷史的研究中，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领域的研究尚待深入，甚至还有一些空白。伪满州国军问题就是一个长期受到忽略无人涉足的领域。迄今尚无专门著作问世。

十几年前，我有幸参加过一个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科研项目，在编辑和整理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的档案工作中，搜集到了一些关于伪满州国军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通过在伪满州国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参加过伪满州国军军事活动的一些汉奸的供述，使我了解到了伪满州国军一些鲜为人知情况。近几年来，我又参阅了吉林档案馆和各地出版的一些资料，草成了《伪满州国军简史》这本书。通过撰写《伪满州国军简史》一书，我感到以下两个问题应特别值得重视：

一、关东军对伪满州国军的控制、利用和改造，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特点。在伪满十四年中，关东军对伪满州国军一直是采取着利用、控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东北的人力资源，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组建伪满州国军的目的。但日本帝国主义也清醒的意识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关东军在利用伪满州国军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造，从来

就没有放松过。为了达到利用的目的，关东军采用了很多控制和改造的办法，这些办法在世界殖民统治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和非常典型的。

控制的手段和办法首先表现在伪满州国军的统帅系统中。关东军在伪满州国军的首脑机关军事部和各军管区中，都设有“军事顾问部”。“军事顾问部”作为关东军的派出机构，依据伪满政权的有关法令，代表关东军直接指挥和操纵伪满州国军的一切活动。因此，在日伪统治时期，仅通过称谓是无法了解“顾问”的作用的。实际上“军事顾问部”是伪满州国军活动和运转的中枢，担任各级顾问的关东军现役军官，则是伪满州国军各级军事活动的策划者和决策者。在这种体制下，名义上是伪满州国军大元帅的溥仪和由中国人担当的军事部大臣，都成了被架空的“牌位”。伪满州国军的统帅系统，实际上是直接控制在关东军的手中。

这种控制和改造表现在军队的组织上，从1935年开始，伪满州国军中又进入了大量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有相当数量是从日本的退伍军人中招募，他们属于正式的伪满州国军人，有正式的伪满州国军军籍，是伪满州国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在伪满州国军中，又出现了一个与中国人“满系”相对应的“日系”系统。到1943年以后，伪满州国军的各特种兵部队、军事教育机构和军事通讯等重要部门中，“日系”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控制和改造表现在军官构成上，在日本投降前夕，除上将阶级中还没有日本人以外，各阶级中日本人都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其中，在伪满州国军的首脑机关军事部内，除大臣不是日本人以外，次长、司长、各重要科的上校（部分少将）科长、各科的中校首席参谋（相当于副科长），绝大多数都由“日系”担当。在少校阶级以下的中下级军官中，“日系”的人数甚至都超过了“满系”。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伪满州国军，决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伪军，也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傀儡军，它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由日本人军官团直接指挥中国士兵、由中日两国人混合编队的准关东军部队。由于伪满州国军中存在着大量日本人，因此，不仅在军事行动中日本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军队的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对整个伪满州国军施展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此外，到日伪统治的后期，伪满州国军的军政、军令以及军队教育等方面，都完全改用了日本的模式。这使伪满州国军从平时操练用的口令，到军队运转的形式，都地地道道的日本化了。这种殖民地军队日本化的倾向，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有意将日本文化和意识形态向殖民地的移植，是具有深层次意义上的文化侵略和对殖民地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征服。通过关东军对伪满州国军利用、控制和改造的手段，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已经超出了简单意义上的军事占领，它鲜明地反映出二十世纪帝国主义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征服殖民地活动的一些特点。

二、关于伪满汉奸问题。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最初拼凑起来的伪满州国军，其主体部

分是由当时驻在关外的东北军投敌部队所编成。其中，以东北军最大的作战单位整旅投敌的东北军，辽宁省有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旅、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旅，吉林省有延吉镇守使吉兴旅，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也有数个在旅长率领下整旅投敌的东北军部队。伪满初期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警备军以及后来的伪满部分军管区，都是在投敌东北军部队的基础上编成的。由于东北军部分高级将领在“九·一八”事变中率部投敌，以及他们在建立伪满州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东北沦陷史的研究中，汉奸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些年来，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也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但研究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的问题是研究的关注点，一直没有摆脱对这些人叛国投敌、助纣为虐个人行为的单纯谴责和声讨，缺少从当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中去探索和考察他们之所以沦为汉奸的多方面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战后法国学者，对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维希政府的研究，为我们开拓了研究视野。法国的历史学工作者认为，“奸人叛国”是各国沦陷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要注意将投敌者个人的本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放在一起加以考察，要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意识形态、国家组织、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中去理解和研究“奸人叛国”的成因和复杂性。法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给我们的研究工作以启示。本书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受全书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只是提出了问题，未能进一步地展开分析和论证，仅仅展示了

当时的历史原貌，意在为研究工作者多提供一些第一手的历史素材。

伪满州国军是伪满州国史的一个侧面，它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伪满州国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由于伪满州国史中的问题很多，头绪零乱，除前面述及到的关东军对它进行控制、改造和利用外，伪满州国军本身的问题也是十分繁杂的。例如，它与伪满宪兵、伪满铁路警护军、伪满保安局、哈尔滨特务机关等机构的关系；它在镇压东北抗日运动中所起到作用的评价；它在配合日军侵略中国华北、配合关东军对前苏联进行谋略活动所起的作用等等，都是很繁杂的问题。因此，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总有一种顾此失彼难以顾全的感觉。如何通过伪满州国军这一侧面，揭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一些特点，是我在撰写本书时一直思考的问题。由于本人学识尚浅，对一些问题的研究难免偏颇，对有些问题的表述也难以恰当得体。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教正。

目　　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伪满州国军，决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伪军，也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傀儡军，它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由日本人军官团直接指挥中国士兵、由中日两国人混合编队的准关东军部队。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于同年9月18日率70 000余东北军入关，



进驻平津、河北一带，致使北平的“国民政府”解体，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10 月 9 日，蒋介石自任“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并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改组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任张学良为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翌年5 月 1 日，为谋求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关外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东北”冠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旅”，编入国民革命军统一序列。



1931 年 9 月下旬，日军进兵沈海线，武力胁迫于芷山表明态度。于芷山在山城镇召开团营长会议，会上他悲观地说：“目前日军已经占领了奉天，各地维持会已经成立，中央命令我们不准抵抗，日军又陈兵压迫，我们怎么办?”席间有人主张打，于说：“日本如此强大，我们能打过吗? 打了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张学良已经默认，不准打，不准走，必要时尽可虚与委蛇，保存实力，即使是穿上日本军衣，中央也不会怀疑我们。”他为投敌定下了调子。



奉天警备司令部于1932年3月开始筹建。它以原东边道镇守使署人员为基础，又在奉天市内网罗了一批利欲熏心的败类，至4月份司令部正式成立。于芷山任司令，曹秉森任参谋长，日本人堀内一雄化名满良任司令部部附，关东军派来菅野兼吾为顾问。奉天警备军的部队，以于芷山在东边道拼凑的伪军为骨干，合并了在营口一带活动的王殿忠、李寿山等匪军，编成相当于10个旅的兵力，计20 000人。



日军进城后，迅即占领了省政府各要塞部门，旋即熙洽撕去了伪装，组建了伪政权，并以伪政权的名义发令改编吉林省境的东北军部队。与此同时，久怀野心的原东北



军师长于琛澂被起用为“吉林剿匪军”总司令，命其收编投降军队和收罗旧部。熙洽还派吉林军官教练处总办齐知政，在关东军的配合下收编了原军官教练处的部分人员和千余名警察及50余名宪兵，组织了吉林警备司令部。



吉兴投敌后，使素有复辟野心的熙洽如遇知音。不久，他把吉兴邀去省城，从两人都是满清后裔的角度商量建立伪满州国和推举溥仪的活动。吉兴听到要推溥仪当皇帝，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同为爱新觉罗子孙，他当皇帝我岂能不同意?”但他感到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心中没底，于是向熙洽提出7个重大问题，即无兵无钱怎么办?国际上不承认怎么办?张学良回来怎么办?与东北民心相悖怎么办?人民反对怎么办?国防怎么办?社会贤达不拥护溥仪怎么办?熙洽很干脆地向他露底：有日本皇军保护，一切好办。并说：“东北富庶，



于琛澂托辞说：“我已经退役多年，懒散惯了，又有高血压症，实无精力再去南征北战，恐负重托，感谢您对我的栽培，这一点请熙长官多加谅解。”熙洽深谙想上贼船的汉奸欲做还休的心理，因此先劝勉道：“险舟，您太客气了。您正壮年，精力充沛，更有多年统帅指挥军队的经验。我们相交多年，您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您的号召力很大，只要把您的旧部下招集起来，扩大军队，日本人答应，用钱有钱，用枪有枪，一切都有我来负责。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又何乐而不为呢？”尔后，熙洽又威胁道：“你要知道，少帅始终没忘掉你背叛他们父子之仇啊！有少帅就不会有你于琛澂啊！你如果不按日本人意图去作，日本人能够轻易放过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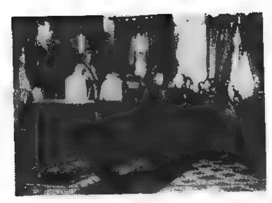


张海鹏已65岁，原系绿林出身，曾随张作霖南征北战多载，自以为功莫大焉，常以元老自居。但从民国以后，张作霖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由督军而安国军大元帅，堪称功名震世，可张海鹏却屈居于洮辽镇守使之位，心中常愤懑不平。1928年张作霖和黑省督军吴俊升殒命于皇姑屯，张海鹏自度黑省遗缺非他莫属，不料张学良竟委任万福麟为黑省督办，对此，张海鹏衔恨愈深。张海鹏这种贪图名利的小人心理早已为日人所知悉，事变发生后，关东军立刻派人潜往洮辽镇守使署所在地洮南晤见张海鹏，许以黑省督办及武器粮秣等条件，诱其投降。

目　录



4月1日凌晨，马占山以赴东荒整饬军纪为由，带手枪队300余人，携巨额军费，乘汽车自北门拔关而出，直趋黑河。为防日军追击，途经拜泉时，马占山电告林义秀："占山兹以拜泉视察，防军有哗变之消息，为抚慰防务起见，必须亲往一行，迟三、二日，由哈尔滨绕道回省，临行匆促，未及亲辞，殊甚歉仄，两日之内，即可旋省。所有军民两政，暂由参谋长张文铸、秘书长董继武分别代行。至省城秩序，着骑兵第一旅旅长程志远负责维持。"日人因此未加怀疑，待其发觉事情有变后，马占山已于4月7日抵达黑河，宣布重新抗日了。



9月26日，关东军派参谋吉村、大矢等4人潜至洮南，经河野正直居中斡旋，以金票26万元、大



盖枪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为诱饵，对张海鹏进行诱降。张海鹏本是爱财慕权之徒，加之虎视眈眈的日军又近在咫尺，在贪生怕死，维护一己私利的心理驱使下，张海鹏遂以“虚与委蛇”为托辞，接受了日军的条件。得到关东军的援助后，张海鹏即以此为资本，大行扩编军队，同时又自封为“边防保安司令”，以求名正言顺。张学良为拉回张海鹏，于10月初密令他充任蒙边督办，李盛唐为少将参谋长。

第二节 洮辽军北犯黑龙江省 …………………… (110)



张海鹏因有日军撑腰做后盾，气冲斗牛，决心与黑省军队一决雌雄，督军之位俨然已在掌中矣。但在动员会议上，多数支队长持有异议，认为此举凶多吉少，因而颇有微辞。不料张海鹏以得罪不起关东军为由，拍案怒骂，并霸气十足地高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张的死党李盛唐也从旁愤然附和：“我们受张家父子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



1932年3月，伪满州国在日寇和群奸的喧嚣中出笼，清朝逊帝溥仪就任“执政”。张海鹏因早在张勋复辟中即力主“保皇”，甚为溥仪倚重。溥仪来东北不久，就派肃亲王之子宪原和宪基持“密旨”赴洮南，“钦命”张海鹏在洮南一带整军练兵。张海鹏素以“保皇”自诩，今有逊帝亲诣以教，未免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以图藉皇恩之风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溥仪粉墨登场后，张海鹏为尽“臣子”之孝，遂奉命派伪洮辽军第一、第四支队调至长春附近，以行拱卫。



2月21日，日军自中路首先向南岭发动进攻。守军董福亭旅汤玉山团稍作抵抗即行撤退，致使南岭失守。翌日，日军旋又向北票进击。董旅主力经不住日军坦克的冲击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迅即弃守北票撤守朝阳。24日晚，日军第八师团主力第四旅团及第十一旅团一齐到达朝阳以东、以北阵地前，次

日即向朝阳攻击前进。董福亭旅组织兵力殊死抵抗，但终未能挽回颓势，当天朝阳即告失守。尔后，日军第八师团稍行休整，于3月1日发起总攻。关东军侵占热河后，立即着手组织伪政权。5月，“热河省警备军”正式成立。张海鹏因忠心耿耿地顺从于日寇，同时又有实力，自然而然地就当上了警备军司令兼热河省省长。伪热河省警备军以原洮辽警备军为基干，杂以汤玉麟手下的降兵和其他伪军，共编成了4个混成旅。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获此消息后，他们立即动身前往沈阳，跑到已从旅顺迁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供给武器弹药，帮助组建一支蒙古部队。他们的要求正中关东军下怀，因为此时仅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的关东军正忙于抢占东北地区各战略要地，尚无暇顾及蒙旗方面；帮助建立一支内蒙族人组成的伪军，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招降纳叛

第一章　辽宁军政的混乱与辽宁警备军的编成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辽宁东北军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于同年9月18日率70 000余东北军入关，进驻平津、河北一带，致使北平的“国民政府”解体，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10月9日，蒋介石自任“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并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改组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任张学良为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翌年5月1日，为谋求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关外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东北”冠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旅”，编入国民革命军统一序列。

辽宁是近代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辽宁设立了东北政务委员会，由张学良任主席，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主席，掌管4省政务。军事上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张学良任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分驻辽宁、吉林、黑龙江，统辖东北的军队。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于同年9月18日率70 000余东北军入关，进驻平津、河北一带，致使北平的“国民政府”解体，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10月9日，蒋介石自任“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并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改组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任张学良为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翌年5月1日，为谋求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关外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东北”冠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旅”，编入国民革命军统一序列。

此次改编，东北军主力部队共编成独立旅34个，其中步兵旅25个，骑兵旅6个，炮兵旅3个。在34个独立旅中，辽宁部分占21个，其中步兵旅为14个，骑兵旅4个，炮兵旅3个。

“九·一八”事变之际，辽宁东北军分关内、关外两部分驻防，连同省防军在内，共28个旅（其中包括1个两团制的师）。其中国防旅23个，没参加改编的正规旅2个，屯垦军旅1个，省防军（旅单位）2个。其具体驻防情况如下：关内部分18个旅：

部队番号	旅长姓名	关内驻地	原驻地	备　注
陆军独立第八旅	丁喜春	天津杨柳青	打虎山	
陆军独立第十旅	刘翼飞	张家口	兴城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一旅	董英斌	宣化	前所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三旅	李振唐	望都至石家庄之间	绥中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四旅	陈贯群	河北高阳	山海关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五旅	姚东藩	塘沽、大沽、军粮城、天津	高桥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六旅	缪澄流	北平一带	新立屯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七旅	黄师岳		昌图	3个团
陆军独立第十八旅	杜继武	保定	大凌河	3个团
独立骑兵第四旅	郭希鹏	沧州	通辽	
独立骑兵第五旅	李福和	河北抚宁		
独立骑兵第六旅	白凤翔	河北深泽、安国	山海关	
独立炮兵第六旅	王和华	天津静海	北镇、锦县	北镇、锦县留1个团
独立炮兵第七旅	乔　方	河南濮阳	山海关、北镇	
新编第六旅	刘桂堂	山西大同		5 000千余人

部队番号	旅长姓名	关内驻地	原驻地	备　注
新编骑兵第一师	师长 张诚德			2个团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三旅	于学忠（代）		山海关	旧番号骑兵3个团
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七旅	刘乃昌	石家庄	山海关	旧番号骑兵3个团

关外部分10个旅（包括省防军2个旅，屯垦军1个旅）：

部队番号	旅长姓名	驻　地	备　注
陆军独立第七旅	王以哲	沈阳	“九·一八”事变后，损失千余人，大部分撤到关内，小部被于芷山和伪满靖安军收编，编入伪满军。
陆军独立第九旅	何柱国	山海关	“九·一八”事变后，撤入关内。
陆军独立第十二旅	张廷枢	锦州	锦州沦陷后撤入关内。
陆军独立第十九旅	孙德荃	兴城	先驻在兴城，“九·一八”事变后，经山海关撤到关内。
陆军独立第二十旅	常经武	洮南	“九·一八”事变后，调到锦州，后经山海关撤到关内。

部队番号	旅长姓名	驻　地	备　注
独立骑兵第三旅	张树森	通辽	“九·一八”事变后，先撤到热河，后撤入关内。
独立骑兵第八旅	刘翰东	彰武、阜新	“九·一八”事变后，经山海关撤入关内。
兴安屯垦军	苑崇占	洮南一带	步兵2个团、炮兵1个团，“九·一八”事变后撤到黑龙江，参加江桥抗战，后部分投敌。
东边镇守使署	于芷山	山城镇	辽宁省步兵、骑兵各1个团。
洮辽镇守使署	张海鹏	洮南一带	辽宁省骑兵4个团。

上述入关部队中，辽宁的独立旅是东北军的精华，人员和武器装备最为充实。步兵每旅为3个团，每团3 500人。旅部属下都设有重迫击炮、通讯、卫队、骑兵4个大连，士兵一律装备德国造“七九”式步枪，卫队连全部持手提式轻机枪，每旅人数在万人以上。当时这类装备的部队，东北军总共有14个旅，几乎全为辽宁省所囊括，大部分驻在关内参加中原大战。

此外，东北军在沈阳还设有兵工厂、航空队、战车队等机械化部队，在东山嘴子（东陵）还设有陆军讲武堂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驻屯沈阳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攻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在沈

阳待命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立即发布作战命令，命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和第五大队攻击北大营，命步兵二十九联队进攻沈阳城，并要第二师团增援。当时，日本关东军仅有 1 个师团、6 个独立守备大队、1 个重炮兵队及 1 个宪兵队，总人数10 400人。关东军分别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各重要城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根据事先拟定好的基本作战大纲，命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迅速向沈阳集结，以攻击当地中国守军为目标首先控制东北四省的中枢沈阳城。

此时东北军驻守沈阳的陆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部，共有 3 个团，其中六百二十团的 1 个营驻守皇姑屯，六百二十一团的 3 个连驻东大营，其余均驻北大营。“九·一八”事变之夜，该旅首先受到日军的攻击。东北政权和第七旅的官兵对事变准备不足，代理辽宁省军事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方策，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旨意，指示东北守军避免冲突，一切忍让，勿逞一时之愤，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听候“国防”处理。据此，荣臻当即命令北大营第七旅放弃抵抗，听任事态发展。结果，受到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虽然自发地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军令难违，在损失了近千人之后，被迫撤出北大营。尔后部队沿沈海铁路先撤到山城镇，后奉张学良的命令撤入关内，进入清河镇。

沈阳沦陷以后，张学良为应急措施，通电将东北军政指挥中心迁往锦州，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锦州为辽西重镇，既是通

向关内的咽喉要地，又为关门的屏障。驻防锦州的部队是张廷枢的陆军独立十二旅。两署成立后，又将驻洮南的陆军独立第二十旅调到辽西。张学良一度曾准备将关外的东北军主力编成2个军（以于学忠部为第一军，王树常部为第二军），开赴关外，在大凌河筑起防线，阻止日军进入辽西，必要时在锦凌一带与日军决战。1932年1月，日军调集3个师团40 000余人，从三面包围锦州。东北军由于受不抵抗政策的影响，缺乏与日军决战的信心，从1931年12月19日起各部队开始向山海关方向撤退。驻在兴城的孙德荃陆军独立第十九旅，首先撤入关内。到1932年1月3日止，除第十九旅外，辽宁省境的东北军，独立第十二旅、二十旅、炮兵第八旅等部队近20 000余人，全部撤到山海关以南，进驻滦东的迁安、昌黎一带。与此同时，独立炮兵第三旅张树森部也撤到热河一带，准备退入关内。1932年1月3日，关东军几乎没遇到任何的抵抗，即占领了锦州。

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为执行攻占热河的既定方针，首先采取了切断东北与关内联系的步骤，从1932年10月起，连续三次制造山海关事件，出兵占领了山海关，将东北军何柱国的陆军独立第九旅山海关以东部队，压迫到了关内。至此，辽宁省境内的东北军正规部队，全部退入关内，仅剩下省防军于芷山和张海鹏两部，及兴安屯垦军1个旅。

第二节　于芷山投敌



1931年9月下旬，日军进兵沈海线，武力胁迫于芷山表明态度。于芷山在山城镇召开团营长会议，会上他悲观地说："目前日军已经占领了奉天，各地维持会已经成立，中央命令我们不准抵抗，日军又陈兵压迫，我们怎么办?"席间有人主张打，于说："日本如此强大，我们能打过吗？打了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张学良已经默认，不准打，不准走，必要时尽可虚与委蛇，保存实力，即使是穿上日本军衣，中央也不会怀疑我们。"他为投敌定下了调子。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打破了东北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张学良政权的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东北地区出现了政局混乱的状态。国难当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东北许多握有实权的人物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或激于民族大义，奋起抗日救国，或迫于客观形势，屈膝投降。辽宁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就是后者的典型之一。



伪满军上将于芷山

第一章　辽宁军政的混乱与辽宁警备军的编成

于芷山，号澜波，清光绪初年生，奉天省台安县黄沙坨子粘鱼泡子村人，与伪满大汉奸张景惠同乡。于的青年时代，恰值东北地区战乱频发，匪贼猖獗，“烽燧所到，村舍为墟”，“纵横千里，几同赤地”，一幅干戈满目，生灵涂炭的凄惨景象。生长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于芷山，也生性粗野，好与人争强斗狠。他 17 岁就投奔到当时辽中一带著名的土匪头子杜立三麾下，不久即崭露头角，成为该匪帮的小头目之一。

1907 年前后，奉天省境几股大的匪帮均被清廷收编，仅余杜立三匪帮拒绝招抚，继续在辽中一带行匪。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遂令被收编的张作霖前去剿除，张假以招安为名，诱杀了杜立三等大小头目 10 余名匪首，消灭了杜立三匪帮。于芷山在这次讨剿中幸免一死，后被张作霖收为马弁，开始为军阀混战效力。在以后的几年中，于芷山步步青云，先后当过哨长、连长、河防营长、护路团长，1922 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后，于任奉军第五旅旅长，归师长张作相直接指挥。1924 年直奉两军再度交恶，于芷山部被编成奉天骑兵第八旅，随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主力军第三军先驻秦皇岛，后移师京奉铁路沿线。1925 年张作霖将鼎盛时期的奉军统编为 20 个师 10 个旅，于芷山被任命为陆军骑兵第八旅旅长。同年，郭松龄倒戈兵败后，于芷山出任第八师师长。

1926 年北伐军进入闽、鄂、赣三省，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为联合对抗北伐军，编成了“安国军”，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在北京组成军政府，并进兵南京、上海，阻止北伐。这时，于芷山在张作相指挥

的第五方面军团任三十军军长，率部在河南一带作战。不久，阎锡山转向北伐军，于芷山部又转到京绥、京汉铁路沿线与晋军作战。1928 年日本出兵济南，干涉国民党二次北伐，于芷山率部撤至宣化、张家口一带，不久即随张作霖撤回东北。

1928 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将东北军缩编，取消军、师制，采用群旅制，将军队改为国防和省防两部分。于芷山的三十军被改编成旅，于芷山交出军队，去东边道出任镇守使，所率部队改为省防军。从此，为张氏父子效命二十余年的于芷山就坐镇沈海路与吉海路交叉点上的山城镇，一边经营生意，一边负责管辖辽东一带 22 个县的治安。

“九・一八”事变时，于芷山带领的辽宁省防军为步兵 3 个团，团长姜全我、廖弼臣、田德胜，炮兵 1 个团，团长曹秉森，卫队 1 个营，营长赫慕侠，总兵力7 000人，分驻在通化、凤城、西丰、西安（辽源）、新宾、桓仁等地。由于部队驻地偏僻，驻防分散，事变之际部队大都保存完好，仅驻在凤城县的 1 个营，受到日本铁道守备队的攻击，450 名官兵在团长姜全我被俘后，随其投敌。

日军在占领满铁沿线的大小城镇后，辽宁省的政局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日军在占领地扶持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发号施令，拼凑地方伪政权；另一方面，流亡到锦州的辽宁省政府，也在积极活动，严令各地不准承认伪组织。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张学良政权已经基本被摧毁，流亡政府已经无力控制辽宁的局面，日寇的势力一时还仅限于满铁沿线的城镇，广大的农村和远离铁路的

偏僻城镇，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九·一八"事变初期，于芷山部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由于东边道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关东军兵力不足，没有马上对于芷山部用兵，而是确定了对于芷山采取诱降的方针，并且在策划扶植傀儡政权时，也把于芷山列为被收买的东北要人之一[①]。这时的于芷山心态也十分复杂，他清楚这次事变非比寻常，日军迟早要进兵东边道，接触在所难免。他见东北军主力陆续撤入关内，也曾请示张学良要求撤入关内，但由于张学良错误估计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形势，命他"不准抵抗，不准走，预备将来恢复"。这时关东军加紧了对他的策反工作，派大矢进计、河本大作等人，不断到他的营帐游说，已投敌的臧式毅、张景惠、张海鹏等人，也不断给他去信，施加压力。于芷山鉴于形势不明朗，不知事态如何发展，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尽量对各方面敷衍，一面与日寇勾结，谋求暂缓向东边道进兵，一面与张学良保持联系，求得张的理解。

于芷山这种矛盾的心态，支配了他公开降敌前的主要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首当其冲被关东军袭击的王以哲第七旅，在历尽艰难退到山城镇时，于芷山惟恐引火烧身，惹来日军攻击，不但拒不收留，反而军阀本性毕露，在王旅危难之际趁火打劫，收缴了王旅的大部分武器，扩充个人势力。当得知他的防区有人从事抗日活动时，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进行镇压，甚至连从北大营逃出的东北军士兵也不放过。

1931 年 9 月下旬，日军进兵沈海线，武力胁迫于芷山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于芷山在山城镇召开了团营长



会议，公开表明了他投降的心迹。会上他悲观地说："目前日军已经占领了奉天，各地维持会已经成立，中央命令我们不准抵抗，日军又陈兵压迫，我们怎么办?"[2]席间有人主张打，于说："日本如此强大，我们能打过吗？打了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张学良已经默认，不准打，不准走，必要时尽可虚与委蛇，保存实力，即使是穿上日本军衣，中央也不会怀疑我们。"他为投敌定下了调子。在于芷山的唆使下，这一旅东北军军官，除极少数拒绝投敌外，大部都表明了投敌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1931 年 10 月 16 日，于芷山假借保全东边道 20 余县人民生命财产之名，打出了"东边道保安司令部"的旗号，自任司令，宣布独立，并与日寇相约"彼此不相侵扰"[3]，迈出了他公开投敌的第一步。10 月下旬，于芷山向关东军公开了投降的态度，关东军随即向他提供经费，命令他担任东边道方面的警备[4]。至此，于芷山开始了公开的汉奸生涯。

于芷山投敌后，部下步兵 2 个团、骑兵 1 个团、卫队 1 个营一同随他投敌。此后，在关东军的扶植下，步兵团扩充为旅，原团长廖弼臣、田德胜升任旅长，骑兵 1 个团扩充为 3 个团，卫队营扩充为卫队团，兵员总数一时增至 15 000人。东边道这支伪军的形成，于芷山的组织和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投敌最大的一股。以后关东军以这股投敌军队为骨干，编成了"奉天警备军"，配合关东军占领辽宁全境和镇压抗日运动，给这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第三节 奉天警备军和“南满”讨伐



奉天警备司令部于1932年3月开始筹建。它以原东边道镇守使署人员为基础，又在奉天市内网罗了一批利欲熏心的败类，至4月份司令部正式成立。于芷山任司令，曹秉森任参谋长，日本人堀内一雄化名满良任司令部部附，关东军派来营野兼吾为顾问。奉天警备军的部队，以于芷山在东边道拼凑的伪军为骨干，合并了在营口一带活动的王殿忠、李寿山等匪军，编成相当于10个旅的兵力，计20 000人。

1932年3月，伪满州国成立。在策划和组织这个所谓新政权的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尽贪婪欺诈之能事，表面宣称“为住居满蒙之三千万民众”，但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与中国本土绝缘，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由日本控制的殖民地政权。在对殖民地的统治上，日本帝国主义深知仅靠武力扶植起的傀儡政权，是非常不稳固的。因而，关东军在如何对待伪满政权这个问题上，除加紧控制之外，还竭力推行其一贯的“以华制华”政策，处处利用汉奸粉饰门面，以掩人耳目。特别是在令日寇头痛的治安问题上，



关东军更希望利用降敌军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政策服务。这样，在伪满州国成立的初期，各地被关东军收编的军队，被统编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兴安警备军和伪中央直辖部队，统归伪满中央军政部；各地降日的重要人物，关东军称其为“有力者”，多被委任为司令官。

奉天警备司令部于1932年3月开始筹建。它以原东边道镇守使署人员为基础，又在奉天市内网罗了一批利欲熏心的败类，至4月份司令部正式成立。于芷山任司令，曹秉森任参谋长，日本人堀内一雄（化名满良）任司令部部附，关东军派来营野兼吾为顾问。奉天警备军的部队，以于芷山在东边道拼凑的伪军为骨干，合并了在营口一带活动的王殿忠、李寿山等匪军，编成相当于10个旅的兵力，计20 000人。其编制情况详见下表：

<table>
<tr><th>区　别</th><th>旅长姓名</th><th colspan="2">部　队</th><th>兵　力</th><th>驻　地</th></tr>
<tr><td rowspan="2">司令部直辖</td><td rowspan="2"></td><td colspan="2">司令部
卫队连
兵器修理所
无线电信班
汽车班
督察队
军乐队
陆军监狱
后方医院</td><td>678人</td><td>奉天</td></tr>
<tr><td>第一教导队</td><td>步兵第一团
骑兵第一团
炮兵第一连
通信第一连
军官候补生连</td><td>2 718人</td><td>奉天</td></tr>
</table>

区别	旅长姓名	部队	兵力	驻地
鸭江地区	廖弼臣	步兵第一团 骑兵连 炮兵连 通信连	2 467 人	凤城
鸭江地区	独立步兵团	第一营		
安奉地区 混成第二旅	赫慕侠	步兵第二团 骑兵连 炮兵连 通信连	2104 人	通化
辽东地区 混成第三旅	王殿忠	步兵第三团 骑兵连 炮兵连 通信连	2467 人	营口
辽东地区 独立步兵团		第二营		
辽西地区 混成第四旅	傅布彦	步兵第四团 骑兵第四团 炮兵连 通信连	1755 人	黑山
中央地区 混成第五旅	于芷山（兼）	步兵第五团 骑兵第五团 通信连	1291 人	奉天
沈海地区 混成第六旅	董国华	步兵第六团 骑兵第六团 炮兵连 通信连	2234 人	山城镇
沈海地区 独立步兵团		第三营		
长抚地区 混成第七旅	李寿山	步兵第七团 骑兵团 炮兵连 通信连	2104 人	临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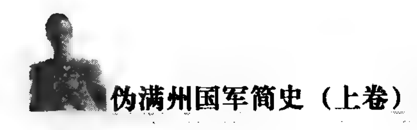
区	别	旅长姓名	部　　队	兵　力	驻　地
辽源地区	骑兵第一旅	彭金山	骑兵第七团 骑兵第八团 骑兵机关枪连	1098 人	辽源
洮南地区	骑兵第二旅	王之安	骑兵第九团 骑兵第十团 骑兵第十一团 骑兵机关枪连	1625 人	洮南
				20541 人	

随着伪满州国的建立和伪军组织的日渐严密，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更加迅猛。自“九·一八”事变国难后，东北人民愤于日寇的淫威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满怀“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的爱国信念，“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5]在日伪的统治中心辽宁省，以“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爱国官兵自发地起而抵抗为开端，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迅速波及全省，至 1932 年 4 月，辽宁省境的抗日义勇军总数已达 30 余万人，其中大部分活动于辽南、辽东一带。这些抗日义勇军以驱逐日寇、惩处汉奸、恢复国土为共同目的，互相配合，遥相呼应，频频出击，严重威胁着日伪的反动统治。奉天警备军成立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将其投人使用，专力镇压辽宁境内特别是辽东、辽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以巩固伪满州国的基础。

辽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主要活动在奉天、盖平之间

的铁路沿线及奉天至沟帮子之间。这一地区南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旅大，北接伪满统治的中心城市沈阳，西扼通往辽西走廊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从绿林出身的张海天、项青山在辽南首举义旗进行抗日后，这里的抗日运动纷纷涌现，他们经常与驻守辽南的日军及伪军王殿忠部展开战斗，给敌以很大杀伤。1932 年 3 月，张海天、项青山部与活动于辽阳一带的义勇军吴宝丰、王全一等部实现了联合，继而又将辽南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团结在一起，总兵力达到20 000人以上，统由张学良的旧部李纯华指挥。这样，在以海城为中心，北起辽阳，西至盘山，南达营口的数百里范围内，除铁路沿线的城镇外，广大农村皆为抗日义勇军所控制。

辽东地区是日伪军确保“治安”的重点地区，这一地区西南临黄海，东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加之内有长白山及其余脉纵横全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向为东北国防要地。特别是因靠近安（丹东）奉（沈阳）铁路，地理位置更加重要。“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军政当局即在此地驻有重兵，统归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节制。于芷山降日后，辽东各地爱国志士慨于国难当头，纷纷举义，辽东各地的抵抗运动顿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李子荣、刘景文等部义勇军密切协作，纵横驰骋于庄河、安（丹）东、凤城等县几百里的宽广地面上，经常出奇制胜，造成一种强大的抗日声势，使这里成了著名的抗日区。在辽东与三角地带抗日义勇军并驾齐驱的，是唐聚五等人在东边道地区组织的“辽



东民众救国军”。唐聚五原为于芷山部下的1个营长，于芷山投敌后一度充任团长。1932年3月，伪满州国成立后，他痛于东北大好河山沦陷，遂联合各地方公安局长和公安大队长一起起义，于4月21日在桓仁誓师抗日，总合各种抗日武装，组成了“辽宁民众自卫军”。自卫军初分19路，至8月扩至37路，并按地区划分为7个方面军，总人数达10万人，遍布东边道14个县，气势如虹。辽东地区抗日义勇军的迅猛发展，不仅使日伪在辽东的统治难以确立，而且直接威胁着抚顺、沈阳等中心城市。日本关东军为实现其独占东北的侵略计划，从1932年9月起，开始调兵遣将，决定实施“南满讨伐”。这次讨伐首先是从东边道地区开始的。

日本关东军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进兵东边道的：一、辽宁民众自卫军系辽宁省境内力量最强的一支抗日义勇军，且其总司令唐聚五原系伪满军官，又为东北军旧部，其举旗反正可谓影响甚大，日本人认为，如能将其尽速平定，可收“杀一儆百”之效。二、东边道地区朝鲜族居民较多，其参加抗日活动者不在少数，如不尽快控制此地区，抗日浪潮恐有涉及日本殖民地朝鲜之虞。三、东边道北接吉林，肃清东边道的抗日武装，可阻断“南满”与“北满”义勇军的相互联系，便于以后分别讨伐，各个击破。

1932年10月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向关东军各师团长及奉天警备司令部发布了有关讨伐东边道的命令，并着手部署兵力。关东军这次用兵东边道，可谓孤注一掷，共调集了3个旅团及奉天警备军的大部分伪军，计有：日军

第十四师团骑兵第一旅团，旅团长高波祐治少将。除旅团本部外，还配备第二师团步兵第三十联队的1个大队、第十师团步兵1个大队、临时派遣第一战车队、骑兵第八联、野炮兵第十联队的1个大队、第十师团的1个工兵小队，及奉天警备军的寥弼臣团。

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茂林谦之少将。除旅团本部外，配属部队有日军第二师团的1个步兵大队、野炮兵第二联队的1个大队、第八联队的1个中队、第八师团的1个工兵中队、伪军有伪满军政部直辖的靖安军、奉天警备军的姜全我团。

混成第十四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除旅团本部4个步兵联队、1个骑兵中队、1个野炮大队外，配属部队有第二师团骑兵一部、临时派遣第一战车队的1个小队、伪军奉天警备军的董国华团。

此外，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令第二、第八、第十师团负责保护沈海、吉海两铁路以及沿线的飞机场；独立守备队警戒安奉铁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派兵随同各讨伐部队行动；自朝鲜越江的日军分别在鸭绿江沿岸及各县堵截自卫军，防止越江东撤；飞行队主力协助讨伐部队侦察作战等；这次关东军总共动员兵力在30 000人以上。

1932年10月上旬，讨伐东边道的日伪军分别部署完毕，关东军骑兵第一旅团部署在海龙、朝阳镇一带；骑兵第四旅团部署在安东、本溪湖及抚顺一带；混成第十四旅团部署在额门、营盘、山城镇一带；日军第六师团也从朝鲜越过鸭绿江开到临江一线。同时，关东军司



令部又命令伪满军奉天警备军的姜全我、董国华、廖弼臣部及伪靖安军，向各指定的地点集中，接受各地日军的旅团长统一指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奉天警备军的大部分投敌军队都参加了讨伐，没参加讨伐的部队关东军命令驻防原地，负责警戒当地治安。10 月 11 日，日伪军开始按计划行动。

在讨伐中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任务主要是协助骑兵第一、第四旅团行动。在这次讨伐中，日军采用了“分散配置”的办法，即把军队化整为零。混成第十四旅团编成了骑兵队、第一警备队、第二警备队、第三警备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伪满军的董国华部队被称为董国华支队。第一警备队配置在马连墩、永陵街、新宾、平顶山之间地区；第二警备队在南山城子、向阳镇之间地区；第三警备队在英歌布、田麻采沟、东江甸子、通化之间地区；董国华支队在四道沟、新宾之间地区。这些部队相互构成警备网，采取拉网式的方法，搜捕讨伐区域的抗日武装人员。骑兵队和游击队作为讨伐的机动部队，随时出动支援各警备队作战，并经常配合各警备队共同行动。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作战意图是将这一带的抗日武装压迫到通化、桓仁之间，尔后，与日军的其他两个骑兵旅团相互配合，最后将抗日军全部消灭。10 月 11 日，日军第一、第三警备队、第二游击队和伪满军董国华支队从南札木沿上夹河、永陵一线直逼新宾。当时驻守新宾地区的抗日自卫军第一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迎敌，在日伪军的联合攻击下，各部首尾难顾，最后因力量悬殊，自卫军防线被攻破。第一

方面军总指挥李春润为防止日寇在新宾县城杀戮，率部向桓仁一带撤退，但沿途多次与日伪军发生遭遇战，不久第一方面军即告解体。13日，日伪军占领新宾县。以后，日军主力继续向通化攻击，伪满军董国华支队被置于新宾及四道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

日军骑兵第一旅团从集结地海龙、朝阳镇出发后，兵分三路向辉南和柳河一线围剿，其中一路组成"濛江支队"，沿辉南至濛江一线行动；一路沿拌哨、孤山子、小城子一线向通化进逼；旅团主力则直奔柳河、三源浦，向通化进攻。驻守在该地区的抗日自卫军是第二方面军孙岫岩部和第三方面军王凤阁部。11日，讨伐的日伪军向辉南、金川一带的王凤阁部发动了进攻，王凤阁部虽英勇抵抗，但由于日伪军来势凶猛，加之此地无险要可守，这支抗日义勇军被迫退至孤山子、大荒沟一带。以后日伪军紧跟不放，以分散流动的步兵第十联队的第一中队和一个机枪分队，加之伪满奉天警备军独立步兵第一营的一部分，联合组成"孤山子地区剿匪队"，以步兵第十三联队的第一中队组成"讨伐队"，直接在大荒沟一带进行围剿。至14日，孤山子、大荒沟相继陷落，自卫军被迫转移。与此同时，这部日军主力进入辉南境内围剿，但其先头部队遭到了孙岫岩部的顽强阻击，战斗异常激烈。在这次围剿中，伪满军于芷山的卫队第二连，在连副崔洪德的率领下，阵前起义，投向了抗日义勇军孙岫岩部。在围剿孙岫岩部的作战中，日伪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3日，日伪军在2辆坦克、

4 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终于突破了孙岫岩部的阵地，不久占领了五人班、安儿岭等军事要地。义勇军防线被突破后，通化的门户三源浦直接暴露在日伪军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义勇军撤出了三源浦，退守到通化。

在此之前的 10 月 9 日，日军第六师团部队即已从临江出发，突破自卫军第六方面军徐达三部防线后，11 日占领了八道江镇。唐聚五虽派郭景珊、孙耕九等部前往增援，但在日伪军陆军和空军的联合攻击下，伤亡惨重，最后失败。14 日，这部日军占领了距通化 30 公里处的五道江，通化危在旦夕。鉴于情况危急，唐聚五急令各部队向抚松一带退却。15 日，桓仁县城被从宽甸一线进攻的日伪军攻占，唐聚五退入山高林密的抚松地区，设想利用险要地势长期与日寇周旋。但这一设想由于准备不周，加之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各路自卫军损失很大，驻抚松地区的自卫军王永成部又暗中降日，使失败已成定局。无奈唐聚五命各路自卫军分别行动，命其能将队伍带到热河的尽量带到热河，愿在当地坚持抗日的可坚持抗日，不能坚持者可自动遣散。这路义勇军失败后，唐聚五本人则秘密入关请援，以图再举。10 月 31 日，日本关东军认为东边道的抗日武装已经被清除，遂下令停止讨伐，并令奉天警备军的姜全我部、廖弼臣部和董国华部，分别驻在桓仁、通化和新宾县，协助日军第二师团维持该地区的治安。

日伪军在联合镇压了东边道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后，关东军司令部即开始着手了“恢复治安”的第一期工作，开始部署讨伐与东边道北邻的吉（林）京（长春）奉（天）

龙（海龙）地区，防止这一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与东边道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余部联合。为实现这一企图，10 月 27 日，关东军司令部责令该地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加紧对伪满新京至奉天之间的南满铁路干线和吉长、吉海、沈海铁路之间的抗日义勇军展开讨伐。同时，将日军混成第十四师团、伪军吉林警备军的 2 个旅、吉林骑兵队、伪军奉天警备军混成第六旅、骑兵第二旅、卫队团及靖安游击队之一部，配置在独立守备队之下。同时，关东军还令第二师团特别要加强对吉长、吉海、沈海铁路沿线的警戒，尽可能地协助独立守备队清剿铁路沿线的抗日武装。

当时，活跃在吉京奉龙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有三江好、殿臣、宋国荣、红军等部，这些抗日武装给伪满政权以极大的打击。11 月 11 日，日伪军在关东军飞行队的支援下，从东面的吉海、沈海铁路沿线向西面的南满铁路发动了进攻，开始将抗日义勇军向满铁线以东压迫。这一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有5 000余人，但多为绿林出身，武器装备较差，在日伪军的联合围攻下，回旋余地逐渐缩小，不久就被日伪军联合击散，只有殿臣率部转移到桦甸地区。据此，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将讨伐的区域扩大到桦甸。11 月 22 日，日军 4 个支队和吉林警备军骑兵第四旅进兵桦甸，25 日占领了桦甸。11 月 30 日，关东军司令官宣布这一地区的讨伐结束，命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各抽出一部驻防桦甸、双阳、西安（辽源）、伊通、西丰等地，负责维持当地的治安。

结束东边道及吉京（长春）奉龙地区的讨伐后，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于 12 月 1 日令第二师团主力开往辽东的

三角地区，准备讨伐邓铁梅、李子荣、刘景文等部的抗日义勇军。在这次讨伐中，伪满军李寿山部的3个营及靖安军的3个步兵营、3个骑兵连、机枪、迫击炮、山炮各1连被配属到关东军第二师团。此外，伪满军的王殿忠部2个营被配属到日军独立守备队，被布设在辽宁大石桥一带。12月13日，参加讨伐的日伪军从两个方面向义勇军逼近，一路以第二师团天野旅团为主，有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十三联队第一大队、野炮第二联队第一中队等日军，加之伪满靖安军，分别从海城、盖平、辽阳出发，迅速向岫岩逼近。伪满军的王殿忠部，则在海城、大石桥、盖平一带负责对南满铁路的警戒。另一路以关东军第二师团骑兵讨伐队、骑兵第二联队、步兵第四联队第三中队为主体，伪满靖安军及李寿山一部与之配合，从庄河出发，向大孤山、龙王庙一带进犯。

13日，日军天野旅团先遣部队从海城出发，14日抵达岫岩县城西北30公里处的大偏岭。大偏岭系海城通往岫岩的必经之路，该地群峰绵亘，地势险要，为岫岩西北部之屏障。驻守此地的抗日义勇军刘景文部，主力千余人凭险布兵于各个要口。14日早，日伪军5 000余人开始向岭上发起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至傍晚，义勇军不支而退。日伪军占领大偏岭后继续向岫岩县城攻击，刘景文自知大偏岭失守岫岩难保，为保存实力，遂率部向岫岩县城东北30余公里处的黄花甸子一带转移。此后，天野旅团留少数兵力守城，大部分兵力向大孤山、龙王庙一带包抄。

在天野旅团从海城向岫岩进攻的同时，驻辽阳的日伪军也沿辽阳以南吉洞峪进入岫岩地界，于12月15日到达岫岩北的黄花甸子、关门山一带。这路敌军有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第二中队，伪辽阳县警察大队500余人，伪满靖安军一部也配合了讨伐行动。这时，在黄花甸子的抗日义勇军刘景文部大约有2 000余人。日伪军从12月16日开始对关门山发动攻击，义勇军在给予敌军重创后，于翌日晨撤退。黄花甸子之役，讨伐抗日义勇军的伪满军受到了沉重打击。

另一路从庄河方面向三角地区进攻的日伪军，由关东军第二师团骑兵讨伐队小岛大队长指挥，主要是攻击哨子河以东、安奉路以西及大洋河西沿岸的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和李子荣部。12月15日，各路日伪军相继到达庄河县境，开始向大孤山、龙王庙一带进攻。日伪军讨伐队在庄河境内没有遇到抗日义勇军的大规模抵抗，但伪靖安军的一个营在庄河北的土城子遭到庄河大刀会的重创，日军顾问森秀树等人被抗日义勇军打死。

12月20日，日本关东军的讨伐队阵容发生了变化，第二师团被调回日本，围攻三角地带抗日义勇军的战事由独立守备队接替，并将刚从朝鲜渡江到安东的第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调出，归守备队司令官指挥。在此之前归第二师团指挥的伪满军也全都划归日军独立守备队区处。24日，守备队司令官开始集中部队包围刘景文部，令第三大队从海城、第四大队从刁窝堡子、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沿大洋河岸、骑兵第六联队及藤井支队从盖平、第六

联队从黄花甸子分别出发，会攻岫岩。面对日伪军的联合进攻，抗日义勇军刘景文部沉着应战，凭借熟于地理民情等到条件，与日伪军展开了周旋，并于12月底冲破了日伪军的包围，退至岫岩西南地区继续活动。在日伪军在岫岩向刘景文部抗日义勇军进攻的同时，日军第四守备大队也会同伪满军向邓铁梅部发动进攻，邓铁梅部抗日义勇军有3 000余人，与日伪军在哨子河以北的文家街、红花岭、大营子一线，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至12月30日，相继收复了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等地，击毙日伪军50余名，迫使日伪军收缩兵力向点线撤退。

关东军对三角抗日区的讨伐，动用了关东军第二师团、第六师团、独立守备队等精锐部队及伪奉天警备军约15 000名日伪军，历时1个多月，不但没达到消灭抗日义勇军的目的，而且自身受到了很大的伤亡。据《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一书记载："本次讨伐，作战达50余次。我方独立守备队战死将校1名，下士官以下27名，战伤将校1名，下士官39名。第二师团战死3名，战伤6名。"在这里日军伤亡的数字显然被缩小了，其实，据几个较大战役的统计，日军士兵被击毙者最少不下200人。至于伪满军的伤亡，日军在各种记载中更是讳莫如深，伤亡更是很大。1933年日军进攻三角地带的军队大部撤出，仅留少量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伪警察担任警戒和维持治安。这样，三角地区的抗日武装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但最终未被消灭，为后来的壮大抗日活动，保存了有生力量。

第一章　辽宁军政的混乱与辽宁警备军的编成

1933年1月12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发布作战命令，命奉天警备军司令官于芷山率伪军在辽河一带对抗日义勇军展开讨伐，并责成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和第八师团长配合于芷山行动，在辽河一带周围的铁路沿线进行警备，协助奉天警备军对抗日义勇军的围追堵截。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还命令关东宪兵队也参加作战。这次对抗日义勇军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其军事行动以伪满军为主力，关东军进行配合，这也反映出伪满军事形势的一系列变化，这主要是：一、日伪军结束了在东边道和三角地区的讨伐后，辽宁境内的反满抗日运动逐渐走向了低潮，抗日义勇军除李纯华、张海天、项青山等部坚持在辽南一带活动外，绝大多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认为，即使伪满军作战能力仍不强，政治上仍不可靠，下级官兵经常有哗变，但用于对付孤立无援的义勇军也基本上能应付，关东军各驻守部队的配合实际上也是对伪满军的监视。二、1933年，关东军正积极筹划准备攻占热河，参加“南满讨伐”的日军，在进攻热河前也需要休整，因此，关东军把辽宁省境的讨伐任务交给伪满军，既有利用伪军维持伪满治安的长久考虑，也是根据当时情况的安排。

于芷山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以消灭辽河一带抗日运动为目的，将讨伐的重点置于辽河下游地区。在1933年以后，于芷山将他的奉天警备军讨伐部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以傅布彦为指挥的右翼队，一部分是以王殿忠为指挥的左翼队，他自己指挥10 000余人的中央队作为讨伐的

总预备队。于芷山对奉天警备军的讨伐分工是；中央队负责讨伐分布在太子河东侧的王全一等部抗日义勇军，同时会同左、右两翼伪军逐渐对王全一部进行合围，在高平、台安、高丽房、李家窝棚、太子河、三汊河、八家子、二十里铺一线构成包围圈。尔后，再以活动在高丽房、沙岑一带的张海天部为目标，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将其歼灭。根据这一部署，从1月22日起，参加讨伐的奉天警备军各部在少量日军的配合下，从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打虎山、沟帮子各地，向辽河下游包抄过来。

这次讨伐，是伪奉天警备军第一次单独行动。为了显示伪军的实力，于芷山排兵布阵气势汹汹，在关东军飞机的助战下，对辽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开展大规模的进攻。义勇军在海城、辽阳、盘山、台安等县与伪满军展开了多次作战，曾给于芷山部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此时恰逢天寒地冻，义勇军的给养得不到补充，使义勇军的伤亡消耗很大。又由于讨伐是在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带进行，寒冷的天气又给伪满军的军事运输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当地又无险可守，因此，伪满军的推进速度很快，这样到2月上旬，辽南抗日义勇军就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大部被伪满军击散，余部被迫撤往热河境内。1933年2月，完成辽河地带的讨伐后，于芷山带领伪奉天警备军讨伐部队返回原驻地。

从1932年9月到1933年2月，在这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为镇压辽宁境内大规模的反满抗日运动，动用了关东军的大部分部队和伪奉天警备军的全部兵力，

先后将东边道、三角地区及辽南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满抗日运动镇压了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刚刚建立的伪满统治。辽宁境内的抗日运动，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一直没有停息。“南满讨伐”后，日伪方面将讨伐的重点转向热河，关东军全力准备入侵热河，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主力师团多数西调，仅留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维持辽宁境内的治安。在这种背景下，辽东地区的抗日运动又迅猛地发展了起来，经常袭击日伪军的据点，给日伪统治以极大的震动。当然，辽东地区的反抗运动，与因伪满成立而引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相比，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气势上都有很大差距，对日伪统治的威胁程度都不及从前。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开始逐渐退居到幕后，将伪满军逐渐推到前台。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也由1932年前后开始的“分散配置”镇压东北的抗日运动，逐步转向集中加强训练，准备对前苏联作战。

1933年3月，关东军占领热河全境后，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处境更加孤立和艰难。热河本是一条连接东北和关内的通道，热河的失陷，给关外抗日义勇军的生存和战斗环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许多义勇军队伍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了辽东地区，致使东边道和三角地带的爱国军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刺激。沉闷一时的抗日义勇军愤于国民党政府的步步妥协退让，纷纷起来反抗，辽东地区又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别是在东边道地区，原辽宁民众自卫

军余部以王凤阁为中心，又趋活跃。直接威胁着日伪在临江、通化、辑（集）安三县和鸭绿江沿岸的统治。三角地区的邓铁梅、刘景文、李子荣等部也开始活动，四处袭击敌伪据点，扰得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鉴于辽东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又呈星火燎原之势，伪奉天警备司令部于7月又调集重兵，重新开始对东边道和三角地区进行讨伐。这次讨伐日军参加的军队有，关东军驻防在安奉铁路的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和驻防在大石桥的第三大队全部兵力。伪满军参加的有安奉地区警备司令兼混成第二旅旅长赫慕侠的1个步兵团、辽东警备司令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殿忠部的2个营，此外还有凤城、岫岩、庄河等县的伪满警察大队。关东军第三独立守备队配合王殿忠部从海城方面向岫岩进攻义勇军刘景文部，第四大队从凤城方向进攻邓铁梅部和李春润、李子荣部。这次日伪军和抗日义勇军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在小汤沟、关门山、大营子、苏子沟一线，大李家堡子、大楼房、河里寨、红旗街一线，及哨子河左岸一面山至龙王高一线。

此次讨伐之时正值青纱帐起，义勇军利用自然的有利条件作掩护，转战于山林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义勇军各部中，最活跃的是李春润、李子荣部。7月下旬，原辽宁民众自卫军副总司令李春润在北平筹办到了一批军火，从海路运抵三角抗日区，得到了武器接济的抗日义勇军首先攻取了伪满军守备的红旗街，继而又在7月30日包围了龙王庙，与守敌日本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的赫慕侠第二混成旅展开了激战。7月31日，日伪军急调兵增援

龙王庙。直到8月中旬，抗日义勇军在日伪军的联合攻击下，损失很大，李春润身负重伤，后在李子荣的救援下，撤出险区。

在北线，日伪军集中兵力搜索和追剿邓铁梅、刘景文两部义勇军的主力。开始时，善于游击作战的义勇军凭借山高林密的有利条件，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给日伪军以很大的杀伤。但9月末以后，随着天气的变冷，青纱帐倒，山林落叶，义勇军失去了隐藏的屏障，日伪军趁机反扑，使义勇军损失很大，至11月初讨伐结束，刘景文部义勇军仅剩下300余人，邓铁梅部仅剩下1 000余人。

此次讨伐，三角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主要领导人李春润受重伤而牺牲，刘景文也因所部损失严重于1933年11月潜入关内。只剩下邓铁梅依靠当地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凤城、岫岩两县的交界山区，与日伪坚持着斗争。

1934年1月下旬，日伪军发动了对三角地区邓铁梅义勇军的最后一次讨伐，这次讨伐持续时间最长，最残酷。参加讨伐的伪满军主要是奉天警备军的辽东警备司令部混成第三旅王殿忠部和安奉地区警备司令部的第二混成旅赫慕侠部，日本关东军的独立守备队也有少量部队参加了讨伐。讨伐中王殿忠部伪军第一、第三营共5个连从营口出发，在1月24日开始进入岫岩城、南马峪、龙王庙一线，王殿忠本人也在24日到达岫岩，将司令部设在岫岩城。这路伪满军讨伐的目标主要是刘景文部的任福祥、曹国仁部义勇军。另一路的赫慕侠部伪军，司令部设在凤城县城，共有伪军10个步兵连，2个骑兵连，分别从葛藤峪、大李

家堡子、沙里寨、北井子、大营子、沙金厂、三道虎岭等处开始进剿，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邓铁梅部义勇军。1月25日，王赫两部伪满军从岫岩、凤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围剿，每到一地烧、杀、抢、掠，在三角地区实施“集家并屯”，经过日伪军4个月不分昼夜地连续讨伐，义勇军邓铁梅部损失很大，一度陷入了困境。最后日伪方面以卑鄙的手段，通过收买叛徒，逮捕了正在病中的邓铁梅。邓铁梅被捕，标志着三角地区抗日运动再次陷入低潮。1934年5月，日伪军逐次撤出三角地区。

经过日伪方面主要是奉天警备军反复的讨伐，到1934年下半年，以原东北军系统为主体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领导的抗日运动，逐渐走向了失败。日本关东军在伪满州国建立之初编成的各路伪军，充分扮演了傀儡军队的角色，基本上完成了替日本侵略者担任“警备”的任务，给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逐渐走向低潮，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军讨伐的任务逐渐减轻，关东军开始对伪军加强了控制和改造，遂于1934年7月将伪满境内的各省警备军，改成军管区。原奉天警备军整体改成第一军管区，于芷山仍任司令官，曹秉森任参谋长。第一军管区下仍设2个地区司令部，廖弼臣、王殿忠分别任奉天和安东两个地区的司令官，兵力整编为步兵旅2个、混成旅4个、教导队1个，均布设在东边道和三角地区，主要任务仍是警戒和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的反抗运动。

第一章　辽宁军政的混乱与辽宁警备军的编成

注释：

①《九·一八事变》176 页 中华书局

②《九·一八事变》175 页 中华书局

③《九· ·八事变》175 页 中华书局

④《九·一八事变》175 页 中华书局

⑤《国难痛史》第三卷下册 69 页



第二章　吉林军政的混乱与吉林警备军的编成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吉林东北军



日军进城后，迅即占领了省政府各要塞部门，旋即熙洽撕去了伪装，组建了伪政权，并以伪政权的名义发令改编吉林省境的东北军部队。与此同时，久怀野心的原东北军师长于琛澂被起用为“吉林剿匪军”总司令，命其收编投降军队和收罗旧部。熙洽还派吉林军官教练处总办齐知政，在关东军的配合下收编了原军官教练处的部分人员和千余名警察及50余名宪兵，组织了吉林警备司令部。

第二章　吉林军政的混乱与吉林警备军的编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吉林省的管辖区域和今日差别很大，北至今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接壤前苏联，南抵四（平）梅（河口）和梅集（安）铁路，面积约4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50余县。

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兼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掌握着吉林的军政大权。当时，熙洽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由于“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不在吉林，由熙洽代行省主席和副司令职务。吉林省境的东北军当时有国防、省防之分，国防军归张作相直接指挥，有步兵3个旅和骑兵1个旅，炮兵1个团及部分工兵、辎重兵等。国防军为正规部队，武器装备精良，兵源充实，总人数在30 000人以上，步兵旅沿吉长、哈长、哈绥铁路配置，骑兵旅布防在农安、扶余一线。特种兵多驻于吉长两市。吉林的国防军不负地方治安责任，专事训练，其统辖节制机构是设在省城的陆军训练处，训练处首脑“督办”由张作相自兼，其具体业务由训练处参谋长郭恩霖办理。“九·一八”事变时驻吉林的东北军国防部队具体情况如下：

旅番号	旅长	团番号及团长		驻地
		团番号	团长	
陆军独立第二十五旅	张作舟	六百七十团	任玉山	长春南岭
		六百七十一团	夏鸿谟	
		六百七十二团	刘宝麟	吉林
陆军独立第二十六旅	邢占清	六百七十三团	宋文俊	哈尔滨
		六百七十四团	刘汉武	一面坡
		六百三十五团	赵秋航	牡丹江



旅番号	旅长	团番号及团长		驻地
		团番号	团长	
陆军独立第二十二旅	苏德臣	六百六十一团 六百六十二团 六百六十三团	任永和 赵毅 陈德才	双城 双城 三岔河一带
独立骑兵第七旅	常尧臣	骑四十九团 骑五十团 骑五十一团	尹保衡 刘玉琨	农安、扶余、伏龙泉、乾安一带
炮兵第十九团	团长穆纯昌			长春南岭
工兵第十一营	营长佟荣甫			
辎重第一营	营长宋岳玲			（有汽车队）

省防军为地方部队，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并承担部分中东铁路护路任务。当时吉林全省被划分5个区域，每一区域设一镇守使署，驻兵1旅。镇守使由省防军旅长兼任。“九·一八”事变时，吉林省省防军番号统一编入国民军序列，旅制多为步兵旅或混成旅，总人数在20 000人上下。其具体布防情况如下：

区域	镇守使署所在地	镇守使姓名	部队	兵力配置
吉长镇守使署	长春	李桂林	陆军独立第二十三旅	长春、伊通、双阳、磐石、舒兰、桦甸、靖宇一带
延吉镇守使署	延吉	吉兴	陆军独立第二十七旅	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敦化、额穆一带

区域	镇守使署所在地	镇守使姓　名	部　　队	兵力配置
滨江镇守使署	哈尔滨	丁超	陆军独立第二十八旅	哈尔滨、五常、阿城、珠河、苇沙河一带
绥宁镇守使署	宁安	赵芷香	陆军独立第二十一旅	宁安、穆棱、东宁、密山、虎林一带
依兰镇守使署	依兰	李杜	陆军独立第二十四旅	依兰、勃利、佳木斯、富锦、宝清、饶河一带

属省防军性质的军队，除归镇守使署统辖的各旅外，尚有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下辖步兵 3 个营，骑兵 1 个营，迫击炮、重机枪、通讯各 1 连，兵力4 000余人，装备精良，驻防在省城吉林。另外，还有吉林山林警备队，步兵 3 个营，骑、炮兵各 1 连，兵力也在4 500人以上。此警备队系由正规部队改编，有相当的战斗力。

除国防、省防两部军队外，吉林各县还有相当数目的地方武装，称保卫团，人数不等，一般都在三、五百人至千人之间，人枪总数也在5 000人上下，统由省城的保卫团训练处节制，直接受省清乡督办兼保卫管理处长王之佑指挥。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省境的兵力实际上在60 000人上下。事变时张作相回锦州为父治丧已多日，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的名义主政，代行省政府主席和边防军副司令职务。这样，也为吉林省在“九·一八”事变后



的混乱，留下了隐患。

“九·一八”事变之夜，关东军在沈阳动手后，长春的日军也在关东宪兵队的引导下向长春东北军发起了进攻。当时，东北军在长春驻防两地，一地在铁北宽城子一带，驻独立陆军第二十三旅；另一地在南岭，驻独立陆军二十五旅的1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关东军在长春一动手，熙洽在吉林即得到了消息，他马上用电话命令驻长的军队，遇日军攻击时要避退。当时二十三旅旅长兼吉长警备司令李桂林正在与亲信打牌，接到熙洽的命令后，马上带部队撤往双阳方向，仅留了1个营在二道沟外看家。因此，当关东军进攻宽城子时，仅遇到了这一营的抵抗，营长傅冠军等多人战死，余部降敌。南岭守军接到熙洽命令后，炮兵丢弃36门大炮和大批军械、装备，向新立城方向溃逃，步兵团撤往麦子沟方向。由于不抵抗的命令和熙洽的叛卖，关东军几乎没遇到有力的抵抗，就轻取了长春城。

长春沦陷使省城吉林唇亡齿寒，暴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这时的熙洽，从忠实执行不抵抗命令走向了公开投敌的道路。他又以“听命中央，力避冲突”为名，命令张作舟的二十五旅和冯占海的卫队团撤出吉林市，假借和谈为名，拱手让出了吉林省城。

日军进城后，迅即占领了省政府各要塞部门，旋即熙洽撕去了伪装，组建了伪政权，并以伪政权的名义发令改编吉林省境的东北军部队。与此同时，久怀野心的原东北军师长于琛澂被起用为“吉林剿匪军”总司令，命其收编

投降军队和收罗旧部，准备以武力讨伐反对伪政权的军队。熙洽还派吉林军官教练处总办齐知政，在关东军的配合下收编了原军官教练处的部分人员和千余名警察及50余名宪兵，组织了吉林警备司令部。

9月26日，熙洽的吉林伪政权发表“独立通电”，称与南京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脱离关系，解散原军政两署。伪政权称“吉林长官公署”，熙洽自任长官。另一方面，在吉林伪政权成立后不足两个月，11月12日，吉林流亡政府也在宾县成立，张学良在北平电令诚允为吉林省政府主席，李振声为边防军副司令，丁超、冯占海分别任护路军总司令和警备司令。并向各路东北军发出命令，不得听从熙洽的指令。至此，吉林省内出现两个政权、两部分军队相互对峙的局面，政治局势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

然而，吉林省流亡政府虽然成立，但由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等人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具体的活动没有明确的指示，加之流亡政府首脑人物资望不高，有些将领不服气，实际上没能起到组织团结抗日的作用。反之，大部分将领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显得难以适从，即想不明白事变将如何结局，又得不到张学良的明确指示，而关东军和熙洽又咄咄逼迫，使他们处在极其矛盾之中。事变后吉林各地东北军将领一方面畏惧和关东军作战，同时也受旧军阀拥兵自重积习的影响，对不抵抗的命令一时都能够接受。但不战不和的躲避，关东军是不允许的，在扑朔迷离、难以卜测的事变面前，吉林东北军的将领，除小部分公开投敌



外，大部分一时还都处在观望之中，不敢走得太远。各路东北军实际上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流亡政府指挥不了他们，熙洽一时也控制不了他们。但这种局面为熙洽的诱降活动提供了历史条件。

熙洽的伪政权成立后一方面加紧拼凑伪军，同时在关东军的协助下，以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对各地东北军施加压力，威逼表明态度。当时熙洽还在哈尔滨设置特务部，利用各种关系派出大批汉奸，到各地游说进行策反活动。当时驻防各地东北军的态度如下：

吉长镇守使兼陆军独立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及部下各团长公开投敌，拥护熙洽的伪政权，这是吉林东北军中少有的整旅基本全员投敌的部队。

延吉镇守使兼陆军独立二十七旅旅长吉兴，在熙洽诱降和驻龙井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反下，1931 年 10 月公开投敌，但部下营长王德林、田霖率小部分人马参加抗日。这部投敌的东北军，系伪满第二军管区军队的基础。吉兴率部投敌后任延吉警备司令，隶下团长朱榕、王树棠、梁泮均升任伪满军旅长。

滨江镇守使兼陆军独立二十八旅旅长丁超，事变后态度暧昧，暗作个人打算，表态矛盾，时而表示不与熙洽合作，时而又表示不反对熙洽的做法，并与关东军秘密往来。但部下官兵抗日呼声较高，一时他还不敢公开投敌，但手下两个团长白文清和关成山拥护熙洽，明显有投敌倾向。

绥宁镇守使兼陆军独立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泥瓦

匠出身，所部驻宁安、穆棱、东宁一带，远离省城。吉林沦陷后，他表示动乱之秋，自己无能为力，要告老还乡，安度晚年。他对熙洽的做法无所表示，但部下团长张治邦坚决反对熙洽的卖国投敌行为。对于这一旅，熙洽一度试图趁赵动摇之机拖其下水，但没能成功，后张治邦接任旅长兼镇守使，稳定了局面，率其部队走向了抗日道路。

依兰镇守使兼陆军独立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事变后抗日态度坚决，明确反对熙洽的投敌卖国行为，在熙洽组织吉林伪政府时，他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呼吁共同团结抗日。其手下一名团长马龙图倾向熙洽，李杜为稳妥起见，将马革职。这一旅东北军后成为吉林自卫军的主力。

陆军独立第二十二旅，驻防在哈尔滨门户的双城一线，旅长苏德臣事变后只身逃往省城，投靠了熙洽。部下团长赵毅力主抗日，临危受命接任旅长，得到部下的拥戴，率领该旅走向了抗日道路。

陆军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反对熙洽的投敌活动，但部下参谋长盛芳厚和3个团长宋文俊、刘汉武、赵秋航都反对他，倾向熙洽，邢无奈一度被迫离职。后李杜、丁超举起抗日旗帜部队进入哈尔滨后，邢利用这一时机恢复旅长职务，驱走了投降派团长，率部走上了抗日道路。

陆军独立第二十五旅，沿吉长铁路驻防，旅长张作舟是张作相的族兄。“九·一八”事变之夜，驻守在长春南岭



遭到关东军袭击的那个团，即隶属于该旅。另外两个团原驻省城吉林，关东军多门师团进犯省城吉林前，熙洽命其撤退到吉林郊区乌拉街。熙洽公开投敌后，分别派汉奸郭恩霖、佟衡到该旅游说，团长刘宝麟、夏鸿谟挟持部分官兵投敌。张作舟无奈携其残部退到榆树，重编3个团。但该旅已非昔日，丧失了以往的战斗力。该旅后来又有一个团长临阵率部投敌，致使另外2个团被击溃，张作舟和一团长被俘。该旅基本瓦解，仅有少部分人投到冯占海部，走上了抗日道路。

国防骑兵第七旅，原由于琛澂的骑兵十六师缩编而成，旅长常尧臣在事变后有意率部投敌，但下属不服，常尧臣只身投敌，沦为汉奸。部下尹保衡、刘玉琨两个团长后来也公开率部投敌。熙洽委二人为旅长，给以补充军械，令其扩募伪军。国防骑兵第七旅仅有少部分官兵，后来转入义勇军李海青部，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931年冬，吉林各路东北军的处境大致如上述，处于欲战不行，欲降不敢的状态，听任熙洽蚕食。流亡政府及新任军事长官，实际上无力指挥也不想指挥各路军队，相反，却大肆搜刮民财运往关内充做军费。流亡政府甚至还怂恿部分军队，假意投靠熙洽，谋取经费。

不久，关东军在侵略北满的问题上与熙洽发生了矛盾，关东军等不及熙洽的慢慢瓦解的做法，采取了以武力迅速占领北满的方针。日伪军的联合进攻，在一定意义上讲，唤醒了东北军各级官兵的觉悟，认识到非武装抵抗将没有出路，客观上也加速各路东北军的联合抗日。另一方面，

作战失利后，也导致各部东北军逐渐被分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投降伪满，被编成伪满军，仅有少部分在失败后被迫撤到前苏联。到1932年下半年，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全部被瓦解，以东北军为主力的抗日义勇军活动也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地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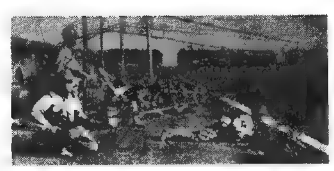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9个旅的东北军，其分野情况如下：

番　号	投敌部分	抗日部分
陆军独立第二十五旅	六百七十一团团长夏鸿谟和六百七十二团团长刘宝麟率部投敌，旅长张作舟率残部撤到榆树．后新编团长杨秉藻率该团投敌，被编成伪满骑兵第三旅。	六百七十团和后编成的赵维斌团参加了抗日，但大部分被关东军消灭，旅长张作舟和六百七十团团长任玉山被俘。赵维斌和六百七十团副团长王锡山率小部分官兵转入冯占海部。
陆军独立第二十六旅	旅参谋长盛厚芳及六百七十三团团长宋文俊和六百七十五团团长赵秋航率部投敌，宋文俊团被编入伪满军第三旅。	旅长邢占清率余部参加抗日，1932年初携残部与李杜等抗日将领从虎林撤入前苏联境内。
陆军独立第二十一旅	张治邦的后任旅长关庆录率一部投敌，被编成伪满第六军管区的一部分。	该旅大部分参加抗日，失败后从虎林退到前苏联。

番　　号	投 敌 部 分	抗 日 部 分
陆军独立第二十二旅	旅长苏德臣和参谋长张春玲投敌。后赵毅出任旅长。双城堡保卫战中六百六十一团团长吴永和战死，余部投敌。后六百六十三团团长陈德才接赵毅任旅长，陈率全旅随王之佑投敌，被编成伪满军吉林警备第九旅，陈德才任伪旅长。	
陆军独立第二十八旅	事变后六百七十九团团长白文清和六百八十团团长关成山率部投敌。六百七十九团编成伪满军吉林警备第二旅，六百八十团编成伪满军吉林警备别动队第二总队。旅长丁超1933年初在宝清率部投敌，后出任伪满锦州省省长。	旅参谋长杨耀钧参加抗日，后与李杜、邢占清等退入前苏联。
陆军独立第二十四旅	六百六十七团团长马龙图投敌，任伪满军吉林骑兵第四旅参谋长。	该旅在旅长李杜的率领下，大部分参加了抗日运动，1933年失败后残部从虎林退至前苏联。
陆军独立第二十三旅	该旅4 000余人，有3 500余人在旅长李桂林的带领下投敌编成伪满军吉林警备第三旅．投敌后李桂林任伪东铁路警处处长，六百六十六团团长马锡麟任伪吉林剿匪军副司令、旅长。	“九·一八”事变之夜，遭受关东军袭击的驻宽城子一营东北军即属于该旅。“九·一八”之夜营长傅冠军战死。另驻磐石的一营，在营长宋国荣的率领下，参加了抗日运动。

番　　号	投敌部分	抗日部分
陆军独立第二十七旅	该旅在“九·一八”事变时三个团4 800余人，在旅长吉兴的带领下绝大部分投敌，是伪满第二军管区的主要部分。吉兴投敌后任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团长朱榕、王树棠、梁泮任伪满军旅长等职。	该旅六百八十七团营长王德林率部起义，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进行抗日活动。另——营营长田霖也率部起义，参加冯占海部抗日，后该部与海龙游击队合并，编入东北抗联一路军。
独立骑兵第七旅	旅长常尧臣投敌。团长尹保衡、刘玉琨等率部投敌，并以此为基干扩编成伪军的骑兵旅。	该旅部分官兵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

第二节　吉兴投敌



吉兴投敌后，使素有复辟野心的熙洽如遇知音。不久，他把吉兴邀去省城，从两人都是满清后裔的角度商量建立伪满州国和推举溥仪的活动。吉兴听到要推溥仪当皇帝，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同为爱新觉罗子孙，他当皇帝我岂能不同意?"但他感到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心中没底，于是向熙洽提出7个重大问题，即无兵无钱怎么办?国际上不承认怎么办?张学良回来怎么办?与东北民心相悖怎么办?人民反对怎么办?国防怎么办?社会贤达不拥护溥仪怎么办?熙洽很干脆地向他露底：有日本皇军保护，一切好办。并说："东北富庶，筹款练兵容易，国防上与南次郎有协议，交给日军负责。"

吉兴，号培之，姓爱新觉罗，满清皇族出身。

1880（清光绪六）年，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满清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时代，封建家长为他选择了仕途之道，6岁开始延师督教，四书五经陪伴他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大部时光。1895年中日战争后，国内各地出现了大批西方式的新学堂，吉兴的家乡奉天城也开办了数所新式学堂，在这一潮流中，他走出私

塾，先以贵族子弟的身份，进入满清官学馆为官学生，以后又入盛京官立省学堂学习。


伪满军上将吉兴

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股出国留学热潮，清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办法，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通过学习外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留学活动中，清朝统治者格外看中军事，而在各国军事中又对日本陆军“忠君爱国，顺从长官，不侈言自由，不反对政府”的宗旨尤为欣赏，想通过学习日本军事挽救腐朽的八旗、绿营兵制。但又害怕军事科学知识落人人民手中，成为反对其统治的武器，因此，清政府多次明令禁止自费留学生学习军事，甚至一度想专派“世家宦族”“王公子弟”“宗室近支”去学习军事。1905 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协商，决定每年派 100 名学生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由清政府练兵处正式颁布十六条章程，规定选择这批留学生的条件，其中规定：在已设武备学堂的各省旗，由学堂内选派，未设学堂的省旗，从文武世家子弟内选派，并调查学生的三代履历。十六条章程还规定奉天省的名额为 4 名。吉兴不是武备学堂的学生，他凭借贵族子弟的身份被选中。

吉兴到日本后，先进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振武学校是参谋本部专为中国人进日本陆军学校学习所开

办的预备学校，因和清政府有协议，因此，在管束学生思想方面相当严格，学生入学时必须填写誓文、宣誓，吉兴也宣誓："照规专攻学术，决勿稍惑世论干涉政事；以敬上为要道，遵守纪律，以昭敬顺。"三年后吉兴毕业，到日本江之台炮兵联队实习一年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吉兴归国，被练兵处分派到驻新民的北洋新军二十镇任见习军官。是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

辛亥革命后，吉兴一度悲观失望，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他的军事特长有了用武之地。民国后他先作奉天督都府编制科一等科员，代理科长，后转任奉天镇安上将军公署一等科员。

20世纪二十年代，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逐步在东北崛起，随即吉兴投奔了这个集团。1916年张作霖攫取奉天省军政大权后，吉兴出任安东鸭（绿江）浑（江）两江水上警察局长，军衔升为中校。二年后奉系军阀第一次出关，参加直奉大战，吉兴出任"南征军"湘东司令部参谋兼二十七师参谋长，驻在长沙，开始为军阀混战运筹帷幄。不久转任北平奉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二十七师参谋长，升为炮兵上校，这时吉兴已成为奉系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吉兴又参与了奉系集团兼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活动。1919年张作霖兼并黑龙江省后，派去亲信孙烈臣督黑，孙从奉天带去大批亲信拼凑班底，吉兴也随孙烈臣去黑省戍边，出任黑龙江省炮兵团长。1921年张作霖又兼并了吉林，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吉兴作为孙烈臣的亲信，又随孙到吉林，出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晋升为陆军少将。

第二章　吉林军政的混乱与吉林警备军的编成

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吉林督军孙烈臣率大部队出关作战，吉兴以参谋长身份留守后方，全权负责后方事宜。这时，吉林境内的土匪借机兴风作浪，由于兵力空虚，一时难以剿灭，吉兴为尽快稳定后方，遂采取了剿抚兼用的手段，收抚了四大绺土匪2 000余人，吉兴把他们改编成8个大队，经过简单训练后，用其讨伐其他匪股，吉兴用此办法，平定了吉林境内的匪患，稳定了后方，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第二次直奉战中，奉系军阀被打败，张作霖率队退回关外后，立誓要雪败战之耻，重新问鼎中原，遂即进行了一系列整军经武的改革，在关内各地招揽了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军官，并派充到重要岗位。吉兴在这次改革中，受命重任，从吉林督军参谋长转任延吉镇守使，兼吉林步兵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被擢升为陆军中将。

当时延吉地区中日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当地日本领事馆多次被烧，日本人也时有被杀，加之朝鲜的民主主义者一直在此活动，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寻找机会要发难，中国方面在处理延边的中日关系上，一直感到棘手，派吉兴出任镇守使一职，有临危受命之意。吉兴到任后，将军队沿延（吉）、和（龙）、珲（春）、汪（清）、敦（化）5县驻防，担负国防和维持地方治安双重任务。

“九·一八”事变，使吉兴的政治生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驻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某赶到延吉，向他透露了事变的一些情况，试探他对事变的态度。吉兴从他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中意识到，这次事变非同一般，日本已经发难，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他在事

变后的几天，一直心神不安，不做明确表态。不久，熙洽的吉林伪政权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建立，并给吉兴发来电报，向他宣布吉林独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原副司令长官公署改为吉林军政长官公署。并命令吉兴改延吉镇守使为延吉警备司令，维持延吉地区治安。熙洽的电报无疑是向吉兴下了最后通牒，逼他做出明确的选择。接受延吉警备司令，就意味着承认吉林伪政权，宣布公开投敌，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盘踞在吉林的关东军第二师团攻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吉兴舍弃了民族利益，权衡私利，认为："抗日弄不好家破人亡，投降更有利些，自己留学过日本，又会日语。"[①] 于是他决意投降，召来部下 3 个团长开会，他先讲了对时局的看法，然后提出投降意见。由于 3 个团长基本赞成，吉顺利地率领这支4 800人的东北军部队改换了旗帜，编成了伪满军。

吉兴投敌后，使素有复辟野心的熙洽如遇知音，不久，他把吉兴邀去省城，从俩人都是满清后裔的角度商量建立伪满州国和推举溥仪的活动。吉兴听到要推溥仪当皇帝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同为爱新觉罗子孙，他当皇帝我岂能不同意?"但他感到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心中没底，于是向熙洽提出 7 个重大问题，即无兵无钱怎么办? 国际上不承认怎么办? 张学良回来怎么办? 与东北民心相悖怎么办? 人民反对怎么办? 国防怎么办? 社会贤达不拥护溥仪怎么办? 熙洽很干脆地向他露底，有日本皇军保护，一切好办。并说："东北富庶，筹款练兵容易，国防上与南次郎有协议，交给日军负责。"吉兴听到最关心的国防问题与日军有协

议，向熙洽追问内容。熙略有难色地说："很简单，几句话打个戳。"然后扭转话题，示意要他加紧推举溥仪的活动。

吉兴在熙洽处得到底后，旋即利用日本留学的关系，遍访关东军头面人物，为复辟满清统治到处奔走游说。

伪满成立后，吉兴因率部投敌有功，被提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吉林警备军是以吉兴率领投敌的独立步兵第十三旅为基干编成，后在日寇的扶植下逐步膨胀。据 1933 年伪满军政部统计，吉林警备军在伪满初期人数最多，占同期伪满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统辖着吉长、滨江、延吉、绥宁、农安、依兰 6 个地区和北满大部区域，其兵力配备及人员情况如下：

<table>
<tr><th>地区别</th><th>旅长姓名</th><th colspan="2">部队</th><th>兵力</th><th>驻地</th></tr>
<tr><td rowspan="4">司令部直属</td><td rowspan="4"></td><td colspan="2">司令部
宪兵队
无线电队
装甲车队
军乐连
陆军医院
军械厂办事处
吉林无线电台
新京无线电台
测量局
延吉无线电台
炮兵营</td><td>1 447 人</td><td>吉林</td></tr>
<tr><td>第二教导队</td><td>步兵第二团
骑兵第二团
炮兵连
通讯连
军官候补生连</td><td>2 718 人</td><td>吉林</td></tr>
<tr><td colspan="2">骑兵支队</td><td>1 295 人</td><td>磐石</td></tr>
<tr><td colspan="2">骑兵支队</td><td>1 163 人</td><td>敦化</td></tr>
</table>



地区别	旅长姓名		部队	兵力	驻地
吉长地区（司令邢士廉）滨江地区	步兵第四旅	邢士廉	步兵第十团 步兵第十一团 步兵第十三团	3 548 人	吉长、吉敦青海线护路
	步兵第五旅	王树棠	步兵第九团 步兵第十二团 步兵第十四团	3 244 人	吉长地区
滨江地区（司令李文炳）	步兵第八旅	李文炳	步兵第四团 步兵第五团	2 343 人	哈尔滨（护路）
	步兵第九旅	陈德才	步兵第二十一团 步兵第二十二团	2 301 人	双城（护路）
延吉地区（司令金恩奎）	步兵第三旅	金恩奎	步兵第七团 步兵第八团	2 496 人	延吉
绥宁地区（司令李振声）	步兵第一旅	刘金麟	步兵第一团 步兵第二团	1 980 人	梨树
	步兵第七旅	白文清	步兵第十八团 步兵第十九团	2 343 人	下城子（护路）
	骑兵第四旅	郭宝山	骑兵第十二团 骑兵第十三团 骑兵第十四团 机关枪连 迫击炮连 山炮连	2 037 人	密山
农安地区	骑兵第一旅	刘玉琨	骑兵第一团 骑兵第二团 骑兵第三团 机关枪连 迫击炮连	1 867 人	农安

地区别	旅长姓名		部队	兵力	驻地
依兰地区（司令于琛澂）	骑兵第二旅	李毓文	步第三团 骑兵第四团	1 598 人	桦川
	骑兵第三旅	杨秉藻	步兵第六团 骑兵第八团	1 598 人	勃利
			步兵营 机关枪连 骑兵连 山炮连	706 人	依兰
北铁护路军	司令（于琛澂）		司令部	151 人	哈尔滨
			山林游击队	1 452 人	延寿
总计				34 287 人	

1934 年伪满改元，吉林警备军改为第二军管区，吉兴继任第二军管区司令，擢升为陆军上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吉兴以其“卓越”的汉奸活动，在伪满人事制度上创造了奇迹，连续在伪满的京畿地区干了 9 年军管区司令。在这期间，日伪的统治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汉奸的控制也逐渐强化，和吉兴同时卖国投敌的一些汉奸，多数被褫夺了军权，其他的军管区司令都几易其人，吉兴却得到了长期重用，适应了日伪统治政策的需要，其中秘密有二：第一，他是难得的有思想、有谋略、又死心塌地的汉奸人才。

伪满建立初期，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达到了高潮。吉兴向日寇建议，把抗日武装赶到山里去，然后使用断交通，

封锁粮道的办法，使其日久无粮，不打自散。吉兴的建议深得日寇的赏识，为日寇镇压东北人民，最先提供了方法。对防范伪军下级官兵起义、哗变，他提议在伪满实施日本式的征兵制度，废除中国传统的募兵，用良家子弟替换兵痞，用军官学校培养的军官，淘汰旧军官，从根本上改造伪军。

此外，吉兴还是镇压东北人民反抗活动的实干家和日寇的忠实鹰犬。在伪满军管区司令中，吉兴以勤于前线著称，他在任军管区司令期间，曾几十次上前线亲自指挥讨伐督战，日伪当局对他的“事迹”，曾数次在伪满报刊上报道宣扬，每年年终的国务宴会上，他都必受表彰。

第二，吉兴为人乖灵，善于溜须逢迎。

吉兴诸于官场世故，对部下的贿赂心安理得的笑纳，反过来他也会用此种手段去讨日本要人的欢心。据他自己讲：曾送伪满军高级顾问多田骏古瓷花缸1对；第二军管区主任顾问中野英光白熊皮1张；顾问滨田弘伪币2 000元；广濑师团长法兰瓷瓶1对。这些日本人无疑都是决定吉兴命运的关键人物，他的行贿活动，加深了他和日本人的感情，对他得到重用起到了作用。

另外，吉兴在伪满期间，一直恪守着“尊口缄默”的宗旨，他吸取一些汉奸的教训，对日本人在伪满的政策，从不加任何评论，他对日本人的不满，隐匿于内心深处，不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忠顺，就在自己的部下面前，也历来如此。伪满期间，关东宪兵队曾通过收买汉奸高官周围的人，监视他们的言行，吉兴由于小心谨慎，在日本

人眼中，一直保持着忠顺可靠的形象。

1941年春，吉兴被调离第二军管区，转任侍从武官长，作为溥仪的最高军事谘议官，终日陪伴着溥仪。侍从武官长实际上是闲职，没什么具体事情可做。1944年，吉兴从侍从武官长转任尚书府大臣。

日伪统治时期，吉兴是妇孺皆知的“大人物”，曾显赫一时。伪满建立之初，因卖国有功，得过20万元的建国功劳金。以后得伪满各类勋章10数枚，他是伪满军中12名上将之一，1943年被赐以终身官职“将军”，和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于琛澂齐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他掠得伪中央银行30 000元巨款和20万元支票（因苏军占领长春，未及提出现款）随溥仪逃到临江县大栗子沟，准备协同日寇负隅顽抗。日本投降后只身逃回长春，1945年8月31日在长春家中被前苏联红军俘虏押往前苏联。1950年被遣返回国，羁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中，1954年被审判。

第三节　于琛澂投敌



于琛澂托辞说："我已经退役多年，懒散惯了，又有高血压症，实无精力再去南征北战，恐负重托，感谢您对我的栽培，这一点请熙长官多加谅解。"熙洽深谙想上贼船的汉奸欲做还休的心理，因此先劝勉道："险舟，您太客气了。您正壮年，精力充沛，更有多年统帅指挥军队的经验。我们相交多年，您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您的号召力很大，只要把您的旧部下招集起来，扩大军队，日本人答应，用钱有钱，用枪有枪，一切都有我来负责。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又何乐而不为呢？"尔后，熙洽又威胁道："你要知道，少帅始终没忘掉你背叛他们父子之仇啊！有少帅就不会有你于琛澂啊！你如果不按日本人意图去作，日本人能够轻易放过你吗？"

于琛澂，字险舟，1887 年生，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北洋陆军速成学校第三班骑兵科毕业，清末入军界。历任黑龙江省卫队哨官、第二路防管带帮统统领、陆军骑兵第二旅第九团团长、吉林骑兵第十旅旅长。1923 年任吉林剿匪

司令。因战功显赫，1925年被提升为吉林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郭松龄反奉时，于琛澂以获取吉林地盘为条件也参与其中，兵败后，于琛澂弃职畏罪潜逃到哈尔滨。张作霖下令各地缉捕，后经人斡旋，于方免一死，罢官了事。此后，于琛澂与日俄贵族资本家合资开办了穆棱煤矿，他自任总经理，专力搜刮钱财，很快即为自己聚敛了庞大家产。

日本人之所以看中了于琛澂，不仅仅是因为他"剿匪"有方，更重要的是，他在奉张时期先是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最后却因反张而身败名裂，狼狈不堪，心中早就对张氏政权恨入骨髓。拉出这类人打起反张学良旗帜，是日本关东军收拢汉奸的惯用伎俩。9月下旬，熙洽派专人将在老家双城坐待时机的于琛澂请至吉林，其意是想让于琛澂出山，率领附逆军队讨伐义勇军，安定吉林秩序。因其时形势尚不明朗，于琛澂始有疑色，故托辞说："我已经退役多年，懒散惯了，又有高血压症，实无精力再去南征北战，恐负重托，感谢您对我的栽培，这一点请熙长官多加谅解。"熙洽本身就是个标准的汉奸，深谙想上贼船的汉奸欲做还休的心理，因此先劝勉道："险舟，您太客气了。您正壮年，精力充沛，更有多年统帅指挥军队的经验。我们相交多年，您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此种重任我考虑再三，非您不可。不用推辞了，我已向多门司令官推荐过了，他万分赞同。您也不必有其他的想法，多门司令官说过，日本人绝对没有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不过援助我们建立一个新国家，两国同盟共存共荣。现在叛逆到处扰敌，影响

我们建国，必须尽快地肃清。方针是以讨伐为副，争取他们归顺为主。您的号召力很大，只要把您的旧部下招集起来，扩大军队，日本人答应，用钱有钱，用枪有枪，一切都有我来负责。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又何乐而不为呢?”尔后，熙洽又威胁道：“你要知道，少帅始终没忘掉你背叛他们父子之仇啊！有少帅就不会有你于琛澂啊！你如果不按日本人意图去作，况且你老和俄国人一起勾搭，日本人能够轻易放过你吗?”于回答说：“熙长官对我的厚意我是万分感激的。不过我同俄国人不过是在一起做买卖，并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动。”熙洽说：“这点我是知道的，不过恐怕人家日本人不那样认为吧!”② 在熙洽的恐吓利诱下，于琛澂终于上了贼船。不久，熙洽根据关东军的指示，成立了伪吉林省剿匪司令部，由于琛澂任剿匪司令。

吉林“剿匪”司令部成立后，于琛潜在熙洽和关东军的支持下开始招兵买马，大肆扩军，组编吉林讨匪军。于琛澂自行招集了两旅兵力，以李毓文和王树棠分任旅长，同时，熙洽又将诱降后经过扩编的伪军三大部拨给于琛澂，计有刘宝麟的第一旅，李文炳的第三旅，马锡麟的第三旅和杨崇武率领的骑兵支队。吉林讨匪军成立之始，关东军还不便过分地加以控制，只是象征性地派了几名军事顾问，此时的于琛澂大权在握，趾高气扬，可谓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经过于琛澂的短期整顿，临时拼凑的讨匪军渐入正规，只等时机成熟时对吉林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施以“讨伐”了。

在吉林巨奸乌烟瘴气地组织伪政权，拼凑伪军的同时，

吉林的抗日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继9月24日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首先“宣布独立”不听伪令后，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吉林卫队团团长冯占海也积极整理所部，准备抗日。1931年11月12日，吉林省临时政府在宾县正式成立，原省府委员诚允代理主席。宾县省政府成立后，立即将卫队团扩编为警备军，由冯占海任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并将绿林队伍宫长海、姚秉乾所部编为两个骑兵旅，由宫、姚分任旅长，归冯占海统一指挥。同时，李杜、张作舟、赵毅等爱国将领均表示服从临时政府的领导，联合抗日，吉林北部的抗日形势顿呈燎原之势。

关东军自11月19日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随即将目标转向锦州的辽宁省临时政府，因而对吉林的抗日力量尚无暇顾及。但它决定使用伪军先行“讨伐”吉林的义勇军，以为日后图取哈尔滨寻找借口。12月中旬，于琛澂率马锡麟、刘宝麟两旅伪军，在日军的监视下向榆树、舒兰的冯占海、张作舟部发动进攻。冯占海为诱敌深入，主动放弃舒兰县城，于琛澂不知是计，遂率伪军进占该城，然后兵分两路，向冯、张两部发起攻击。12月15日，马锡麟指挥伪军在水曲柳一带与冯部义勇军展开激战，遭重创后仓皇溃退，义勇军乘胜追击，收复了舒兰县城。另一路伪军刘宝麟旅进展顺利，很快即逼近榆树城下。守城团长杨秉藻是于琛澂的外甥，彼此早有勾结，当伪军兵临城下时，杨秉藻突然率部投敌，致使张作舟和团长任玉山被俘，大部溃散。12月30日，于琛澂又率伪军李毓文、王树棠、

马锡麟、刘宝麟等部，配以日军广濑寿助师团长谷部800余人，向冯占海部再次发动攻击。此时，冯占海部主力已由舒兰县移至五常县北。1932年1月19日，日伪军在拉林突袭冯占海所部一营兵力，双方遂互增援兵，在拉林一带展开拉锯战。“激战至深夜，敌军不支，后退至背荫河。此时，我军团颇有伤亡，弹药消耗甚重，有待补充调整，不便穷追，亦不便久留，在敌军退后亦撤至阿城、蜚克图等地。”[3]义勇军撤走后，伪军随后占领了哈市门户拉林。

1932年1月3日，锦州陷落。日军立即调兵北上，图取北满重镇哈尔滨。哈尔滨是哈满、哈绥、哈长三条铁路线的交会处，为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事变前，哈尔滨为东省特别区，直属于东北政务委员会。日军占领辽、吉、黑各战略据点后，哈埠就成了其急欲攫取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此时，哈尔滨的局势非常复杂。特区长官张景惠已投降了日军，手中掌握着由关东军供给武器装备起来的3 000名警察，名为维持哈市治安，保护外侨，实则是等日伪军攻哈时充做内应。滨江镇守使兼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也鼠首两端，暗中与本庄繁书往信来，表示不反对熙洽的做法，但由于官兵抗日情绪激昂，暂时还不敢公开附逆。驻哈市的第二十旅邢占清和驻双城堡的第二十二旅赵毅虽主张抗日，但对国民党政府出兵还抱有幻想，暂抱观望态度，迟疑不决。因此，哈尔滨驻军虽多，但基本各自为政，难相统属，这给日伪军进犯哈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随着冯占海率部撤至蜚克图驻防，哈尔滨的局势日益

紧张。恰在此时，冯占海、李杜等获悉，关东军指示熙洽调任丁超为伪吉林长官公署高级顾问，邢占清等也被免职或改任，已引起丁、邢的猜疑和不满。冯占海、李杜遂商定即刻分兵挺进哈尔滨，争取丁超、邢占清参加抗日。1月25日，冯占海率部由蜚克图进军哈东，丁、邢起兵响应。翌日，冯、李两部义勇军进驻哈市。为防日伪军进犯哈尔滨，义勇军各部划定了防区，即丁、邢两部和李杜的马则阁团防守哈尔滨市上号一带；冯占海

部防守三棵树、南岗一带；赵毅所部二十二旅防守双城堡一带。

1932年1月27日，日军以保护哈尔滨日侨为借口，指使于琛澂率王树棠、李毓文两旅伪军分别向上号一带和南岗至三棵树一带义勇军发动攻击。义勇军同仇敌忾，奋起抵抗，激战至次日上午，于逆伪军不支而退。共同的战斗经历使各部义勇军决定联手一致对敌。1月31日，李杜、丁超在哈市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李杜、冯占海、邢占清、赵毅各部抗日军联合成立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丁超为护路军司令。又决定自卫军和护路军联合成立司令部，选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吉林自卫军的成立，标志着吉林省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于琛澂伪军进攻哈市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直接出兵哈尔滨。日军进犯哈埠，必须经过哈长铁路线上

的重镇、赵毅第二十二旅控制的双城堡。此前，日军曾指使熙洽多方拉拢赵毅，赵毅抱定爱国信念，不为所动。于琛澂为向赵毅施加压力，还派伪军刘宝麟旅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监视赵旅的行动。赵毅率部加入自卫军后，为阻止日军从长春沿铁路北犯，决定首先除掉刘宝麟伪军。1月30日拂晓，刘部伪军遭赵毅所部与5个营的兵力突袭，溃散而逃。同日晚间，日军长谷部支队北上哈尔滨在双城宿营时，也遭到了赵毅所部的袭击，损失惨重。次日，日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向义勇军反扑，赵毅率部英勇抗击，但因伤亡过重，被迫向哈尔滨方向撤退。于是双城重镇失守，哈尔滨南大门为之洞开。

日军占领双城后，立即火速增兵哈尔滨。至2月2日，集结在哈尔滨附近的日伪军计有：日军第二师团约5个大队、骑兵1个中队、野炮兵3个中队、战车8辆、装甲自动车2辆；伪军有于琛澂率领的5个旅，即马锡麟旅、李文炳旅、刘宝麟旅、王树棠旅和李毓文旅。相比之下，防守哈尔滨的自卫军兵力则显得过于单薄。尽管如此，吉林自卫军不畏强敌，毅然决定坚守哈尔滨。自卫军的防御部署为：前敌总指挥王之佑率二十六旅邢占清部两个团、二十八旅丁超部两个团及警察总队等布防于哈尔滨西侧、南侧；赵毅的二十二旅布防于哈尔滨东南侧；李杜的二十四旅马则周团为预备队，控制道外；冯占海部担任敌后迂回任务，经阿城南下，袭击吉、长两市。防守哈埠的兵力计15 000余人。

第二章　吉林军政的混乱与吉林警备军的编成

自2月3日起，日伪军在哈市南郊开始行动。其进攻部署是：主攻部队由长谷部旅团和于琛澂伪军组成右翼纵队，其中，日军沿哈长铁路线以东进攻秦家岗一带，尔后向南岗侧背迂回，伪军经成高子车站向哈尔滨道外进攻，一部指向上号地区，其主力经王家岗直取南岗地区，与日军遥相配合，夹攻自卫军。另一路由日军步兵第十五旅团组成左翼纵队，向哈长线以西进攻，沿松花江畔经八里堡顾乡屯直扑道里。2月4日，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指挥各部日、伪军发起了总攻击，日军很快即突破了自卫军防线，翌日晚，日军攻占北满重镇哈尔滨，迫使吉林自卫军各部移地他走。与此同时，担任辅攻任务的于逆伪军在五常以南的团山子地区与自哈尔滨南下的冯占海部展开厮杀，经两昼夜激战，伪军损失2 000余人，日军伤亡200余人。此后，自卫军各部相继撤往下江地区，以依兰为根据地继续进行斗争。

2月中旬，吉林自卫军和护路军在下江地区部署防御，其具体情况为：赵毅的第二十二旅、杨质彬的骑兵第三旅、冯占海部、邢占清部及山林警备队宋希曾部驻守延寿县；丁超部护路军驻方正县；李杜、丁超率司令部及直辖部队驻依兰城；王之佑率前敌总指挥部及所属部队驻守延寿城内。2月下旬，总指挥部作出佯攻哈尔滨，进袭吉林的计划，兵分两路主动出击。左路军由冯占海率领，右路军由王之佑指挥。2月23日，自卫军前锋赵毅部已进抵哈尔滨近郊，于琛澂仓皇率军增援，日军也忙派兵堵截。在日伪军的联合进攻下，自卫军见吸引日伪军注意力的目的已达

到，遂主动撤往宾县山区。与此同时，冯占海拟率主力正要从方正向吉林进击，忽然得到前敌总指挥王之佑已和敌人达成了所谓“停火协议”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冯占海部已陷于孤立无援的窘境，被迫放弃袭击吉林的计划，撤回方正重新布防。

王之佑与日军妥协停火，是日军策划的缓兵之计。当时，于琛澂伪军已遭沉重打击，日军自身可机动利用的部队也所剩无几，欲在短期内击溃颇具实力的吉林自卫军，殊非易事。并且，关东军也知道，自卫军内部的团结也并非无懈可击，王之佑就心存自保实力、不愿掩护冯部南下的私心。因此，本庄繁指使熙洽、张景惠出面斡旋，诱王就范。受熙洽派遣，伪吉林省财政厅长孙其昌利用与王之佑同学的关系，潜至延寿对王之佑进行劝降。孙其昌将关东军的“意图”转达给王之佑，称：只要愿意与日军合作，接受改编，同意划定驻区，互不侵犯，保证每月拨给自卫军粮饷和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王之佑抗日意志本来就不坚定，在孙其昌的引诱下，即有停火之意。王之佑为了减少因主张停火而可能引起的麻烦，遂将此事先通知给了冯占海和自卫军总司令部。冯占海坚决反对议和，声称“国土不复，无和可言”[4]，但总司令部却对此抱有幻想，企图借此机会骗取给养，因而复电称：“敌如诚意，可派王之佑全权代表，前往议和。”这个批复为王之佑的降敌活动提供了合法条件，给以后自卫军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3月初，双方“磋商”仍毫无结果，而此时日军已作

好了“扫荡”自卫军的战斗部署。3月19日，日伪军分三路向自卫军发起进攻。南路由日军多门师团小川联队和于琛澂伪军两个旅组成，中路由杨秉藻等两旅伪军组成，北路由日军之一部及伪军李文炳、刘玉琨等旅组成，齐向自卫军驻地延寿和方正扑来。除北路日伪军遭冯占海部痛击而不得前进外，其他两路日伪军均突破了自卫军的防线。与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加紧诱降王之佑，企图收不战而胜之效。当日伪军逼近自卫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延寿时，于琛澂亲自给在延寿的王之佑打电话，劝王“当机立断，勿再迟疑”⑤。王之佑以“和平使者”自居，决定赴哈尔滨再行“谈判”，但在土肥原和多门二郎的威逼利诱下，王之佑遂投降了日军。他的投敌，使在延寿的自卫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除部分自卫军撤走外，大部分都在陈德才团长的促使下投降了日伪军。

3月下旬，日伪军从南北两个方面向方正地区的自卫军夹攻。一路以日军第十师团长谷部旅团为基干，配有伪军李文炳、刘玉琨、李毓文、马锡麟、辛青山等5个旅，从哈尔滨、宾县出发，经高丽帽子向桶子沟、会发恒进犯；另一路为日军第二师团开野旅团为主力，配有于琛澂所部伪军刘宝麟、王树棠、杨秉藻、李桂林等旅，经延寿向蚂蜒河东岸夹信子、宝兴隆等地进攻。3月29日，北路日伪军先头部队伪军李文炳旅首先闯入方正西南的蚂蜒河右岸地区，南路日伪军的刘宝麟等旅也逼近夹信子等地。经两日激战，刘部伪军占领了夹信子，但李部伪军却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散。3月31日，于琛澂亲自指挥伪军杨秉藻



旅、刘玉琨旅及李文炳旅向自卫军重兵防守的会发恒、桶子沟要地发起进攻，结果损失惨重，1 000余日伪军被击毙，1 000余伪军被俘。4 月 3 日，日军天野旅团长令所部野炮兵、工兵配合于琛澂伪军，向冯占海部再次发起进攻，迫使自卫军撤出战斗。冯占海率部撤至方正东南一带，邢占清、丁超等部分别向依兰撤退。

于琛澂率伪军疯狂进攻自卫军，为日军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 年 3 月伪国成立后，于琛澂所率的吉林讨匪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由于琛澂以“北满护路军总司令”的头衔指挥，一部分归吉林警备军司令吉兴统领，继续“讨伐”撤往下江地区的自卫军各部。

注释：

①《吉兴笔供》1954 年 4 月 20 日

②《长春文史资料》22 辑《伪将军府上将于琛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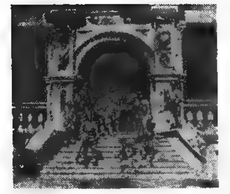
③《伪满史料丛书》126 页

④《血染白山黑水记》45 页

⑤《吉林抗日自卫义勇军的兴起与瓦解》48 页

第三章　黑龙江军政的混乱与黑龙江省警备军的编成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东北军的溃散



张海鹏已65岁，原系绿林出身，曾随张作霖南征北战多载，自以为功莫大焉，常以元老自居。但从民国以后，张作霖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由督军而安国军大元帅，堪称功名震世，可张海鹏却屈居于洮辽镇守使之位，心中常愤懑不平。1928年张作霖和黑省督军吴俊升殒命于皇姑屯，张海鹏自度黑省遗缺非他莫属，不料张学良竟委任万福麟为黑省督办，对此，张海鹏衔恨愈深。张海鹏这种贪图名利的小人心理早已为日人所知悉，事变发生后，关东军立刻派人潜往洮辽镇守使署所在地洮南晤见张海鹏，许以黑省督办及武器粮秣等条件，诱其投降。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陲，在近代，它的版图包括

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地区，外隔黑龙江与前苏联接壤，内以松花江为界与吉林省毗邻，省会设于齐齐哈尔。该省农业、矿产、森林等资源均称丰富，但因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气候奇寒，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1928 年东北“易帜”后，黑龙江省军政两务分由万福麟、常荫槐主持，而这些人的军阀政客本色依然如旧，毫无新意，只是竭尽所能为一己私利投机钻营，不思进取。1929 年初飞扬跋扈的常荫槐被张学良处决后，黑省军政统由万福麟执掌，万福麟遂成了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

万福麟隶下的黑省东北军也分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两部分，不过黑省部队的总兵员不仅远远不及辽吉两省，而且作为精锐的国防军亦少之尤甚，仅有一个骑兵旅及两个步兵旅。1931 年 7 月在讨伐石友三的战争中，张学良令万福麟率国防步兵第二十九旅和第三十旅入关，黑龙江省的防务更加空虚。当时驻留黑龙江省东北军的情况如下表：

队　号	兵　力	主　官	驻　地
独立骑兵第八旅	3 509	程志远	满州里
炮兵第二十团	2 072	朴炳珊	泰安镇
省防步兵第一旅	3 574	张殿九	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二旅	3 985	苏炳文	海拉尔
省防步兵第三旅	3 652	马占山	黑河
省防骑兵第一旅	3 103	吴松林	呼兰
黑龙江省卫队团		徐宝珍	龙江
工兵营		刘润川	龙江
辎重兵营	—	孟宪德	龙江

此外，黑省还有由军队改编成的7个骑兵保安大队，每个大队约等于1个骑兵团，由保甲总办公署统辖，归黑龙江警备处长兼管，总人数约5 000人。各县均设有保安团，属地方武装团体，也归警务处长管辖，而隶属于黑省主席之下。这些地方武装加上国防军及省防军，全省兵力约50 000人，但正规军仅20 000多人，且驻防分散，这对于地域广阔的黑省来说，防守显然过于单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辽、吉两省很快失陷，日本关东军旋即图谋进取黑省。因万福麟其时远在北平，且又有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之掣肘，黑省军政两界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惊慌失措，顿呈混乱之势。关东军悉此情形，愈大肆制造图黑气氛，意在恫吓，增加纷扰，致使黑省上下人心惶惶，避难者络绎不绝。为稳住黑省局势，9月下旬，万福麟电令黑省，由警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管理黑省军事，参谋长谢珂副之。但窦氏接电后既不关心也不负责，一切军事事宜均由谢珂代理。

日军为北犯黑龙江虽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准备，但考虑到黑省处在关东军的势力范围之外，且与潜在之敌前苏联利益攸关，因而关东军尚不敢轻举妄动，贸然侵入北满。不过关东军攫取黑省的方针既已确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它决定继续收买汉奸充当进军黑省的鹰犬，这样既可坐收渔人之利，又能缓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可谓一箭双雕之举。在物色愿为日本效命的汉奸人选中，关东军首先看中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

张海鹏其时已65岁，原系绿林出身，曾随张作霖南征



北战多载，自以为功莫大焉，常以元老自居。但从民国以后，张作霖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由督军而安国军大元帅，堪称功名震世，可张海鹏却屈居于洮辽镇守使之位，心中常愤懑不平。1928年张作霖和黑省督军吴俊升殒命于皇姑屯，张海鹏自度黑省遗缺非他莫属，不料张学良竟委任万福麟为黑省督办，对此，张海鹏衔恨愈深。张海鹏这种贪图名利的小人心理早已为日人所知悉，事变发生后，关东军立刻派人潜往洮辽镇守使署所在地洮南晤见张海鹏，许以黑省督办及武器粮秣等条件，诱其投降。张海鹏对黑省督办心仪已久，既然张作霖父子未能克遂其心愿，如今东北大势又尽为关东军掌握，因而他决意率众附逆，以成未竟之虚名。1931年10月1日，张遂宣布独立，自封“东北保安边防总司令”，公开投敌叛国。此后，他即在日本关东军的授意下积极整军备战，准备进犯黑省。

张海鹏的投敌，其实是日军北犯黑龙江省的前兆，黑省军政要人皆惊愕不已，难有良策。省府曾派员赴洮南探听张海鹏的真正动向，确知张海鹏有图占黑省的野心，遂匆忙做临时的军事部署。9月下旬，黑省军署电海拉尔、满州里、黑河及黑龙江省东部各县驻军积极准备补充，随时听候调遣：并先调程志远旅朱凤阳团由中东路小蒿子站进驻泰安，对洮南方面警戒，又派工兵1连驻守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修筑北岸阵地的据点工事。10月初，再调驻拜泉的吴拉林旅开至龙江随时待命。10月9日，万福麟电令马占山代理黑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黑省军事部署方渐入正轨。10月中旬，

谢珂饬军需处发饷1个月，借支1个月，安置家眷，并令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带领卫队团，工兵营2连，辎重兵1连、炮兵1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此外，谢珂又以军署名义电令马占山、苏炳文两旅各抽调步兵1团开到昂昂溪，令满州里程志远旅准备补充待命，另电令北满护路军司令部将护路部队急速重新布置，以便于机动使用。

张海鹏闻黑省主席为马占山所代，恼羞成怒，遂于10月13日令少将徐景隆率3团兵力，北犯黑龙江省。张逆为掩人耳目，还煞有介事地发表了《告民众书》，谎称："天不悔祸，灾降沈垣，辽属各县，波及余殃，本人坐镇洮辽十有余载，素以保境安民谊侨民为职责。此次辖境各县，几经曲予交涉，得以未遭蹂躏，而庆安全。故十县县长，回旗蒙王，征求民意，佥同表决，推戴本人为蒙边督办之职，以资震慑而保治安。"[①]随后他即率领部众沿洮昂路浩荡北进，自以为人主黑省已指日可待了。但当张逆前锋进至江桥附近时，突遭黑省守军顽强反击，逆将徐景隆也触雷毙命，余部纷作鸟兽散，张海鹏被迫停止前进。此后，张海鹏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收拢残兵败将，大肆招募汉奸、胡匪，以图再犯黑省。同时，他还装作悔过认罪，致电张学良谓："此次事变，系受日人压迫，不得已拟赴黑省暂避，嗣得同意，方始出兵，不料行至江桥，遽遭于旅截击，现在整队待命，仰祈指示屯驻地点。至本人决无其他野心。"[②]不过，急不可耐的关东军只靠张海鹏叛军攻取黑省殊非易事，于是图穷匕现，决定亲自上阵，攻击的目标首先指向齐齐哈尔。

1931 年 10 月 20 日，自黑河辗转抵达齐齐哈尔的马占山正式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之职。日本关东军乘马占山就职伊始立足未稳之机，以黑省守军破坏了与日本有借贷关系的洮昂路上的嫩江铁桥为借口，派兵进占四（平）洮（南）全线，企图以武力威胁追使马占山屈服。鉴于此，马占山为表明态度，针锋相对地发表了《抵抗宣言》，内称："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之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3]稍后，为振刷全体军政人员之精神，马占山又郑重地发出通告："当此国难方殷，匹夫有责。举凡在职人员各振刷精神，尽心务职，对于应办各项事件必须逐日清理，无须停顿，倘仍如前泄沓不知奋勉，则是自甘放弃玩忽功令，一经查出，严惩不贷。"[4]与此同时，马占山还陆续调兵加强嫩江桥一带的防务。他先后调朴炳珊炮兵团，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步兵第二旅吴德霖团，步兵第三旅徐青山团，骑兵第二旅两个团，以及由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改编的暂编步兵第一旅，开赴江桥防线。这样，江桥附近的黑省守军总兵力已有步兵 7 个团，骑兵 7 个团，炮兵 1 个团及 1 个营，加上工兵辎重兵等，约13 000人。马占山把这些部队部署成 3 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嫩江桥防线，由徐宝珍团长任指挥；第二道防线是大兴防线，由吴松林旅长任指挥；第三道防线是三间房防线，由苑崇谷旅长任指挥。

在马占山动员黑省军民准备抵抗日伪军进攻之时，关东军多次派代表刁难马占山，欲为出兵制造借口。10 月 27

日，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奉命送给黑省政府一份通知，谓："驻奉天关东军司令官要求黑龙江省政府，迅速修复嫩江桥，限期为一周，第一天从昭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第七天为十一月三日。在此期间，黑龙江省政府不动工或虽动工但到期未能完成时，以后则由日方修理，那时可视情况对工程进行实力保护。"⑤这无疑是关东军进攻黑省的信号。就连林义秀自己也承认："由于黑龙江省军对铁道的破坏，从国际的观点来看，给我造成了出兵的天赐良机，故我军在援助保护修理的名义下出兵齐齐哈尔，实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⑥ 29 日，日驻黑省领事清水八百一又送交省府一份通牒，内称："洮昂路系满铁借款铁路，且于交通运输经济上有重大关系，如长此放任，华方的自行修理桥梁认为绝对不可能。故与有密切关系的满铁立即派人着手修理，希望黑省军队断勿妨碍，并予以适当的保护。倘妨碍修理，则日本方面将予以适当的措施。"⑦在蓄意扩大事端的同时，日本关东军于 10 月 30 日制订了"关于修复嫩江桥的要领和为修理嫩江桥的护卫要领"⑧，并命令以第二师团一部组成嫩江支队，任命第十六步兵联队长滨本喜三郎为该支队长，指挥步兵第十六联队、步兵山炮队、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工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无线电一班和空军第八中队。此外，关东军还令一小队日军与张海鹏伪军作为先头部队，沿洮昂路向嫩江桥出发。

11 月 2 日，林义秀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谓："一、以后不得在战术上利用嫩江桥。二、在十一月四日中午十二时以前，两军（指黑省守

军和张逆伪军——引者注）撤至距桥梁十公里处，在修桥任务未完成前不得进入十公里之内。修复完成之时间，待估计后立即告知。对不答应上述要求者，视为对日军怀有敌意，当依法诉诸武力，特此警告。”[9]马占山接此通牒的当日，立即召集军政绅商各界代表在省府开会，研究对策。会上，以省府委员赵仲仁为首的劣绅提出：“咸以库空如洗，兵无利器，请马氏顾全地方，欢迎张海鹏。”[10]马占山抗日决心早已下定，闻此言后，拂手拍案厉声曰：“吾奉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且吾出身绿林，位重专闻，亦所惜一死……”[11]继之卫队团团长徐宝珍亦持枪疾呼：“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最后，“抵抗之议遂定。”[12]为激励前线将士，马占山晓谕抗战官兵，现在“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之，不战亦之。与其不战而之，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13]并谓“不抵抗主义，无殊拱手让人，若积极抵抗，尽我全力，尚有几希挽回之望。”[14]各级官兵激于义愤，均“视死如归”，“乐为之用”[15]。

11月3日，小股日军及百余名“满铁工人”在铁甲车、飞机的掩护下实行武力掩护修桥。中国军队为了避免与日军冲突，即命守江桥前沿的驻军撤退15华里的大兴站本部驻军处。可当省防军撤退时，日机竟投弹伤中国士兵9名。又于夜间日兵百余名偷渡过江至黑省守军前方地带，施以猛烈射击，击伤战士7名。次日午后，500名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守桥的黑省军队展开攻击，中国官兵忍无可忍，被迫予以正当的自卫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正式开始。

面对蜂拥而上的日军，江桥阵地上的徐宝珍部毫无惧

色，沉着迎战，“血战至午后八时，江北岸无敌踪，惟见血肉模糊，遗尸四百余具，遗弃武器几无隙地。”[16]黑省守军亦“伤亡三百余人。”翌日晨，日军以炮百余门，飞机20余架，对扼守江岸的吴松林旅狂轰滥炸，掩护日军嫩江支队从中路、张海鹏逆军从左右两路强渡嫩江。吴松林旅凭地势之利，殊死抵抗，射杀日伪军甚众。战至中午，吴旅伤亡过重，又后继乏援，不得已乃分别撤出左右两翼阵地。日伪军强渡嫩江得手，占领了黑省守军的嫩江防地，继而又向黑省军队第二道防线即大兴阵地发起进攻。在战事最惨烈时刻，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令吴、徐两团从正面坚守阵地，并急调骑兵第一旅萨力布团从两翼包抄日军。由于“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之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直迨日暮，仅是保持其原有阵地。”[17]同时，马占山还派兵将张逆伪军包围在漠河河套一带予以痛歼，夺回了被日伪军占领的阵地。是役，黑省守军伤亡200余人[18]，敌军死伤数目，据日方发表，“死者一百六十七人，伤六百余名，张逆部死伤七百余名。”[19]

不可一世的日军连续两次在嫩江桥被黑省守军击败，令关东军司令部大为震惊。5日上午，关东军下达命令，将大约2个大队的步兵和3个中队的炮兵火速派往嫩江。这样，连同嫩江支队，南端铁道守备队在内，日军已有近万名的兵力。6日晨3时左右，“日军四千余人，黄衣铜帽，大炮四十余门，飞机七、八架，铁甲车三列”[20]，再次强行渡江攻击黑军大兴防地。马占山军自早至晚，竟日奋战，但终因伤亡过重，运输断绝而被迫撤至三间房红旗营子整



顿补充。时值张殿九率步兵一旅赶至，马占山遂率军反击，击毙日伪军600余人，迫敌军渡江而逃。

7月，关东军司令部又令长谷旅团、天野旅因悉数开往江桥前线，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黑省守军的抵抗意志。于是，江桥之战进入了黑省守军与关东军主力直接拼杀的关键阶段。后由于黑省守军连日激战，减员严重，且江桥、大兴阵地悉被日军炮火摧毁，无险可据，马占山遂决定放弃嫩江桥、大兴阵地，将部队撤至距江桥50里的三间房阵地。日军因遭受重创，暂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只得缓进待援，江桥战事至此缓和下来。

马占山将部队撤至三间房阵地后，立即重新部署防御：确定从大兴车站以北到三间房为正面阵地，由苑崇谷的暂编步兵第一旅、步兵第三旅李少峰团、朴炳珊炮兵团、徐宝珍卫队团防守，兵力约3 000人；左翼为程志远骑兵第二旅，右翼为骑兵第一旅吴松林两个团，两翼兵力2 000人左右。总兵力共为5 000人。同时，马占山还通电全国，阐发誓死抵抗之志，吁请各界共挽狂澜于既倒，略谓：“占山受国家倚界之深，人民寄托之重，目睹辽吉沦胥，江省危如累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寸土之地沦于异族。惟有本我初衷，相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务恳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感慨之至。”[21]全国各地纷起声援，“贺电如雪片飞来。我军虽放弃江桥阵地，而全军士气仍极振奋。”[22]

江桥战事消沉数日，至11月12日又重新沸起。12日

午时，林义秀奉本庄繁之命交给马占山一份通告，内提3点要求："1、马占山下野；2、黑军由省垣撤退；3、日军部队为保证洮昂路的安全，将向洮昂路昂昂溪行动，并限十二日夜十二时以前回答。"[23]12日晚，马占山答复说："1、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2、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自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3、昂昂溪车站为中国与前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前，碍难照办，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24]其实，在马占山作此答复之前，日军即已向黑省守军阵地发动了数次试探性进攻，均被黑军击退。在保持军事进攻的同时，15日，本庄繁奉日本陆军省陆相南次之命，再次向马占山提出3点要求，诡称"1、马军向北撤至齐齐哈尔，凡此次集中于齐齐哈尔及昂昂溪兵队，须退回原驻地；2、马军不得驻扎中东路以南；3、洮昂路局管理，马不得妨碍，否则日军即时采取必要而有效之手段。"[25]马占山丝毫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回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关东军司令部见政治讹诈毫不奏效，遂将所余部队悉数调往前线，决心与马占山军一决最后之雌雄。

至11月16日，号称精锐能战的日军第二师团全部赶至黑省。这样，麇集于嫩江附近的日军，据关东军参谋部第一六四号电称，"步兵约十大队，骑兵二中队，野炮兵六中队，重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总兵力达13 000余人。

17 日拂晓，11 000余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 3 路向三间房黑省守军阵地发起强攻。对这次战斗，1931 年 12 月 6 日的《滨江时报》有如下之记载：

“自（17 日）十时开火，战事即激烈异常。我军极力抵御，据壕以抗，敌骑兵大队猛扑至十余次之多，皆以我迫击炮、机关枪捍卫得法，将敌击退。三时后，敌之坦克车已驶进我战壕，掩护步兵机关枪队，弹发如雨，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战壕多为冲塌。各团、营队，为机枪炮火所逼，断为数十处。同时，日骑兵自左后方包围而至，我军不能再立足战壑，四时后乃出壑应战，但队伍已散，马匹大半炸死，而涂全胜团长，犹奋勇喊杀，率所部骑兵两连，步兵一队，冲锋陷阵者五次之多，敌骑为避遁者数次，相至早五时许，我军既无援应，弹药且将告罄，炮管已发热，不可复用。日军飞机七架，又复自空间攻，投重量炸弹数百枚。我士兵至此殆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且战且向红旗营子退却，以期得该方面之接应，协力反攻。不意该方步兵亦以正面紧迫驰往应援。至是，不得已由涂全胜率残部七百余，冲出火线，于十时许退却昂昂溪，扼铁路以拒敌。日飞机及骑炮兵仍来猛攻，饮弹东铁路轨者极多，相持至午刻，马占山主席自省垣驰到，激励将士，亲率手枪队前身，猛力反攻，一阵力击，竟于午后一时许，击退敌军，二时半仍回原防，侧方战事至是告毕。”

“正面之大兴站、新立屯、三间房战事，系夜十时四十分发生。日军即以四千众来犯，先以骑兵扰我左右翼，以步炮兵攻我三间房正面，初意在牵制，使我不得赴援侧面，

故攻击尚不猛烈。至十八日晨二时后，乃增加队伍，以坦克车八辆，炮三十余门，肆力猛击。我军手射炮仅三门，分别向其坦克车抵御，敌之利稍为之却。但枪炮分施，压迫渐紧，我炮力不能胜远，士兵仅步枪迎据，御抗之力，自然薄弱。三时二十分，新立屯阵线，首先被击破。该方军队退集于大兴站，由炮兵协助，猛攻两次，于四时许复夺回阵地。但未久达官屯防线又遭敌军包围，骑兵张旅（殿九部）被围壕内，势已濒危，由吴松林部协同苑旅一部往救，五时解围。自是以还已入危境，阵地旋失旋夺还者数次之多，支拒至十时后，日飞机十二架，坦克车十二辆来攻，同时朝鲜军一联队复至，联合猛攻……”黑省守军终于不支，三间房、昂昂溪阵地全线动摇，马占山被迫于18日下午6日15分下令各部撤出阵地，退保省垣。日军立即尾随而至，齐齐哈尔岌岌可危。鉴于黑军连续苦战，疲惫不堪，亟待休整，马占山为保存实力，遂决定放弃齐齐哈尔，于19日拂晓引部北上。19日晚日军主力侵入齐齐哈尔，“城内街上满布日军，张贴各种标语，路绝行人，凄惨万状，惟见日旗满街飘扬。”[26]历时15天的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1931年11月19日晨4时，马占山率黑省一部分抗战部队及省府军政两署人员沿齐克路北退，21日抵达克山。江桥一役，黑省军队虽遭受严重损失，但仍保有相当力量，自前线撤下来的兵力，苑崇谷旅尚有4 000余人，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尚有700人，步兵第二旅吴德霖团尚有900余人，步兵第三旅尚有1 000人，徐宝珍卫队团尚有400人，骑步第二旅尚有4 000余人，加上骑兵一旅、炮兵团等各一

部，总计约11 000余人。其中除孙鸿裕团、吴德霖团归还步兵第一、第二旅原建制回原驻防地外，各部均分驻于克山、拜泉、海伦一带[27]。为防备日军再犯，22日，马占山在克山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防御。到会的有：谢珂、程志远、吴松林、苑崇谷、朴炳珊、徐宝珍、金奎璧等将领。会议确定的各部防御区域分别为：程志远骑兵旅的涂全胜团、朱凤阳团、周作霖团和吴松林旅的王克镇团驻防于齐克路的塔哈乐至拜泉一带；此外，吴松林旅的沙力布团和刘斌团作为总预备队驻在克山，由程志远任骑兵总指挥，吴松林副之；苑崇谷步兵旅、徐宝珍卫队因驻于鳌龙沟至拜泉一带，由苑崇谷任步兵总指挥，徐宝珍副之；炮兵团、工兵及辎重部队驻于海伦，由海伦警备司令朴炳珊统辖。会议甫毕，日军3 000余人即于当日晚沿齐克路北犯，后遭抗日军民突袭而狼狈逃回省城，未再出动。

此时，关东军因江桥之战伤亡较重，又急于调集主力南图锦州，并且也知“海伦地近山林，人亦强悍”[28]，所以停止了对马占山军的攻击。

11月23日，黑龙江省政府随马占山移驻海伦。为此，马占山致电张学良称：“晨率军政两署人员及党部，暂在海伦办公。各部队伍，亦积极撤退，分驻海伦、拜泉、克山一带，听候命令。”[29]并向黑省各县致电通报：“已在海伦成立省政府，今后关于一切呈报及陈述事件，均直指向海伦本省政府投送，现齐域已被日军占领，一切组织均为不法组织，一切命令与公事均无效。”[30]海伦省政府虽草创伊始，条件粗陋，困难重重，但司职人员均尽心尽责，“宵旰尤

勤，不眠不休”[31]，抗战热情极高。各地人民感奋于黑省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通过各种形式援助海伦省政府。自江桥抗战时马占山即着手组织黑省各县武装民团，至12月初已达6万余人。马占山深感民心可用，遂于12月5日与谢珂签署发布命令，任命南廷芳为克山、克东、德都3县保卫团上校总队长；陆春薄为林甸、安达、依安、明水4县保卫团上校总队长；才洪猷为呼兰、庆城、巴彦、兰西4县保卫团上校总队长[32]。这些保卫团后来大都加入了江省抗日救国军，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马占山在海伦创建抗日政府后，日本关东军深知马占山率领的东北军仍有很强的战斗力，为减少自身伤亡计，它遂将此前的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企图通过不战而胜黑省之兵。1931年11月31日，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即致函马占山，内称：“1、马占山对于克山、泰安镇的中国军队如能劝说使之投降时，可通知新井顾问。2、马占山如确定回省，日期亦可通知新井顾问，林少佐亲往迎接至泰安镇亦可；3、马占山生命由林少佐担保，绝无意外情事；4、马占山准带卫队八十名入城。”[33]马占山对此函并未置理，因此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决定亲赴海伦游说。12月6日板垣至哈埠与张景惠、赵仲仁密谋后，翌日即率一行日人及驻哈各报馆记者奔赴海伦。马占山闻讯，初不应允，后经赵仲仁再三说和，方答应晤见。面见马占山后，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的名义首先致词。他先假惺惺地提出两项要求，谓：“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



持东亚和平；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意在使马占山摒弃前嫌，消除敌意。继而又利诱说：“倘能立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则敝国司令官为本以前救济东北民众之意，决仍将黑省军权交由贵主席担任”；最后则威胁道：“敝国关东军已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许东北任何处有抗日举动之继续存在。”[34]马占山不亢不卑，回答得体，未给板垣留下任何把柄。不过马占山和板垣会晤这件事本身即造成了不良影响，致使外界猜疑不断，谣言四起。

1932 年 1 月 3 日，日军攻陷锦州后，旋即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北满，以攫取东北最后一座大城市哈尔滨。如哈尔滨落入敌手，马占山军势必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随着哈埠形势日趋紧张，马占山数电南京和北京，“伏乞早定大计，速派援军，趁此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沪哈迭获胜利，合力拒敌，收复国土，在此一举。时机迫切，不可再误”[35]。但这些呼吁和请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马占山深为此忧虑。1 月 13 日，马占山致电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略谓“现锦州已失，榆关以东已非我有，乃日人乘其余胜，来海要挟威迫，百计应付，难其避免。复查辽宁臧主席，业经就职；哈尔滨张长官，已通电兼领江省政府主席；江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危险。占山以身许国，本无所顾，第念人民涂炭，为堪虑百。唯有相机应付，情形如何，结果难料，惟恳速即定策，设法交涉，以拯危亡。若久无办法，则东省永无恢复之望矣。”[36]此时，马占山的思想已陷入极端矛盾之中。一方面，他领导海伦政府继续为抗

日积极准备，声言“惟有谨率我黑省民众从事自救，以身存在，誓不屈服。夫人孰不死，与其奴颜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国卫民而早死，此中去从，已具决心”[37]；另一方面，他又对抗战前途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缺乏当机立断的勇气和魄力，而是与关东军代表及汉奸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图自保。继 12 月 7 日海伦会晤后，12 月 11 日，马占山乘车过江，与张景惠晤于哈埠附近的松蒲镇。此次会晤内容极密，会后，马占山对军署参谋长谢珂说：“听日本人说，如我愿回省垣，全省军事还交给我，并给我们军队换新枪 10 万枝，到那时，我们有了力量，愿抗日也不晚。现在锦州也不能保了，张学良永远回不到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不向日军冲突，就有办法。”[38]但由于大批将领仍力主抗日，马占山遂顺从众意，仍表示继续抗日，决不屈服。

但张景惠、赵仲仁等巨奸在关东军的幕后指使下，极力拉马占山下水。“张、马固然有旧”，赵仲仁亦“与马接近”，关东军利用他们“对马进行软化，极为相宜”。并且，“马自到海伦以来，见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形，内心矛盾很多，主要是想名利双保。他虽然加强扩军，只是为了挟此以自重，而抗日情绪则逐渐消沉下去。”[39] 1932 年 1 月 6 日，马占山在汉奸诱惑下再度赴哈，与张景惠会晤。张景惠将日人安排的黑省伪政权透露给马占山，即张本人暂兼黑省主席，并不实任，则由吉祥暂代，主席之位实际正虚位以待马占山。马占山终于未能将誓死救亡的高风亮节贯彻始终，遂接受了这个伪职。1 月 16 日，马占山派程旅涂全胜、

朱凤阳两团各一营开赴齐齐哈尔，22日入驻省城。2月16日，马占山赴沈，参加臧式毅等倡议的所谓“联省自治”会议，到后受日人胁迫，变为接受“建国会议”。在按关东军的意愿炮制出的《建国宣言》上，马占山心怀疑虑，既没有在“宣言”上签字，也没有公开反对。18日马回哈转赴海伦，2月23日带卫队200名和省军政两署官员去齐齐哈尔。24日上午，马占山正式就任黑龙江省伪主席之职。

马占山公开附逆，对黑省的抗战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他虽通电辩解曰：“占山不才，谬蒙国人所许，几欲决然舍去，以图自爱自好，惟为部曲所不容，人民所挽阻，伏念个人之虚誉，无足轻重，人民之灾害，如水益涤。……现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代。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疚引退，以谢国人”[40]，但是，他这种行为却使“黑省昔日共同抗战结成的团体陷于分化与瓦解，实为可惜。”[41]马占山就任伪职前后，黑省东北军的许多将领和战士对抗日失去了信心而自寻出路，有的只身进关，有的投奔他处，有的单独走上了抗日道路，余者则由马占山以“黑龙江省警备司令”的名义统领，蜕变成了伪军。至此，在江桥抗战中声名远扬的黑省东北军已不复存在，最终成了马占山对日伪妥协的牺牲品。

第二节　伪黑龙江警备军编成和呼伦贝尔讨伐



4月1日凌晨，马占山以赴东荒整饬军纪为由，带手枪队300余人，携巨额军费，乘汽车自北门拔关而出，直趋黑河。为防日军追击，途经拜泉时，马占山电告林义秀："占山兹以拜泉视察，防军有哗变之消息，为抚慰防务起见，必须亲往一行，迟三、二日，由哈尔滨绕道回省，临行匆促，未及亲辞，殊甚歉仄，两日之内，即可旋省。所有军民两政，暂由参谋长张文铸、秘书长董继武分别代行。至省城秩序，著骑兵第一旅旅长程志远负责维持。"日人因此未加怀疑，待其发觉事情有变后，马占山已于4月7日抵达黑河，宣布重新抗日了。

1932年3月伪满州国成立后，日伪任马占山为军政部总长，并兼领伪黑龙江省省长及警备司令之职。但马占山并未亲赴沈阳任伪军政部总长，而是派原黑省军署国防处参谋长王静修以次长身份赴沈代行其职，他自己却留在齐齐哈尔专力于黑省伪职。在任伪职期间，马占山紧抓军权，

积极整顿部属。伪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建立后，马占山任司令官，日人林义秀任军事顾问，张文铸任参谋长。其手下以前的重要将领，除谢珂、苑崇谷不愿同流合污愤而出走外，大多数仍集于马占山周围。黑省警备司令部隶下的兵力，基本上是原黑省东北军的原班人马，计有：伪混成第一旅（苏炳文，驻海拉尔）、伪混成第二旅（张殿九，驻扎兰屯），伪混成第三旅（徐景德，驻海伦），伪混成第四旅（徐宝珍，驻克山）、伪混成第五旅（朴炳珊，驻拜泉）、伪骑兵第一旅（王克镇，驻呼兰）、伪骑兵第二旅（程志远，驻齐齐哈尔），伪骑兵第五十五团（石兰斌，驻通北），共约16 000人左右。[42]

马占山虽身兼伪国数职，表面权力很大，但他处处受日人掣肘，渐生不堪忍受之感。关东军司令部“要求马占山对黑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凡重要法令、规章制度、用人、预算等，须得日本顾问同意方能实行。并派日人充任总务、警务两厅长。”[43]同时，日人还胁迫马占山出卖黑省铁路、银行、航空等项权益，并散布谣言说马氏已予应允。“马占山虽身陷囫囵，但民族良知尚存，从未签署任何条约”[44]，由此其寄人篱下受制于人的反感情绪益愈浓烈。此外，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曾许诺马占山，待其返回省城就任伪职后，日军随即撤出省城。而事实是，日军非但毫无撤兵之举，反而密布日军于大街小巷，严加监控，致使黑省官兵屡与之发生冲突，气氛非常紧张。凡此种种，令马占山始悟到所谓“联省自治”者，无非是一场骗局而已。

更使马占山心神不宁的是，自他与日人妥协以来，国人纷起谴责，严厉指斥其沽名钓誉的变节行为，更有人致电索要江桥抗战时的捐款，甚至上海一家烟草公司在江桥抗战时出品的“马占山牌”香烟也停止出售，以示抗议，一时间弄得他声名狼藉，无地自容。在外人欺凌，同胞责难的双重压力下，马占山“颇有大江东去之感，名誉、地位、权力、财产均将失去，开始觉悟到上当受骗，坐卧不宁，惶惶焉不可终日”[45]，于是遂生反正之心。1932 年 3 月末，马占山闻国联调查团已到中国，不日即可到东北，遂决心秘密布置出走计划。恰于此时，原黑龙江省税捐局长韩立如携张学良令潜回齐齐哈尔，力劝马占山迷途知返，匡扶正义。马占山遂决定挣脱羁绊，重整旗鼓，再行抗战。

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准备，4 月 1 日凌晨，马占山以赴东荒整饬军纪为由，带手枪队 300 余人，携巨额军费，乘汽车自北门拔关而出，直趋黑河。为防日军追击，途经拜泉时，马占山电告林义秀：“占山兹以拜泉视察，防军有哗变之消息，为抚慰防务起见，必须亲往一行，迟三、二日，由哈尔滨绕道回省，临行匆促，未及亲辞，殊甚歉仄，两日之内，即可旋省。所有军民两政，暂由参谋长张文铸、秘书长董继武分别代行，至省城秩序，著骑兵第一旅旅长程志远负责维持。”[46]日人因此未加怀疑，待其发觉事情有变后，马占山已于4 月 7 日抵达黑河，宣布重新抗日了。

马占山反正出走，使黑龙江省伪府陷于群奸无首的混乱状态。为稳住省城局势，4 月 7 日，关东军司令部任命程志远为黑龙江省伪警备司令官。4 月末，伪国宣布重建黑省

伪政，以程志远暂代黑龙江伪省长兼财政厅长，日人春田为参事顾问，马景桂为总务厅长，刘廷选为民政厅长，韩云阶为实业厅长，窦联芳为警务厅长；各厅均派日人充任参事顾问，实掌其权。这群丑类为个人名利地位，苟且偷生，甘心附逆，竟不为马占山重举义旗所动，殊为卑鄙。

马占山返抵黑河后，除4月9日以反正之事电告张学良外，又于12日致电国联，内云："日本假借民众自决之名义，用绑匪手段强劫逊帝溥仪自天津挟赴旅顺，又威胁利诱东三省之官吏，演成一幕滑稽剧。""占山诸以窥得暴日之肺腑、伪国之真相，以贡献于吾维持世界和平、主张国际公道当世唯一机关之贵会，以资参考。"[17]冀使国际社会明白日寇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真相。此后，马占山即着手组织黑省政府及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公署，积极整军备战，以雪国耻。

此时，黑省抗日军的成分已发生很大变化。原黑省东北军随马占山妥协而附逆的有：程志远、王克镇、冯广友等部，它们已被编入伪黑龙江省警备军。苏炳文、张殿九两旅据守呼伦贝尔地区，态度尚不明朗。响应马占山重新抗日的原黑省军，计有驻讷河、墨尔根一带的徐宝珍步兵第二旅；驻黑河的徐景德步兵第三旅；驻青岗、绥化一带的吴松林骑兵第一旅；驻呼兰、绥化一带的郃斌山骑兵第二旅；驻克东一带的金奎璧炮兵第二十团[18]；以及由苑崇谷部改编成的朴炳珊步兵旅和由原骑兵第一旅第二团扩建成的邓文骑兵第四旅；兵力近万人左右。而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也纷纷走上抗日疆场，已呈风起云涌之

势。为适应这一形势，马占山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马自任总司令，统一指挥黑省政府军和其他抗日武装。5月4日，马占山“发表了编组军队的命令，集结兵力于克山及呼海铁路沿线，与反吉林军相呼应，企图夺回哈尔滨。”[49]

鉴于黑省抗日势力骤然兴起，5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下令第十师团及第十四师团迅速在哈尔滨集结兵力。24日，本庄繁赴哈尔滨部署对黑龙江省作战，命令：“一、步兵第二十八旅团长指挥的部队要尽快向绥化方向追击。二、第十师团要适时把主力向哈尔滨移动接替第十四师团，负责哈尔滨附近的警备。三、第十四师团要立即实施呼海铁路方面作战，扫荡敌人。四、关东军飞行队要协助两个师团特别是第十四师团的作战。”[50]在此前后，关东军司令部还要求伪黑龙江警备军协助作战，伪司令部遂临时以张文铸部编成第一支队，贾金铭部编成第二支队，王克镇部编成第三支队。5月24日晚，第十四师团长松本直亮命令第二十七旅团长平松少将于次日向哈尔滨西北的对青山一带前进，会合黑省伪军进攻抗日军李海青部，令步兵第二十八旅团向绥化进击吴松林部，尔后自率师团主力，沿呼海铁路向海伦挺进。

此前不久，即5月15日，马占山率卫队200余人从黑河出发，直赴海伦，28日抵达目的地。此时，呼兰、绥化已告失守，救国军大部主力已相继向海伦集结。日军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八旅团和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在呼兰集中完毕后，随即沿呼海铁路向海伦推进。5月30日，日军向

海伦发动攻击，6月1日方占领该地，马占山率救国军北撤。同时，驻齐齐哈尔日军骑兵第一旅团沿齐克铁路向克山推进，6月下旬占领了克山、拜泉等地。6月28日，马占山率部到达兰西县十间房，适逢李海青部义勇军8 000余众到达此地，马占山遂向李面授机宜："本人将东行，联合丁（超）、李（杜）两位司令，会攻哈尔滨，你部分驻中东路两侧，破坏中东路、洮昂路交通，遇有机会即进攻省城。"[51] 此后，李海青、邓文、吴松林部抗日救国军即活跃于呼海路、齐克路、中东路附近，不死守，不攻坚，灵活机动，或扰乱，或破坏，或断其交通，或袭敌不备，使日伪军时时不得安宁，穷于应付，黑省抗日救国军的影响日渐扩大。

6月末，马占山自兰西出发，开始东行去联合吉林自卫军。日伪发觉马占山东行的意图后，派军日夜跟踪阻击。马占山且战且走，7日初越过呼海路行抵松花江畔，因日军沿江封锁，东行受阻，遂折而北上。从7月中旬起，马占山所部与日军重兵遭遇于呼海路以东的森林地带，双方遂展开了激烈的迂回战。此次"战事之激烈，较去年江桥之役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役日寇死伤约千余人，遗尸遍野"[52]，而义勇军也伤亡惨重。这次战斗后，马占山率余部辗转冲杀，但始终冲不破敌军的围追堵截。7月下旬，义勇军在安图镇一带的深山老林中陷于日军重围。马占山率部奋勇突围，大部战士非死即散。最后，马占山自率一部轻骑向南奔去，另一部由少将参谋韩述彭携带马占山私人物品及关防印信望北而走，行至罗圈店不幸遭日军包围，结果全部牺牲。韩述彭因体貌与马占山相似，且身带马占山私人印

章一枚，日军遂误认是马占山，所以停止了追击。马占山得以幸免，率四十余人避入深山。9月9日，马占山一行到达龙门后，即电告四方，揭露日伪宣传他战亡的消息。日军闻知马占山未死，即派兵处处堵击。马占山由龙门转抵讷河联络旧部，将救国军加以扩编，并加强了同呼伦贝尔地区的苏炳文、张殿九部的联系，坚持抗日。

马占山反正抗战再次为日军所败后，其部下除大部分仍坚持抗战外，有相当一部分官兵被日伪收编为伪军。其中主要有徐宝珍步兵第二旅及朴炳珊步兵旅（朴炳珊于1932年末潜入关内）。日伪政权就以这些部队和此前附逆的伪军为基础，于1932年9月再次组建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司令部，以张文铸为司令官。张文铸，又名鼎元，1898年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历任东北讲武堂教官、步兵营长、骑兵团长、黑河镇守使署参谋长等职，1932年初随马占山与日人妥协而附逆。1932年9月接替程志远任伪黑龙江省警备司令之职。黑龙江省伪警备司令部的主要人员为：司令官张文铸，参谋长兼第三教导队队长李静，部附刘维汉，副官长朱凤阳，军需处长张达兴，军医处长蔡亚民，军法处长王士琇。其隶下的部队，除司令部直辖部队外，只有5个混成旅



伪满军上将张文铸



及3个骑兵旅，具体情况如下表（据伪满军政部顾问部之调查）：

<table>
<tr><th>地区别</th><th colspan="2">旅长姓名</th><th colspan="2">部队</th><th>兵力</th><th>驻地</th></tr>
<tr><td rowspan="2">司令部直辖</td><td rowspan="2" colspan="2"></td><td colspan="2">炮兵营
宪兵队
军乐队</td><td rowspan="2">796</td><td rowspan="2">齐齐哈尔</td></tr>
<tr><td>第三教导队</td><td>步兵团
骑兵团
炮兵连
军官候补生连
通信连</td></tr>
<tr><td>安达地区</td><td>混成第一旅</td><td>杨镇凯</td><td colspan="2">步兵第一团
步兵第二团
骑兵第十二团</td><td>2 853</td><td>安达站</td></tr>
<tr><td>呼兰地区</td><td>混成第二旅</td><td>王树棠</td><td colspan="2">步兵第三团
步兵第四团
骑兵第八团</td><td>2 723</td><td>呼兰</td></tr>
<tr><td>泰来地区</td><td>混成第三旅</td><td>张廷耀</td><td colspan="2">步兵第五团
步兵六团
骑兵第十四团</td><td>2 785</td><td>泰来</td></tr>
<tr><td>克山地区</td><td>混成第四旅</td><td>贾金铭</td><td colspan="2">步兵第七团
步兵第九团
骑兵第十五团</td><td>2 876</td><td>克山</td></tr>
<tr><td>拜泉地区</td><td>混成第五旅</td><td>刘维汉</td><td colspan="2">步兵第十五团
骑兵第十六团</td><td>1 925</td><td>拜泉</td></tr>
</table>

地区别	旅长姓名		部队	兵力	驻地
齐齐哈尔地区	骑兵第一旅	冯广友	骑兵第一团 骑兵第二团 骑兵第三团	2 235	齐齐哈尔
汤原地区	骑兵第二旅	涂全胜	骑兵第四团 骑兵第五团 骑兵第六团	2 225	汤原
黑河地区	骑兵第三旅	周作霖	骑兵第七团 骑兵第八团 骑兵第九团	2 539	黑河

上列各部队中，步兵团均为3营制，每营3连，外加1个机关枪连和1个迫击炮连；骑兵团均为6连制，其中骑兵连4个，机关枪连1个，迫击炮连1个。各旅所配备的武器品种不一，数目不一，但大多数都是原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七七”、“七九”、“六五”式武器，少数为日制武器，如“三八”、“三〇”年式武器。各旅武器装备详见下表：

部　队	步　　枪	机　　枪	迫击炮
混成第一旅	七七式　943 七九式　575 三八式　550	七九式轻机枪　2 七九式重机枪　3	轻迫击炮　5
混成第二旅	七七式　888 七九式　213 三〇年式　45 三八式　644 杂枪　95	七九式轻机枪　13 六五式轻机枪　1 七七式重机枪　4 七九重机枪　11 三八式重机枪　1	轻迫击炮　29 重迫击炮　3



部　队	步　　枪	机　　枪	迫击炮
混成第三旅	七七式　554 七九式　1 171 三八式　283 三0年式　20	七九式轻　6 七九式重　9 六五式轻　1 六五式重　1	轻迫击炮　6 重迫击炮　1 平射炮　2
混成第四旅	七九式　2301 三八式　580 三0年式　22 杂枪　160	七九轻　37 七九重　6	轻迫击炮　16 平射炮　4
第五混成旅	七七式　649 七 九式　554 三八式　53 三0年式　13 杂枪　218	七九式轻　4 七九式重　11	轻迫击炮　5 重迫击炮　6 平射炮　2
骑兵第一旅	七七式　677 七九式　289 三八式　638 三0年式　11	七九式轻　4 六五式轻　2 七九式重　8	轻迫击炮　8
骑兵第二旅	七七式　871 七九式　504 三八式　115 三0年式　23 杂枪　56	六五式轻　1 七九式重　11	轻迫击炮　8
骑兵第三旅	七七式　1 291 七九式　443 三八式　111 三0年式　44 杂枪　82	七九式轻　14 六五式轻　2 七七式重　4	轻迫击炮　23

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再次编成之际，适值黑龙江省抗日反满风云再度突起。继马占山之后，苏炳文、张殿九又于

1932年9月27日率部发动起义，迅速控制了富拉尔基至满洲里的中东路沿线地区，并进而于10月1日设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于海拉尔，宣誓“消灭伪国铲除汉奸，揭破暴寇鬼蜮之伎俩，恢复中国国有之土地”[53]。东北民众救国军，除了原苏旅、张旅共4个团外，还有原马占山部朴炳珊炮兵旅及李海青所部救国军。宣布起义后，东北民众救国军实行了总动员，并以收复省城为目标，重新部署了军队：驻海拉尔步兵第二旅第一团赴朱家坎、腰库勒一带，驻满洲里第二旅第四团赴碾子山一带，步一旅第六团仍在原驻地富拉尔基一带布防，步二旅第九团负责由博克图至满洲里的护路事宜。民众救国军决定于10月3日起向东发起攻击。

苏炳文、张殿九率众起义，使原本已受到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威胁的伪省城愈加岌岌可危。但关东军决定暂缓出兵呼伦贝尔，因为“果真如此立即行动，很可能带来极大危险，即不仅会使局部地区的日侨被杀害，而且在作战期间进入寒季，徒然造成兵员的很大损失。再者，在此南满及兴安岭以东的北满治安不稳，满州国中央及地方政权基础薄弱时期，以不足的兵力实施这一作战，实有两者不能兼顾，结果一无所得之危险，其弊甚大。”[54]所以，“较为妥善”的办法是“两手并用”，“既在靠近大兴安岭方面行使武力，又在呼伦贝尔方面进行政治工作”[55]，以“缓和苏炳文反满抗日态度”，“同时防止大兴安岭以东的反满抗日分子蜂起抵抗”[56]，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兵呼伦贝尔。鉴于此，关东军司令全部决定对“黑龙江省内和苏炳文相勾结



的反满抗日分子进行各个击破”[57]，首先令第十四师团及伪黑龙江省警备军消灭富拉尔基方面的民众救国军，为以后的军事行动作必要的准备。

10月3日，不等民众救国军按计划实行行动，驻齐齐哈尔的日军警备队即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对富拉尔基进行猛烈攻击。救国军六团和赶来支援的一团奋勇阻击，激战数日、迫敌后退。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令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二十联队第一中队、工兵第二中队、师团通讯队等部组成中山支队，由中山建大佐任支队长，全力对付东北民众救国军。8日，中山支队1 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向富拉尔基的外围阵地施以疯狂进攻，救国军一团殊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次日暂撤至腰库勒一带休整，于是，中山支队于9日占领了富拉尔基。之后，中山支队又于10日、11日沿中东路向富拉尔基以西延伸，均被救国军击退。富拉尔基之役，日军死伤惨重，一时无力攻破救国军在嫩江沿岸的坚固工事，遂变攻为守，由步兵二个中队、机关枪一个小队组成富拉尔基支队担任防守，余部缩回齐齐哈尔整顿。救国军前线各部队也趁此间隙加紧补充休整。

10月中旬，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部署，第十四师团开始以主要兵力对付大兴安岭以东的马占山、李海青等部义勇军，而对呼伦贝尔的苏炳文部则施展“和谈”阴谋，企图诱使苏炳文投降。为此，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地的日本特务机关频频指使伪黑龙江省军政要员向民众救国军司令苏炳文进行“疏通”，许以名利地位，诱骗苏炳文归入伪

满，均被苏炳文严词拒绝。10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直接致电苏炳文，称："本军始终不渝地期待您恢复原来的方针，忠诚满州国。……关于和平解决后，您的荣誉，敝军负责传达给执政，并保证得到重任。若失掉和平解决的机会，又危及日本侨民的生命，最后只有和阁下干戈相见。"[⑧]东北民众救国军对日伪的威逼利诱置之不理，继续整军备战，并通过密使与马占山所部商定了合围省城齐齐哈尔的计划。

10月20日，为配合其他各路义勇军围攻齐齐哈尔，东北民众救国军作为西路军开赴富拉尔基前线阵地。翌日晨，救国军第一、四、六团即向防守富拉尔基的日军展开攻击，经过数日争夺，31日，救国军完全占领了富拉尔基。日军第十四师团长松木直亮急调步兵第五十联队等部，以冈原宽大佐为队长，组成冈原支队增援富拉尔基支队。11月10日拂晓日军冈原支队及黑省伪军一部，在飞机、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富拉尔基、腰库勒一线救国军阵地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次日，冈原支队会同伪军再次反扑，经4昼夜疯狂冲击，终于突破了救国军腰库勒一带阵地，富拉尔基旋即又落敌手。救国军被追撤至朱家坎一带加强防御，但立足未稳，日军步兵、骑兵、炮兵、空军跟踵而至，22日又攻占了朱家坎阵地，迫使救国军撤至碾子山一线。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乘东北民众救国军受重创之时，加紧了大规模围歼战的布置和准备。自11月24日起，辽、吉、黑各地日军被大量地抽调到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集结，统归松木直亮指挥，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全歼



救国军。29日拂晓，日伪军发起总攻，分五路对救国军进行分割围歼。日军服部旅团从齐齐哈尔出发，经甘南，进入扎兰屯北，切断了碾子山救国军的退路；日军骑兵第十四旅团，从富拉尔基出发，歼灭了大坑、七棵树附近的救国军，切断了朱家坎地区救国军的西方退路；主力从于家窝棚方面进入碾子山北方，截断救国军退路后，并从牛店方面进入扎兰屯东北地区；日军平贺旅团，从富拉尔基出发，沿铁道推进；日军索伦支队，从索伦、阿尔山一带迂回包抄扎兰屯，从西南切断了救国军向热河的退路。

12月2日，平贺旅团，茂木骑兵第四旅团及黑龙江省部分伪军从北方、西方联合向朱家坎、碾子山围攻。救国军第一团、四团约2 000人奋起激战，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向西南退却。此前一天，即12月1日，日军从东、北、西、南四面攻向扎兰屯，救国军总司令部被迫撤往海拉尔，形势极为险恶。12月2日，救国军总司令部经讨论被迫作出退人苏境的决定。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军4 000人进入苏境，呼伦贝尔作战至此结束。

在整个呼伦贝尔作战中，伪黑龙江省警备军主要负责地区警戒的任务，跟在日军的后面“扫除”和“收拢”散落的民众救国军。苏炳文率部退入前苏联后，原民众救国军的部分部队投降伪军，成了伪黑龙江省警备军的一部分。

注释：

①陈觉《国难痛史》第一卷1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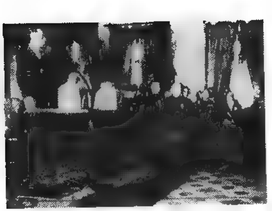
②《“九·一八”事变专卷》东北档案馆

③《马占山将军抗日战》11 页
④抗日义勇军档案《马代主席十月二十七日通告》
⑤⑧《满州事变》289 页
⑥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153 页
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363 页
⑨《满州事变》293 页
⑩⑪⑫《滨江时报》1931 年 12 月 11 日
⑬⑭《还我河山》247 页
⑮《滨江时报》1931 年 12 月 12 日
⑯《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53 页
⑰（嫩江桥之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⑱《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55 页
⑲《文史资料辑》第六辑 38 页
⑳《国闻周报》第 8 卷 45 页
㉑《“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401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㉒《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39 页
㉓㉔《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2 页
㉕《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册史》10 页
㉖《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4 页
㉗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卷 701 页
㉘《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6 页
㉙《马占山将军抗日战》58 页
㉚《滨江时报》1931 年 11 月 24 日
㉛印维廉等《东北血痕》20 页
㉜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卷 703 页
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6 页
㉞《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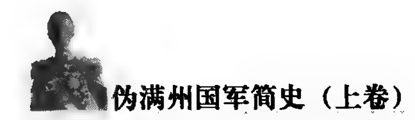
㉟㊱《马占山将军抗日战》75 页
㊲《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50 页
㊳《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51 页
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52 页
㊵《“九·一八”周年痛史》338 页
㊶《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56 页
㊷《王之佑笔供》1954 年 6 月 14 日
㊸㊺《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92 页
㊹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卷 716 页
㊻《国难痛史》第一卷 383 页
㊼《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59 页
㊽《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70 页
㊾㊿《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70 页
51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卷 737 页
52印维廉等《东北血痕》48 页
53印维廉等《东北血痕》52 页
54 55 57《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42 页
56《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43 页
58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卷 775 页

第四章　伪热河警备军的编成

第一节　张海鹏投敌



9月26日，关东军派参谋吉村、大矢等4人潜至洮南，经河野正直居中斡旋，以金票26万元、大盖枪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为诱饵，对张海鹏进行诱降。张海鹏本是爱财慕权之徒，加之虎视眈眈的日军又近在咫尺，在贪生怕死，维护一己私利的心理驱使下，张海鹏遂以“虚与委蛇”为托辞，接受了日军的条件。得到关东军的援助后，张海鹏即以此为资本，大行扩编军队，同时又自封为“边防保安司令”，以求名正言顺。张学良为拉回张海鹏，于10月初密令他充任蒙边督办，李盛唐为少将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首而袭占沈阳，继又急取长春、吉林，仅数日之间，辽吉两省军政枢纽即陷于瘫痪。其时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连闻噩讯，屡向南京政府请求应对方策，但忙于“剿共”的蒋介石仍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竟置国土沦丧于不顾，电示张学良“绝对持不抵抗主义”，静待国联主持“公道”。故此，张学良秉承蒋氏之意旨，严饬东北各地驻军容忍退让，放弃抵抗，听候“中央”处理，冀图寻求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但“不抵抗主义”之滥觞，不仅助长了关东军狂妄的侵略气焰，而且还致使20多万东北驻军漠视日军的野蛮侵犯而按兵不动。结果，继攻陷辽吉省垣之后，日本关东军非但没至此罢手，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谋划进犯黑龙江省。

当时，从南满进入黑龙江省的铁路有两条路线：东线以长春为起点，途经哈尔滨折入黑省；西线以四平为开端，沿四洮路、洮昂路亦可进入。不过对日本关东军而言，通过铁路进军黑省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使用西线。因为东线属于中东铁路的管辖范围，为前苏联所控制。当初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引起了前苏联的高度警觉，如果沿中东路运兵北犯，势必遭到前苏联的强烈反对，并且还有导致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也正是日本最担心之处。鉴于此，日本关东军决定以四洮路、洮昂路作为进入黑省的通道，首先攻占黑省省会齐齐哈尔。

但是，沿这条路线进兵必须解决沿途中国驻军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四洮路和洮昂路的连接点洮南驻有辽宁省防军四个骑兵团，总兵力达9 600余人，统归洮

辽镇守使张海鹏辖制。在洮昂路上的洮安驻有兴安屯垦督办公署下属的兴安屯垦军步兵三个团，总人数计9 800余人，由兴安屯垦督办邹作华统领。屯垦军属国防军编制，装备较优，官兵素质亦较好。东北当局设立屯垦军之初衷，一为充实兴安岭地区松弛的军备，消弭四处横行的匪盗，二因该地蒙汉杂处，民族关系繁纷芜杂，将精锐部队置于其中，可防不测。1931 年 5 月下旬，该军第三团处决了擅自潜入兴安岭地区搜集军事情报的日本参谋本部情报员中村震太郎，自此屯垦军名声大振。但日本法西斯却以所谓“中村事件”为借口，大肆歪曲事实真相，竭力鼓噪战争狂热，企图“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国的各项权益。”[①]此次“事件”也是日本关东军挑起战争的诱因之一。因此之故，屯垦军前嫌未弃，不会轻易就范于日本关东军；于是，关东军即把注意力放在张海鹏身上，藉以名利地位对其诱降。

张海鹏，又名张宪涛，辽宁省黑山县新立屯人，出身于绿林。1901 年左右，他与冯麟阁、金汲纯结成匪帮流窜于辽西一带，并与张作霖、张景惠的帮伙声气相通，沆瀣一气，彼此称兄道弟，可谓“线上朋友”。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之际，张海鹏、冯麟阁为日寇所用，率匪组成游击队，名为“东亚义勇军”，协助日本“满州军”骚扰俄军。日俄战后，滞留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为培植亲日势力之计，遂出面与清政府斡旋，保荐冯麟阁、张海鹏匪帮改编为奉天左路巡防，冯麟阁任统领，张海鹏任第一营管带。1912 年，各省改革军制，奉天都督赵尔巽把左路巡防改编为暂

编陆军第二十八师，冯任师长，张海鹏擢升为五十五旅旅长。1917年，张海鹏尾随冯麟阁赴京，参与张勋复辟丑剧，败后，冯麟阁被捕，张海鹏逃回新立屯，自此便念念不忘于满清复辟。1919年，孙烈臣就任黑龙江督军，因朋友关系，即把张海鹏招至麾下，委任为黑龙江省混成第四旅旅长，驻齐齐哈尔。翌年，张海鹏兼任哈满护路司令，曾把被前苏联红军击退至满州里的谢米诺夫白俄军解除武装，并将谢米诺夫交给了日本关东军。1921年，孙烈臣调任吉林督军，张海鹏亦随之赴吉，任吉林步兵第七旅旅长，不久即因争当吉长镇守使未得而愤然辞去本职，回到新立屯静待时机。

1922年4月，第一次奉直战起，张作霖为充实奉军军力，遂令赋闲蛰居的张海鹏招兵买马。张海鹏见组建自己部队的时机已到，立即在新立屯组成了4营骑兵，称为奉天第一游击队，入关后驻于滦州。奉军败退至关外以后，张海鹏受命率所部驻守洮南、安广、镇东及突泉一带，担任剿匪之务。1925年3月，张海鹏被张作霖任命为洮辽镇守使。此后，张海鹏便以洮南为根据地，凭借手中的兵马大肆聚财揽权，俨然称雄一方的霸主。至1930年6月东北军整编时，其隶下的部队竟能编成4个骑兵团，此时的张海鹏堪称羽翼丰满了。

张海鹏为人狡黠，性情粗野，刚愎自用，有很大的权力欲。他自以为出生入死，替张作霖父子效命疆场十数年，论功行赏，起码也得提升为督军抑或省主席，因而对镇守使一职常感不平。他为了扩展个人势力，所用手段极其卑

鄙，甚至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搭成奸。1931 年 7、8 月间，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欲到洮南视察，洮南爱国人士拟张贴反日标语及举行示威运动，被张海鹏密令警宪制止。待内田一行到达洮南时，张海鹏却又亲自迎送，竭力趋承，惟恐招待不周。联想到内田此行后仅 1 个多月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满铁总裁赶赴洮南定有不可告人的图谋。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长春后，张海鹏预料日军定向洮南进犯。不过因事变突发，形势尚不明了，且有张学良的“不抵抗”训令约束，张海鹏只好暂抱观望态度。很快，兴安屯垦军即派张海鹏之侄、时任兴安屯垦督办公署督察处长的张俊卿赴洮南研究行动方案，最后决定：如日军进兵洮南，洮辽军和屯垦军一致行动，先退至突泉一带，尔后再转进黑龙江或热河。但同时，与张海鹏素有往来的洮南满铁公所所长河野正直亦暗中拉拢张海鹏。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派 1 个小队以“视察访问”为名，前往洮南试探张海鹏的动向。河野向张海鹏通融说，此次“视察访问，决无敌对行为，访问当日即返回沈阳，请勿疑惧”[2]，并保证洮辽军政权一如旧制，决不予以变更[3]。可日军第六守备大队于 9 月 20 日进入洮南之前，张海鹏为安全起见，仍率洮南附近的洮辽军及屯垦军退至突泉一带，而令镇守使署参谋长李盛唐留在洮南，与日军接洽。果然，日军在洮南驻留一日即返回辽源，张海鹏见无变故发生，也引部归还。张海鹏对日军进入洮南未作任何抵抗的表示，且留人迎接日军，此举完全暴露了其欲投降日寇的企图。



但张海鹏毕竟不是草率鲁莽之徒，他深知，在目前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投敌叛国，一旦形势逆转，肯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在与日军秘密接触之外，他还与东北军政要人保持密切联系。日军第六守备大队撤出洮南后，张海鹏立即派镇守使署少校副官富璿善赴锦州，向从沈阳逃至锦州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长荣臻请示机宜。荣臻的答复是，暂时与日军敷衍，待司令长官指示。富璿善得此训示，立刻返回洮南报告给了张海鹏。不过此时张海鹏与日军的秘密联络愈益频繁，投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蒋介石和张学良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时局的办法，才使张海鹏这样握有兵柄的败类军人在卖国求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9 月 26 日，关东军派参谋吉村、大矢等 4 人潜至洮南，经河野正直居中斡旋，以金票 26 万元、大盖枪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为诱饵，对张海鹏进行诱降。张海鹏本是爱财慕权之徒，加之虎视眈眈的日军又近在咫尺，在贪生怕死，维护一己私利的心理驱使下，张海鹏遂以“虚与委蛇”为托辞，接受了日军的条件。得到关东军的援助后，张海鹏即以此为资本，大行扩编军队，同时又自封为“边防保安司令”，以求名正言顺。“司令部”下共设 8 大处，即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秘书处、军医处、兽医处、军需处和军法处。其隶下的兵力，经过收编洮南附近各县的警甲和招降土匪加以扩充，由原来的 4 个骑兵团骤然膨胀至 7 个支队（相当于旅），即：

伪洮辽骑兵第一支队　　　　支队长徐景隆

伪洮辽骑兵第二支队　　支队长鹏飞
伪洮辽骑兵第三支队　　支队长刘茂义
伪洮辽骑兵第四支队　　支队长傅铭勋
伪洮辽骑兵第五支队　　支队长张俊哲
伪洮辽骑兵第六支队　　（后未建立）
伪洮辽骑兵第七支队　　支队长彭金山（后为唐豫森）
伪洮辽骑兵第八支队　　支队长王永清

此外，还拼凑了步兵独立团和骑兵独立团各一个，团长分别是李铁珊和张俊武。

张海鹏接受日军的资助擅自扩编军队，即使冠以“保安”、“剿匪”之名来混淆视听，但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其踏上贼船的事实。张学良为拉回张海鹏，于10月初密令他充任蒙边督办，将蒙边一切事务，付以权宜。张海鹏不得不作出言听计从的姿态，遂组成了蒙边督办公署，张海鹏自任督办，李盛唐为少将参谋长。其实，蒙边督办公署只是一块掩人耳目的招牌，它丝毫也遮挡不住张海鹏甘当汉奸的丑恶面目。即使如此，日本关东军对张海鹏一手接钱、一手接官的举动仍大为震怒。日军第六守备大队羽山少佐奉命赶至张海鹏私邸，施以威吓手段，迫其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势下，张海鹏就派参谋长李盛唐赴奉天与日本关东军接洽。关东军知道张海鹏对黑省地盘垂涎已久，于是就顺水推舟，许张海鹏以黑省督军之职，命其率洮辽军进犯黑龙江省。事已至此，与张海鹏素有旧怨的兴安屯垦军不敢久留，为避免孤军作战，全军遂迅速开往黑省，待命迎敌。



第二节　洮辽军北犯黑龙江省



张海鹏因有日军撑腰做后盾，气冲斗牛，决心与黑省军队一决雌雄，督军之位俨然已在掌中矣。但在动员会议上，多数支队长持有异议，认为此举凶多吉少，因而颇有微辞。不料张海鹏以得罪不起关东军为由，拍案怒骂，并霸气十足地高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张的死党李盛唐也从旁愤然附和：“我们受张家父子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

日本关东军收降张海鹏即迫不及待地令其北犯黑龙江省，用心可谓良苦。9 月 24 日，日本政府出面辟谣，诡称“帝国对满州，并无领土野心”④，如果关东军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继续明目张胆地扩大战火，无疑谎言自破。并且，黑省有前苏联的重大利益，日军不加掩饰地进行赤裸裸的武装进犯，势必引起前苏联的疑虑和不安，处理不妥还有导致苏军介入的可能，这种结果是日本军部及政府所竭力避免的。但是，驱使张海鹏率伪军打头阵就不难寻找借口

了。正如关东军参谋长所说：张海鹏自己“宣布独立，制造种种借口，准备进入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军队慑于张的进攻之说，正向泰来、齐齐哈尔等地集中兵力”[⑤]。如此一来，中国军队为争夺地盘在洮昂路附近交战，“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原来，洮昂路系东北当局贷款日资所修建的铁路，当时借贷关系尚未结束，该路仍是日本利权范围的铁路之一。如果张海鹏率伪军沿洮昂路进展顺利，击败黑省军队，日军即可坐享其成，垂手而得黑省；假如张逆伪军不支而败，日军就会以保障铁路安全为口实，直接出兵进入黑省。总之，张海鹏的洮辽军就是日本关东军手中攫取黑省的一张牌。赢了，利归日军；输了，日军再赤膊上阵也不迟。

张海鹏整军图黑的消息传至省城，省府上下为之震惊。其时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在北平，其子万国宾虽代行省府军政大权，但由于资历浅，难孚众望，黑省顿时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试探张海鹏的真正意图，万乃派省政府委员马景桂潜赴洮南，伪称黑省有欢迎张氏之意，张逆亦口是心非答复曰：“本人年近古稀，毫无野心，唯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赴黑龙江省躲避亦无不可！”[⑥]弦外之音不言自明。接着，万国宾派人携带张学良密电赴洮，电报劝张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本人利用，致贻后世之讥。张海鹏贼心正炽，难纳忠言，决意孤行。为防张逆北犯，万国宾急令洮昂铁路全部车辆集于昂昂溪，以免资敌，同时令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着手部署军事。谢珂令各边防军做好迎敌准备，并将主力部队集结在省城附

近，又派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率部在嫩江北岸构筑阵地，严阵以待。

张海鹏因有日军撑腰做后盾，气冲斗牛，毫不示弱，决心与黑省军队一决雌雄，督军之位俨然已在掌中矣。但在动员会议上，多数支队长持有异议，认为此举凶多吉少，因而颇有微辞。不料张海鹏以得罪不起关东军为由，拍案怒骂，并霸气十足地高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⑦张的死党李盛唐也从旁愤然附和："我们受张家父子（指张作霖、张学良——引者注）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⑧各支队长怕事情闹僵于己不利，赶紧唯张海鹏马首是瞻，表示服从。张海鹏旋即令军务处长许松涛赴兴安屯垦军原驻地，收缴了遗留下的汽车、枪械及军用器材、被服等物资，又令李盛唐强由洮南东三省官银号、交通银行、边业银行提取巨款，充做军费。稍后，张海鹏又率洮南大小汉奸头目迎日军第六守备大队入城，以表无二之忠心。

10月8日，黑省政局稍见头绪，北平副司令行营电令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省主席，并任全省军事总指挥，令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张海鹏闻黑省已派马占山为主席，遂紧锣密鼓地准备向黑省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编成了作战司令部，张自任司令并委任哈到良为参谋处长兼代参谋长、张锡铭为副官处长、李延龄为军需处长、赵万福为医务处长。在军队部署上，张海鹏先派伪洮辽军第一支队由陆路行军至江桥，掩护主力前进。令第三支队前往安广方面，准备尔后对大赉施以攻击。伪

作战司令部率第二支队及骑兵独立团则由铁路输送至泰来，然后第二支队转往塔子城方向，准备攻击景星。日本关东军则派大矢和里木教官充任伪洮辽军攻黑的顾问。

在马占山从黑河到齐齐哈尔实就其任之前，参谋长谢珂受命坐镇省垣，统筹全局。谢柯将日军援助张逆图黑的情形上报北平副司令行营，并请示方略，得到的复电略谓如张逆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9]。战事一触即发，省府要人多卷裹细软携家带眷逃往哈尔滨。谢珂为稳住局势，暂派朴炳珊为龙江警备司令，将炮兵两营开进省城备用。又命公安局督察长刘允升代理局长，并令教导队学生暂时维持地方治安，同时以军署名义电令马占山及苏炳文两旅各抽调步兵一团开到昂昂溪，电驻在满州里的程志远旅积极准备补充待命。他又督饬在嫩江桥北岸固守的卫队团、工兵营、辎重连及炮兵营严加戒备，随时痛击敢于来犯之敌。在强敌压境，人心惶惶的情况下，谢珂"抱与城偕亡之志"[10]，临危不惧，勇撑危局，实属难能可贵。

10月13日，伪洮辽军第一支队3个团在支队长徐景隆的率领下，充做前锋向黑省进击，15日开到泰来。黑省军驻泰来的朱凤阳骑兵团奉命撤至泰康以西，掩护江桥黑省军左翼免遭攻击。16日拂晓，徐景隆率所部伪军进抵江桥南端，黑省守军立即开炮迎击。战斗尚未展开，徐景隆即误触驻守江桥桥兵预先埋在南岸的地雷，当场毙命。江桥守军乘机反攻，伪军3个团一触即溃，狼狈逃散。同时黑省军队为阻敌再犯，自动将嫩江桥破坏三孔。张海鹏初战即

损失惨重，始知仅凭自身之力图取黑省绝非易事，为保住自己苦心经营起的家底，遂暗示所部迟滞不前，专等日军出面干涉。

10月19日，马占山抵达省城，翌日即就任代理主席之职。大敌当前，马占山凭一腔爱国热血，坚决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11]同时致电前线激励将士，并发出悬赏张逆首级的布告，以示与张海鹏势不两立。布告曰："张贼海鹏，老迈昏聩，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夺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尔军民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两级，并奖现大洋一万元，百姓赏大洋两万元，储款以待。尔等军民为国杀贼，不但获得实利，且可留美名于后世，想能勇尽职责。"同时还晓谕张海鹏部属"率队反正携械投诚者一律安置"，"执迷不悟甘心附逆者一律剿灭"[12]。张海鹏的倒行逆施早已引起了其部下部分官兵的反感，受黑龙江省抗战气氛日益浓厚的影响，许多官兵的情绪更加沮丧，甚而至于有自行散去者。张海鹏非但毫无悬崖勒马之意，反而越陷越深，为复江桥之仇，他企图勾结蒙匪，再图一逞。不过关东军本来对张逆伪军也没抱太大的奢望，既然他的进军已使黑省军队破坏了洮昂路上的嫩江铁桥，这就足以欢欣鼓舞了。当然，还轮不到张海鹏跟在日军的后面隔岸观火，关东军一旦原形毕露进兵黑省，肯定会挟裹张部伪军壮其声势，即使它独挡不了战事的一面，就是用它充当炮灰也是日军求之不得的。

第四章　伪热河警备军的编成

嫩江铁桥被马占山军破坏，日本关东军总算找到了调兵北上的借口。它在屡次提出无理要求向马占山施压的同时，还着手整饬张逆伪军以作帮凶。10月30日，张海鹏在洮南召开有日本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再犯黑省的有关事宜。日方对张部伪军消极等待深为不满，遂决定由日军官须本、加藤、大矢、吉村4人陪张海鹏同往泰来，监视驻泰来的伪军继向嫩江桥进发。11月2日，关东军代表谒见马占山，诡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13]马占山毫不退让，针锋相对答复曰："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且洮昂路并非黑省所属，亦不能代办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黑省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14]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示弱，除了诉之干戈，别无他途。

此时，日本关东军自恃兵锋正盛，极其蔑视黑省守军，仅派一部挟伪军进犯嫩江桥。11月3日，日军开始武装挑衅，黑省守军因有北平电令"避免向日军直接冲突"之顾忌，暂为忍耐，但次日，日军竟试图渡江，黑省守军忍无可忍，被迫实行正当自卫，嫩江桥之战自是展开。激战竟日，日军终未得逞。为减少自身伤亡，从5日起，日寇驱使张逆伪军向江桥阵地猛攻。黑省守军愤于国贼助纣为虐，纷起痛击，毙伤张部伪军700余名，余则仓皇退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见势不妙，遂于11月6日火速增派第二师团主力及第三十九混成旅团之一部，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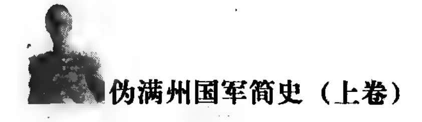


态既已发展至此，即使后方有若干缺陷，我军亦决心举可能之兵力，不失时机地主动给黑龙江省方面之敌军主力以迎头痛击，……但愿相信我和关东军将士的一点衷心。”[15][16]由于日军主力参战，敌我双方激战渐呈白热化，彼此伤之甚重，但最惨的仍是张逆伪军。“张海鹏军虽有日方援与之新式武器，而未经训练，绝无战斗能力，因是在前线之日本军官，以机关枪压迫前进，以致该军死伤众多，都系背上中弹。”[16]张逆为了捞取名利地位，竟置他人的生命于日寇股掌之间，任其杀戮，其行径之卑劣，无异于衣冠禽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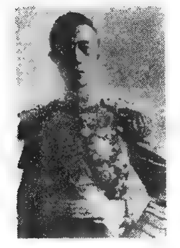
黑省守军 11 月 6 日自江桥阵地退保三间房阵地后，战事一度缓和下来。关东军代表再次致函马占山，内称：“考察现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为唯一之办法，即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省政府与张海鹏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17]对此要求，马占山寸步不让，答复说：“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18]口气之坚决不容商榷。日本关东军见无隙可乘，遂于 12 日恢复攻击，黑省守军节节抵抗，经过三间房、大兴防御战，再度给日伪军以重创。此时张逆所部“除被击毙者外，多数潜逃，战场上完全由日军作战”[19]。但由于日军在飞机、坦克、重炮的配合下轮番进攻，黑省守军无片刻喘息之机，渐渐不支，不得已乃撤出战斗。19 日，日军进占齐齐哈尔。

江桥之战差点儿让张海鹏赔光了老本。张海鹏率部

6 000余人进入黑省，死伤无算，携械逃亡者又达2 000余人。日酋多门师团长恼羞成怒，多次呵斥张海鹏，并警告“其部下不时哗变，徒耗枪械，有碍作战计划”[20]。张海鹏诚惶诚恐，遂同意日军随便处置哗变士兵。11月15日战斗正酣时，张部第二十五营某连步兵欲渡江逃离战斗，被日军“先将该营枪械骗出，一候悉数登舟以后，即在江边设炮将渡船十余艘一一击沉，以致该连兵士无一生还”[21]。但张海鹏无论如何讨好关东军也于事无补了，关东军对他的信用渐次消失。张海鹏大张旗鼓地尾随日军进军黑省，结果却一无所获，他所关心的“督军”之位也化成了泡影，黑省伪主席之职已被张景惠拔了头筹。张海鹏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他的老巢洮南，继续向他的日本主子摇尾乞怜，以求再次得到垂青。



第三节　洮辽警备司令部及其讨伐



1932年3月，伪满州国在日寇和群奸的喧嚣中出笼，清朝逊帝溥仪就任“执政”。张海鹏因早在张勋复辟中即力主“保皇”，甚为溥仪倚重。溥仪来东北不久，就派肃亲王之子宪原和宪基持“密旨”赴洮南，“钦命”张海鹏在洮南一带整军练兵。张海鹏素以“保皇”自诩，今有逊帝亲诣以教，未免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以图藉皇恩之风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溥仪粉墨登场后，张海鹏为尽“臣子”之孝，遂奉命派伪洮辽军第一、第四支队调至长春附近，以行拱卫。

张海鹏在关东军的诱惑下北犯黑龙江，最后却眼睁睁看着黑省伪政权被关东军易手他人，心中甚是不悦。但他对关东军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暂当他的“蒙边督办”，希冀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再在日本的羽翼下猎取“功名”。同时，日本关东军也深知张海鹏并非平庸之辈，在东北地区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尚有其利用的价值。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在其制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中，即将张海鹏和熙洽、于芷山、张景惠等人

并列，依为将来“维持地方治安”的实力派人物之一[22]。张海鹏从黑龙江省率残部返回洮南后，日本关东军令其重整兵马，担任四洮路和洮昂路的警备之任，并相机“清剿”洮辽地区及其附近的抗日力量。张海鹏乘机扩充部众，至1932年2月，伪洮辽军基本上又恢复了原建制。

1932年3月，伪满州国在日寇和群奸的喧嚣中出笼，清朝逊帝溥仪就任“执政”。在这个怪胎出生之前，汇集东北的清室余孽及满清遗老鼓噪不止，企盼溥仪重登大宝，接续大清国脉。张海鹏因早在张勋复辟中即力主“保皇”，甚为溥仪倚重。溥仪来东北不久，就派肃亲王之子宪原和宪基持“密旨”赴洮南，“钦命”张海鹏在洮南一带整军练兵。张海鹏素以“保皇”自诩，今有逊帝亲诣以教，未免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但日本关东军美其名曰的“满蒙自由国”其实不过是日本天皇的“王道乐土”，包括溥仪在内的群贼仅是关东军掌握的傀儡而已，何言复辟？尽管如此，张海鹏仍乐此不疲，以图藉皇恩之风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溥仪粉墨登场后，张海鹏为尽“臣子”之孝，遂奉命派伪洮辽军第一、第四支队调至长春附近，以行拱卫。可以说，张海鹏死心塌地甘为日伪政权献以老朽之躯，定有其“保皇”情绪在脑中作祟。

伪满建国后，日本关东军为了便于控制伪军，遂着手统一伪军编制，同时又规定它的任务是协助日军维持地方“治安”，因而名之曰“警备军”。从地域上说，洮辽地区本属奉天省，理应归于芷山的伪奉天警备军统辖，但伪军政部却又在洮辽地区独树一帜，另设洮辽警备军由张海鹏管



制。并且，洮辽警备军所辖各部队不像其他警备军那样以“旅”为最大编制单位，乃以“支队”相称，因此，伪洮辽警备军其实与原伪洮辽军无甚区别，只是换个名目而已。从根本上说，关东军此举无非是想在辽北及蒙边保有一支相对独立的伪军，以便能更机动地在这一广阔地域实施讨伐，但联系到以前关东军许张海鹏黑省“督军”而未兑现这一点，让张海鹏领有“洮辽警备军司令”之职，对张逆也算是个安慰。这样，张海鹏因仍握有原班人马，颇有“感恩知遇”之感，比此前更加卖力地为日伪政权效力。

还在伪洮辽警备军建立前，张海鹏就在其日本主子的指使下开始了对抗日爱国志士的屠杀。辽北及蒙边向为匪贼出没之地，“九·一八”事变后，活动于这些地区的绿林帮伙不忍充当日寇的鹰犬，掉转枪口，纷起抗日。没有撤入关内的原东北军部分官兵也誓守土之责，决心严惩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河山。由于这些地区西邻热河省，各部抗日武装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抗战之火有继续向东蔓延的趋势，日寇感到它所占据的沈阳、长春等地亦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授命张海鹏进兵辽北，企图扑灭遍燃辽北大地的抗日烈焰。1932 年 2 月初，张海鹏亲赴铁岭、法库、彰武、康平一带，指挥伪洮辽军第一、第四支队讨伐天缘好、金山好、长江好等绿林队伍和刘海泉等部抗日义勇军。在法库境内，伪洮辽军第一支队先在该县西部袭击了天缘好部，打死该部抗日军约八、九十名，缴获枪支七、八十支。继又在该县南部偶遇长江好部，经过激烈战斗，又打死抗日军三十余名。2 月末，张

海鹏奉关东军之命，率所部转进至铁岭，受日军第五守备大队长区处，讨伐刘海泉、金山好等部抗日武装。两部抗日队伍为避敌兵锋，且战且走，伪军尾随不止，刘海泉部被伪洮辽军第四支队打死百余名，金山好部亦被伪洮辽军第一支队打死百余名[23]。张海鹏率伪洮辽军在辽北的残酷讨伐，给当地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灾难。

1932年3月下旬起，张海鹏打着“洮辽警备军司令部”的旗号，在关东军的摆布下四处征讨，尽心尽力地维护“满州国的治安”。1932年5月，鉴于吉林境内以原东北军为主的抗日义勇军骤然沸起，仅靠伪吉林警备军难于应付，张海鹏亲率伪洮辽警备军第一支队、第四支队及第七支队进入吉林地境，协助由吉兴率领的伪吉林警备军讨伐在扶馀、长春岭一带的李海青部义勇军，迫使该部义勇军易地他走。7月，伪满军政部顾问佐久间亮三赴张海鹏在三岔河的“讨伐司令部”，要求张海鹏拨出第四支队归他指导，协助日军舟桥联队讨伐在舒兰境内的冯占海、宫长海部吉林自卫军。第四支队虽受命前往，但连续的东讨西伐已使伪军士兵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因而行军速度非常迟缓，致使舟桥联队在舒兰境内孤军作战。就在佐久间亮三怒不可遏之际，忽闻伪吉林军刘宝麟旅发生士兵起义事件，日酋自觉情势不妙，赶紧令第四支队折回原驻地。不久，伪洮辽警备军就悉数回至洮辽地区驻防，很少再到辖区外协助讨伐。

从1932年9月起，日本关东军倾巢出动，驱赶各地伪

军镇压东北境内的抗日反满运动，至1933年初，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主要抗日队伍均遭到了重大挫折，暂时已无力再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在日伪军进行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讨伐中，唯有伪洮辽警备军相对比较平静，基本上没有大的讨伐行动。究其原因，一，洮辽地区地势平坦，人烟较稀，虽然也有抗日队伍经常出没，但这些队伍人数少，装备差，无须伪军倾全力以对；二，与日本关东军的整个战略计划有关。关东军在伪满全境“围剿”抗日义勇军，其目的除为稳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外，还和它下一步的侵略行动密切相连。伪满建国前后，关东军屡次声言“满州国”应以长城一线为其“国境线”，热河省属“满州国”的“领土”，必欲取之而后安。其实，这种强盗逻辑只是关东军企图扩大侵略的一种借口而已。这样，关东军一旦向热河进犯，它首先得消灭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以免除后顾之忧，然后还得挟裹伪军与之同行来装点门面。而洮辽地区正好毗邻热河北部省境，令伪洮辽警备军就近进攻防守薄弱的热河北部地区，可谓适得其所。因此，就在伪满军疲惫不堪地到处“追剿”抗日军时，伪洮辽警备军却在休整，以便在“大讨伐”结束后协助关东军进兵热河。

第四节　伪热河省警备军的编成



2月21日，日军自中路首先向南岭发动进攻。守军董福亭旅汤玉山团稍作抵抗即行撤退，致使南岭失守。翌日，日军旋又向北票进击。董旅主力经不住日军坦克的冲击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迅即弃守北票撤守朝阳。24日晚，日军第八师团主力第四旅团及第十一旅团一齐到达朝阳以东、以北阵地前，次日即向朝阳攻击前进。董福亭旅组织兵力殊死抵抗，但终未能挽回颓势，当天朝阳即告失守。尔后，日军第八师团稍行休整，于3月1日发起总攻。关东军侵占热河后，立即着手组织伪政权。5月，“热河省警备军”正式成立。张海鹏因忠心耿耿地顺从于日寇，同时又有实力，自然而然地就当上了警备军司令兼热河省省长。伪热河省警备军以原洮辽警备军为基干，杂以汤玉麟手下的降兵和其他伪军，共编成了4个混成旅。

日本继侵占了辽、吉、黑三省，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州国傀儡政权之后，其欲壑难填的侵略野心并未因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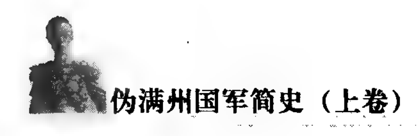


满足，而是打着“满州国”的招牌又将侵略的目光转向了热河省。日本法西斯之所以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厉行侵略，既是西方列强纵容包庇的产物，又与蒋介石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将日本挑起战端之事诉之于国际联盟，声言“以公理对强权”、“以交涉对武力”，严饬东北军忍一时之愤，委曲求全。但国际联盟只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大国操纵的、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它虽号称“万国联合”，但真正起作用的只英、法、德、意、日五国，而实际领导权又主要掌握在英、法两国手里。英、法等国连同没正式参加国联的美国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侵略，虽屡有指责，但总的来说，是抱着妥协、观望的态度。在中国政府多次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在 1931 年 12 月通过决议，决定组成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关系问题。在取得日本同意后，1932 年 1 月，正式成立由英、美、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2 月初，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启程，途径美国和日本，4 月末方抵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直到 10 月份才发表调查报告。报告硬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满州国是不合法的。在如何解决中日冲突这一关键问题上，报告竟主张中日双方一切武装力量都撤出中国东北，然后组成由外国人控制的“高度自治政府”和特别宪警部队管理东三省，即既不同意中国

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又不承认日本独占东北，这实际上暴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欲共同宰割中国东北的企图。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除日本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国基本上接受李顿报告书。日本拒不接受，2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以便为继续扩大侵略取得行动"自由"。至此，蒋介石依为救命稻草的国联以一团废纸收场了事，他的"以夷制夷"之策彻底地落了空。正如冯玉祥有电文之所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24]真谓一语中的。

其实，就在蒋介石政府一味依赖国联企图向日本讨回"公道"时，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却日益嚣张。侵略中国东北得手，使日本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这大大鼓舞了法西斯军人夺取国家政权的勃勃野心。本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军人极右势力为配合关东军的侵略行动，准备在10月18日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军人独裁政权，后由于军部首脑对举行暴动踌躇不定，导致了这次阴谋的破产。继此之后，法西斯势力为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继续积极活动，1932年5月15日，少壮派军人发动法西斯暴乱，刺杀了首相犬养毅，要求实行"昭和维新"，建立法西斯军人内阁。"五·一五"暴乱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在这一事件冲击下，传统的政党内阁宣告结束，军部开始独揽国家政权。当然，在穷兵黩武对外侵略这点



上，日本内阁无论由政党组成还是由军部控制，其本质并没什么差别，但军部左右国家政局，它会更激进地推动战争机器的运转。这与当时倾力于“安内”大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相比，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深具法西斯侵略本性的日本军部上台，使在中国东北恣意横行的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日本决定退出国联之前，即 1933 年 2 月 10 日，关东军为图取热河即制定了攻占热河的计划。该计划声称“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州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州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州国的基础”[25]。关于作战计划的方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以第六师团及伪军张海鹏部队首先向热河省东境方面进击，在消灭该方面“兵匪”的同时，尽可能把“反抗分子”牵制在北方。接着，以第八师团等部队迅速向热河省南部突进，割断华北与热河省的联系，“这样不仅会对华北张学良的势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使热河省内的反抗分子陷于孤立无援”，便于最后“将敌人压向西面或西南聚而歼之”[26]。很明显，关东军进兵热河，其真正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将张学良的势力完全从关外清除出去，免去后患；另一个是阵兵于长城附近，窥视华北，为以后进一步侵华创造条件。因此，日本关东军侵犯热河，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实现“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热河省是联结关内外的交通枢纽，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它就成了拱卫京、津的屏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担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热河驻军司令的汤玉麟是张作

霖的老伙伴，在东北军中，他素以骄横跋扈著称。1926年，汤玉麟因助张倒郭（松龄）有功，由东边道镇守使升任本职。上任伊始，汤玉麟即竭其所能扩大部众，到“九·一八”事变前，其隶下兵力已达30 000余人。当时热河驻军所辖部队计有：东北陆军第三十六师，汤自兼师长，辖一〇六旅（张从云），一〇七旅（董福亭），八旅（刘香九）三个步兵旅，骑、炮兵各一团，工、辎兵各一营；另有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二十二旅（富春）、独立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独立骑兵第十九旅（石文华）、热河省保安骑兵第一旅（赵国增）、热河省政府特务队（崔子衡）。其中，第三十六师及第二十二旅为汤氏嫡系，装备精良，所用武器均为德国制造。但热河驻军“平素无组织，无训练，专以欺压百姓为能事；中上级官佐大半染有吸毒嗜好，又经年累月不发军饷，士兵服装寒暑倒置，给养柴草由地方摊派”[27]，这样的部队其士气可想而知。并且，汤玉麟本人居功自傲，视热河为私产，以充军饷为名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致使广大下层人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汤玉麟以热河地盘的得失为虑，对日态度十分暧昧。但在张学良及周围抗日力量的威慑下，汤玉麟尚不敢投敌叛国，因而对关东军任命的伪满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主席之职表面拒不接受。而其“恐日症”与患得患失的心理，始终在作祟，表现在言行方面，就不像以前参加军阀混战那样慷慨激昂，而是疑惧不安。后在全国抗战舆论的影响及张学良的支持下，他才稍作备战，并草拟了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以正规军为



主，义勇军为辅，互相配合，固守热河，尤须确保承德；以鲁北、开鲁、绥东、阜新、朝阳为前进警戒阵地线，以乌丹城、赤峰、建平、朝阳为主阵地线，极力构成纵深阵地带；尔后各部队在作战时分别适应情况，捕捉战机，予敌以各个击破，或竭尽全力一举包围而歼灭之。该计划原则上尚可接受，以后经北平军分会研究补充，遂成了张学良组织热河抗战的蓝本。

鉴于热河是东北最后一块抗日阵地，又居华北门户之要地，张学良为收复东北，决定整军一战。南京政府在全国要求抗战的呼声中也被迫做出姿态，制定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的作战计划，将在华北各军及增援部队统编为华北集团军，由张学良任集团军总司令。张学良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分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第二军团总指挥商震；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第四军团总指挥万福麟；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第六军团总指挥张作相。此外，张学良还辖两个军团：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第八军团总指挥杨杰。1933 年 2 月 18 日，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 27 名将领自承德发出抗日通电，略谓：“溯自沈变发生，转瞬已十六阅月，国土沦胥，民众丧亡，损失之大，实难数计。……日人贪饕，得寸进尺，我讲公理，彼恃强权，我愈让而彼愈争，时愈久而变愈烈。……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国图存之计”，并希冀“海内贤达，全国同胞，俱体时艰，一致奋起，俾作有力之声援，期收最后之胜利。”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所发出

的最强烈的抗日呼声。

张学良发出抗日通电的前一天，即2月17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各部队下达了进攻热河的命令。日军的兵力部署是：北路由日军第六师团及张海鹏、程国瑞伪军计74 000余人，分由林东、鲁北一线和绥东、阜新一线向赤峰逼近；中路由日军第八师团15 000余人，向北票、朝阳、凌源一线进犯，然后直指承德；南路则由日军第七师团主力并伪军万余人向白石嘴山、纱帽山、凌南、凌源攻击，目标亦指承德。针对日伪军兵分三路直趋热河，热河守军按原定计划也大致分兵三路抵抗：北路开鲁、赤峰方面由孙殿英所率第四十一军、汤玉麟部崔兴武骑兵第十七旅、冯占海第六十三军以及义勇军刘海青、刘振东、邓文部防守；中路南岭、北票由汤玉麟部董福亭步兵第一〇七旅及义勇军耿继周部防守；南路凌源、叶柏寿、平泉由万福麟部于兆麟独立第三十旅、王永盛独立第二十九旅等防守，其他援军正陆续调动。

跟随日军进攻热河的各部伪军以张海鹏所部为主体，组成了“讨热军”。讨热军总司令由伪军政部部长张景惠担任，其下各大小头目分别是：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高级顾问佐佐木到一，军事顾问佐久间亮三、金川耕作、北部邦雄、生田吉五郎；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张海鹏，参谋长李盛唐。作为“前敌总司令”的张海鹏，其隶下的部队计有：伪洮辽警备军第一支队（王永清）、第二支队（鹏飞）、第三支队（刘茂义）、第四支队（傅铭勋）、独立骑兵团（张俊武）、第一炮兵大队（李文）、第二炮

兵大队（刘本善）以及伪军暂编第三支队（索景清）。“讨热军”名义上由张景惠和张海鹏等巨擘统领，实际上，它不仅要完全服从于关东军的统一调遣，而且还得听从各级日本顾问的幕后指挥。张海鹏助纣为虐西犯热河的最大目的，就是想得到关东军许给他的热河省军政长官一职。只有如此，张海鹏才会拼死效力，关东军也才会对这支伪军放手使用。

2月21日，日军自中路首先向南岭发动进攻，守军董福亭旅汤玉山团稍作抵抗即行撤退，致使南岭失守。翌日，日军旋又向北票进击，董旅主力经不住日军坦克的冲击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迅即弃守北票撤守朝阳。24日晚，日军第八师团主力第四旅团及第十一旅团一齐到达朝阳以东、以北阵地前，次日即向朝阳攻击前进。董福亭旅组织兵力殊死抵抗，但终未能挽回颓势，当天朝阳即告失守。尔后，日军第八师团稍行休整，拟于3月1日发起总攻。

与此同时，北路日伪军的进展也相当迅速。2月23日，第六师团茂木旅团从通辽附近、张海鹏的“讨热军”自洮南分别出发，目标均指向开鲁。驻守开鲁的骑兵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是个见利忘义之徒，在日伪军进攻前，他因收受了日军30万日元金票而自动放弃了开鲁，退至林西。日军主力继续攻击西进，张海鹏除令伪军第一支队随日军行动外，他率所部尾随日军之后，一面担任警戒，一面迤逦前行，进度非常迟缓。日伪军攻占林西后，即集结主力准备于3月初进犯赤峰，而把林西的防务交给了业已投降的崔

兴武旅负责。

热河守军初一接触即顿呈溃败之势，令张学良大为震惊。张学良急调关内东北军赴热驰援，同时令张作相前往承德坐镇指挥。但张作相设在承德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不过是个空架子，根本无兵可用。甫至赤峰的孙殿英部观望不前；冯占海等义勇军因开鲁失陷，节节西退；增派的东北军独立步兵第十二旅先头部队刚到古北口；由于汤玉麟不顾大局，因此，张作相一到承德即陷入了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困境，面对日伪军即将发动的全面攻势竟茫然无措，只好勉强支撑危局。

3月1日，日伪军倾侵热兵力之全部开始总攻。在中路，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沿朝阳、凌源一线攻击前进，在叶柏寿附近与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三十旅相遇，经过激烈战斗将该旅击退至平泉。3月2日，日第八师团主力到达凌源时与由绥中方面进入热河的混成第十四旅团的先遣队会合，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退守平泉的东北军第三十旅与第二十九旅会合后，奉命同第四军团的东北军第八旅、第十六旅、第十九旅一起向喜峰口方向撤退。3日，日军进入平泉，承德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之下。在北路，日军第六师团前锋于3月1日开始进攻赤峰守军第一一七旅，战至翌日，赤峰守军不支而退。至此，热北失去屏障，承德防守混乱，热河防线全部崩溃。

3月3日晚，日军第八师团逼近承德。此时，汤玉麟在承德附近尚有两旅之众，在张作相反复督促下，他才被迫令其部众据险布防。但部队在出发途中发生哗变，要求先

发3个月军饷方能开拔至第一线。张作相、汤玉麟见大势已去，随即弃承德逃走，前者奔至古北口，后者率残兵败将逃往丰宁。4日中午，日军占领承德。

日军攻占赤峰、承德后，按既定计划继向热河省西南推进，而令伪军在后面维持占领地内的治安。张海鹏在3月上旬率主力进驻赤峰后，旋即令第二支队为先锋，他率“满州国讨热作战前敌司令部”又蹿入承德。接着，张海鹏令第四支队进驻丰宁，第三支队进驻隆化，索景清支队进驻鞍匠屯。但不久，伙同孙殿英部逃入察境的汤玉麟又率部返回丰宁县，击败伪军索景清支队后占据了大阁镇。汤玉麟收编附近各部重新加以改编，任董福亭为步一旅旅长，崔子衡为步二旅旅长，耿继周为步三旅旅长，汤玉书为骑一旅旅长，李佩声为骑二旅旅长，黄永和为骑三旅旅长，郑天狗为别动队司令，汤玉铭为混成旅旅长，声势颇壮。

汤军回据大阁镇一带，给张逆伪军以很大威胁，因为汤氏虽遇敌胆怯，但击伪还强。于是张海鹏屡派人前往勾搭，并赠以大批伪钞物资，力劝汤氏离开热河，袭占察省以图自存，甚至许诺“讨热军”定给以暗中支援。当时汤部成分多为义勇军改编，且董福亭旅抗日意志坚决，始终不渝，即使汤玉麟顺张逆之意而行，恐亦难得手。正犹豫不决之际，方振武、吉鸿昌倡议讨何（应钦）抗日，邀请汤玉麟参加。汤军将领多对何应钦不满，汤恨之尤深，故一拍即合。最后汤玉麟得以名正言顺离开热河，进驻独石口至云州间。

第四章　伪热河警备军的编成

承德陷落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华北军务交由何应钦代理。何应钦是典型的亲日派分子，他对蒋介石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所谓“既定国策”忠实秉承，企图利用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只要能阻止日军人关就算完事大吉。因此，他据长城各口为险，开始部署防御：傅作义部队防守独石口，徐廷瑶第十七军防守古北口，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防守喜峰口，高震第三十二军防守冷口。由长城沿线撤下来的东北军整顿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藉以威胁日军侧背。这种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

3 月 10 日，日军开始向长城中国守军发动攻击，首先与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展开激烈争夺，但由于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双方遂呈对峙状态。在古北口、南天门一线，日军主力第八师团向第十七军施以猛烈突击，双方互有伤亡，战事一时呈胶着状态，至 3 月 12 日，日军才攻占古北口。此后，日军停止了攻击，长城线一度沉寂下来。从 4 月 1 日起，战斗再次沸起。日军占领石门寨后，冷口腹背受敌，被迫撤出，随后中国守军又撤离喜峰口。5 月初，日军进攻滦东，11 日进攻滦西，冀东 20 余县相继沦陷，重兵防守的南天门也告失守，日军控制了长城各口和冀东地区，平津危急。

日军攻占长城各口及冀东，其意图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同意在伪满和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区，因而当 5 月 31 日丧权

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长城战事就结束了。《塘沽协定》规定：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延庆、通州、芦台等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监察上述执行情况；三，中国军队完成上述行动之后，日军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由中国方面担任，中国不得利用反日的武装团体。《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侵略东北及热河的合法性。这样，继东三省之后，热河省也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了伪满洲国“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东军侵占热河后，立即着手组织伪政权，建立军事殖民统治。在维持地方治安问题上，它仍仿效在东三省实行的策略，组建由日本人控制的伪军，使中国人自相残杀以减少自身的伤亡。1933 年 5 月，“热河省警备军”正式成立，张海鹏因忠心耿耿地顺从于日寇，同时又有实力，自然而然地就当上了警备军司令兼热河省省长。伪热河省警备军以原洮辽警备军为基干，杂以汤玉麟手下的降兵和其他伪军，共编成了 4 个混成旅。伪热河警备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具体情况如下表（根据伪满军政部 1934 年调查）：

部队	旅长	部队组成	人数	警备地区
司令部直辖部队		卫　队 炮兵队 通信队 自动车队	893	

部队	旅长	部队组成		人数	警备地区
混成第一旅	王永青	步兵第一团	第一营	2 484	赤峰、建平、绥东一带
			第二营		
			第三营		
			机关枪连		
		骑兵第二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骑兵第三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迫击炮第一大队			
		野炮第一连			
混成第二旅	张俊哲	步兵第二团	第一营	2 453	承德、平泉、丰宁一带
			第二营		
			第三营		
			机关枪连		
		骑兵第三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骑兵第四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迫击炮第二大队			
		野炮第二连			



部队	旅长	部队组成		人数	警备地区
混成第三旅	鹏飞	步兵第三团	第一营	2 383	朝阳、凌南、阜新一带
			第二营		
			第三营		
			机关枪连		
		骑兵第五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骑兵第六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迫击炮第三大队			
		野炮第三连			
混成第四旅	傅铭勋	步兵第四团	第一营	2 468	围场、隆化一带
			第二营		
			第三营		
			机关枪连		
		骑兵第七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骑兵第八团	第一连		
			第二连		
			第三连		
			机关枪连		
		迫击炮第四大队			
		野炮第四连			

第四章　伪热河警备军的编成

张海鹏任伪热河警备军司令兼伪热河省长，终于实现了掌执一省军政大权的夙愿。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地位，他竭力培植党羽，发展私人势力，把许多旧洮辽军人安插在各级部队中，以图立稳根基，独霸热省军政。但日本关东军对张海鹏，充其量是利用他粉饰门面，绝不允许他自行其是。鉴于热河省地扼关内外通道之咽喉，又是抗日武装进退自如之地，关东军在凡有伪军驻扎的地方，均配以相当的日军驻屯，名曰“共同防卫”，实则暗中监视。同时，关东军还控制伪军的武器弹药，不给伪军装备重型武器，以免出现不测。自占据热河省境后，关东军立即抢修了警备道路，屯兵于各军事交通枢纽，控扼军事交通命脉。此外，关东军还屡向热河警备军派进顾问、教官，在各个基层安置了日系军官，对军内的要害部门进行控制和掌握，并建立了指纹档案，对参与携械潜逃与武装哗变的伪军残酷镇压。限制张海鹏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人事大调动，打乱原建制，削弱带兵军官的权限，把日伪培训的非洮辽军官充实到各部队中。这样，到 1934 年，伪热河警备军不再是张海鹏所把持的私人军队了，而成为日本关东军严密控制、受伪军政部指挥的部队。

热河局势稍为安定后，关东军为削夺张海鹏的兵柄，经常召其以“参议”身份赴伪都新京议事。在他脱离部队期间，热省军政诸项事宜，均由日人代裁代定。张海鹏初至新京，以开国元勋自居，洋洋自得；后看到日人已将其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改造得面目全非，始知上当，但也无可奈何。随着伪职骤升，张逆的“保皇”思想更趋浓厚，



他不但在承德大佛寺祈告佛“保佑我皇上重登大宝”，还公开声言“皇上已经登基，我平生夙愿克遂。所遗憾者，乃未能保护皇上回北京故宫登基”。这些言论后为关东军知悉，引起关东军大为不满。最后，关东军趁 1934 年 7 月伪满军队大改编之机，干脆投其所好，将其调离热河省，令其专任伪满皇帝的侍从武官长。这样，张海鹏明升暗降，被剥去了兵权。

1934 年 7 月，伪热河警备军被改编为伪第五军管区，由以前马占山的部下、时任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中将处长的王静修任司令官。他统辖锦州、热河两省警备区，分建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和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其所属组织系统及配置地区以及指挥官为：

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驻承德，司令官王静修中将，参谋长卢静远少将，司令部附索景清少将、主任顾问关原六大佐、顾问千叶一郎大尉。各处处长为：参谋处长王维藩上校、副官处长刘肃华上校、军械处长吴国贵上校、军需处长魏崇岳上校、军医处长赵怀仁上校、兽医处长杭承祖上校、军法处长王冠英上校。直属部队为：第五教导队队长鹏飞少将，第五通信队长枝佐，自动车队谷富少校。

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驻承德，司令官王永清中将，辖 3 个旅，即二十六旅（旅长王永清兼）、步兵第八旅（驻丰宁，旅长冯秉臣）、骑兵第七旅（驻赤峰、旅长刘永清）。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驻锦州，司令官田德胜中将，下辖二十四旅（旅长田德胜兼）、二十五旅（驻朝阳，旅长张俊哲）。

从上述情况看，张海鹏的旧洮辽系军官已不成体系，仅余几个点缀而已。此后经伪满军政部不断调换、改编，张海鹏留在热河省的原部下基本上都脱离了原来的部队。张海鹏本想靠自己积攒多载的“家底”在伪满为傀儡皇帝溥仪效命，结果却逐渐被关东军收回权柄，这其实也是伪满所有巨奸最终落得的下场。

注释：

①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 420 页
②《伪满人物》384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③《富璿善笔供》1954 年 6 月 28 日
④《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6 页
⑤《满州事变》287 页
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29 页
⑦⑧《富璿善笔供》1954 年 6 月 23 日
⑨《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31 页
⑩《国难记》80 页
⑪徐棻《马占山将军抗日战》10 页
⑫《滨江日报》1931 年 11 月 19 日
⑬《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35 页
⑭《满州事变》303 页
⑮⑯《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400 页
⑰《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0 页
⑱《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2 页
⑲《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44 页
⑳㉑《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409 页
㉒《满州事变》267 页

㉓《富璿善笔供》1954 年 5 月 29 日

㉔《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1 页

㉕㉖《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71 页

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23 页

第五章　内蒙古王公贵族投敌与蒙古自治军的编成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获此消息后，他们立即动身前往沈阳，跑到已从旅顺迁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供给武器弹药，帮助组建一支蒙古部队。他们的要求正中关东军下怀，因为此时仅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的关东军正忙于抢占东北地区各战略要地，尚无暇顾及蒙旗方面；帮助建立一支内蒙族人组成的伪军，不仅可进一步拉拢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自身兵力之不足，可谓一举两得。这样，关东军决定拨给甘珠尔扎布两兄弟3 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还纠集了在沈的蒙族青年30多人，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召开会议，商定成立了“蒙古独立军”，由甘珠尔扎布任总司令。



在近代，“满蒙”是一个带有浓厚侵略色彩的政治地理概念，它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的简称。帝国主义之所以不按照这些地区在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相称而独立称谓，可以说是它们对这些地区怀有侵略野心的一种外在反映。在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总是千方百计抓住民族问题大做文章，藉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殖民目的。同样，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问题上，日本也重演故伎，竭力培植满、蒙等民族内部的亲日势力，以图达到把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改由日本控制的卑劣目的。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趁中国辛亥革命失败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的有利时机，大肆勾结满清残余势力和蒙古王公贵族，积极支持“满蒙”实力人物搞独立运动，为以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组织伪满政权奠定了基础。

清室余孽和蒙古王公贵族热衷于在日本的羽翼下合作搞“满蒙独立运动”，这与他们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对昔日特权的迷恋不无关系。在有清一代，满族权贵君临全国，高踞于统治阶级的顶端，可谓权倾天下，威风占尽；而蒙古王公贵族作为满清的同盟者，始终沐浴着大清王朝的浩荡皇恩，堪称福禄百代，荣华富贵。但是，辛亥革命的炮声彻底摧毁了满蒙贵族天朝大国的迷梦，他们从权力的顶峰骤然跌入谷底，一切统治特权都随着皇权的瓦解而荡然无存。清室余孽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妄图东山再起，复燃死灰，重新执掌天下，而蒙古王公贵族也从旁附和，另辟蹊径，企图使内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他们这种置国家和

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而进行的复辟和分裂活动，给日本帝国主义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提供了可乘之机。结果，与狼共舞的满蒙贵族不仅没有实现其自私而狭隘的政治抱负，最后反而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傀儡和工具，成了关东军统治“满蒙”的应声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为将觊觎已久的东北蒙旗地区一并据为已有，它首先拉拢利用的蒙族代理人是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这两位年轻的兄弟如此受信于日本关东军，除了他们长期生活在日本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外，还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父亲巴布扎布是个主张蒙古独立的狂热分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临时拼凑了一支3 000人的蒙古部队，离开家乡彰武县到哈尔哈河畔搞“独立运动”。巴布扎布此举引起了“满铁”和关东军的注意，以后他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川岛浪速的鼓动下，决定“与目标相同的肃亲王宗社党在满州的活动进行合作，与从事满蒙独立活动的日本志士携起手来，共同准备满蒙举事”。1916 年，巴布扎布乘袁世凯称帝引起全国公愤之机，举兵南下，企图与宗社党人一举消灭盘踞在奉天的张作霖，实现“满蒙独立”。但不久，这支蒙匪军即被张作霖军队击溃，巴布扎布本人也在热河林西遭袭而亡，他的“满蒙独立”之梦遂烟消云散。

巴布扎布毙命后，川岛浪速等军国主义者并未因此次“满蒙举事”失败偃旗息鼓，反而从长计议，将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送至日本，施以封建军



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以备将来派上用场。在日本极右势力的熏染下，甘珠尔扎布兄弟逐渐接受了“满蒙独立”的分裂思想，他们决心继承亡父遗志，献身于“蒙古独立”的政治事业。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他们四处积极活动，广泛联系日本各界人士，特别是与军界右翼团体的一些主张侵华分子更是密相往来。1928 年，先后从日本回国的甘珠尔扎布兄弟专程到旅大拜访了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烟英太郎、高级参谋板桓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人，请求关东军提供武器，以着手开展“蒙古独立运动”。自此以后，他们在关东军高级幕僚的秘密支持下，积极联络蒙匪和蒙古王公贵族，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为“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蒙古伪军打下了基础。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获此消息后，他们立即动身前往沈阳，跑到已从旅顺迁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供给武器弹药，帮助组建一支蒙古部队。他们的要求正中关东军下怀，因为此时仅有 1 个师团和 6 个独立守备队的关东军正忙于抢占东北地区各战略要地，尚无暇顾及蒙旗方面；帮助建立一支内蒙族人组成的伪军，不仅可进一步拉拢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自身兵力之不足，可谓一举两得。这样，关东军决定拨给甘珠尔扎布两兄弟3 000支步枪，60 万发子弹，放手让他们组织伪蒙军。同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还纠集了在沈的蒙族青年 30 多人，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召开会议，商定成立了“蒙古独立军”，由甘珠尔扎布任总司

令，萨嘎拉扎布任参谋长，哈丰阿任秘书长，李友桐任宣传处长，韩凤麟任副官处长。此处，关东军还派一名日军退伍中尉和田劲任“蒙古独立军”顾问，意在加强监视和控制，以使这群蒙匪按照关东军的意愿行事。关于进军计划，甘珠尔扎布等人经讨论决定：拉起队伍后由科左后旗经科右中旗占领通辽县，再北经高力板、科右中旗到兴安岭索腰勒吉岭会合部道甫的部队，尔后再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蒙古独立宣言书”，煽动内蒙古人民“起而举事”，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恢复蒙古历史上“固有的疆土”，成立“蒙古独立国”。可以说，这份“宣言书”就是“蒙古独立军”进行分裂活动的行动纲领。

伪蒙军的领导机构虽然初已成型，但由于事发突然，准备仓促，因而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甘珠尔扎布虽从关东军手里得到了武器，但苦于没有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无法将武器安全运至蒙匪活动猖獗的蒙旗地区。最后还是由关东军出面，把武器秘密从沈阳经四平、郑家屯运到科左后旗，才得以将武器分发给事先联络好的科左后旗统领包善一、科左中旗协理韩色旺以及蒙匪天红等人。不料，包善一分得多数武器后却不肯积极活动，后在和田劲的威压和甘珠尔扎布的进一步利诱下，他才勉强答应参加“蒙古独立军”。随后，甘珠尔扎布等人即将“蒙古独立军”扩编为“蒙古自治军”，由包善一任总司令，下设三个军，第一军司令由包善一兼任，第二军司令韩色旺，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甘珠尔扎布。“蒙古

自治军”号称有10 000人，多是临时拼凑的土匪流氓，军风军纪极坏，难以驾驭，因而这支先天不足的伪军刚一成立就露出了短命的征兆。

按照在沈阳制定的计划，“蒙古自治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攻打通辽。当时驻守通辽的是东北军骑兵第三旅，属国防旅编制，装备较好，军队素质更强于这些乌合之众。1931 年 10 月 12 日晨，伪“蒙古自治军”向通辽发动攻击，甘珠尔扎布的第三军担任主攻，正珠尔扎布和包善一的下属管带率军侧翼配合，和田劲也带着十几名日军前来助战，大有鲸吞通辽之势。但这些伪军行匪成性，积习难改，闯入通辽县城后只顾抢掠，结果很快就被通辽守军分割开来予以痛歼，“自治军”伤亡惨重，狼狈逃往大林车站。初战告负，日本顾问和田劲大为恼火，他跑回沈阳向关东军司令部说了一通“蒙古自治军”的坏话，然后就辞职不干，受命组织他的伪靖安军去了。

其实，乌烟瘴气的“蒙古自治军”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而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大杂烩。除了甘珠尔扎布兄弟等少数几个人外，其他大小蒙匪头目只想乘此时机扩充个人势力，对“蒙古独立”之事丝毫不感兴趣，致使这个匪帮趋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正珠尔扎布又跑到沈阳向关东军求援，请求关东军再供给大炮和冬装，重整旗鼓，以备再战。关东军遂派退伍大佐、蒙古通松井清助前往“蒙古自治军”充任顾问，并拨给“自治军”4 门大口径迫击炮和 2 挺捷克轻机枪。实力大增的伪蒙军一时又嚣张起来，甘珠尔扎布还把莫力庙活

佛阿旺图巴丹拉拢过来，尊为“救国大师”，声势甚壮。11月上旬，日军羽山支队攻占了通辽。“蒙古自治军”也在松井顾问的自作主张下蠢蠢出动，北上攻打开鲁，结果在开鲁境内遭东北军崔兴武旅李守信部袭击，死伤甚众，连松井也一命呜呼。所剩残部四散奔逃，“救国大师”仅以身免，窜至通辽销声匿迹。

“蒙古自治军”遭此惨败，引起关东军大为不满。正珠尔扎布向关东军解释说，“自治军”内部同床异梦，互相猜疑，以致军令不一，难以协调，仅凭现有之力尚不足以与热河的东北军对抗，言外之意是请求关东军再给以援助。关东军见控制这支伪军的时机已到，遂陆续向“自治军”派去退役少佐盘井文雄、小泽一六、八本间城等人，组成顾问团对“自治军”加以“指导”，从而逐渐将蒙伪军的领导权收归己有。同时，关东军从“蒙古自治军”内部难于统一这点上认识到，甘珠尔扎布兄弟自身缺乏实力，难孚众望，不可能在短期内在各自为政的蒙旗中立稳脚跟，这对于急于寻找强有力的蒙旗头面人物的关东军来说，是无法容忍和迁就的。甘珠尔扎布兄弟见“独立”活动一事无成，又失信于日本关东军，自知难以为继，心灰意冷之余，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于1932年初潜往大连蛰居，静待时机。

事实上，在“蒙古自治军”成立后不久，关东军就着手展开了拉拢蒙古王公贵族的活动。内蒙东4盟的蒙古王公贵族，虽大多拥有旗兵和私兵，但数量非常有限，装备十分陈旧，互不统属，多备防范匪贼之用，根本无力对抗日



本关东军。大敌当前，驻蒙旗地区的东北军非退即降，失去保护的蒙古王公贵族为维护切身利益，顺理成章地就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1931 年 12 月，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菊竹稻穗受关东军之命，曾主持召开了一次蒙古王公会议，参加者均为蒙旗地区素有声望的人物，计有郭尔罗斯前旗齐默特色木丕勒、图行业图旗业喜海顺亲王、呼伦贝尔盟王爷凌升、苏鄂公旗寿明阿等 30 余人，讨论所谓东部蒙古的命运问题。最后，决定东蒙“加入”伪满州国。这显然是关东军幕后操纵导演的一出丑剧。1932 年 3 月伪满州国成立时，关东军硬称“新国家”的版图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东蒙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这样，一些蒙族败类喧嚣已久的“蒙古独立”非但没有实现，到头来却引狼入室，把蒙古人民送人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日本关东军是在军事杀伐的基础上实现对伪满州国的统治的，因此，它在绞尽脑汁维持其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始终格外注意对伪满军队进行控制和改造。在编组伪军时，它把伪蒙军与其他地区的伪军从地域上严格区分开来，此举表面意在让蒙古王公贵族保有传统的统治区域，其实是藉此行“分而治之”，以图由伪蒙军维持蒙旗地方的社会治安。1932 年 3 月以后，伴随伪满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警备军的建立，关东军在把内蒙东部地区划分为兴安南、北、东、西各分省的基础上，成立了兴安各分省警备军。兴安各分省警备军司令部直辖于伪军政部，司令由蒙旗地区实力人物充任，军事顾问和

参谋长均由日本人充当，实掌伪蒙军之权。各分省警备军的组成情况简单如下：

（一）兴安南警备军 甘珠尔扎布兄弟组织“蒙古自治军”无功而退后，关东军拉出巴特玛拉布坦来收拾“蒙古自治军”的残局。巴特玛拉布坦是扎赉特旗末代扎萨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亲率旗兵趁机赶走了旗内的东北军，为关东军所注目。1932 年 4 月，巴特玛拉布坦接受了关东军委任的兴安南警备军司令之职，带领 100 多名旗兵到钱家店赴任，开始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爪牙走狗的生涯。他就任后立即收编整顿了原“蒙古自治军”，编成了两个骑兵团和一个独立骑兵大队，又招收了一批蒙族青年学生组成少年队，总兵力约1 300余人。所用武器均由关东军供给，军队装备较优。伪兴安南警备军编成后，司令部、少年队和一部分兵力驻钱家店，其余两个团驻通辽，另把骑兵独立大队派往王爷庙，负责科右前旗、科右后旗和扎赉特旗的社会治安。

（二）兴安东警备军 1932 年兴安东分省成立后，关东军令达斡尔族人朝罗巴特尔出任该省警备军司令官，驻博克图。这个警备军是由地方杂牌武装拼凑而成的。这些地方武装多是“九·一八”事变后“乘机图逞”之人纠集散兵游勇和地方土匪组成的保卫团、自卫团等，名为维持治安，实则与寇贼无异，专事于为非作歹、趁火打劫的勾当，为害甚大。关东军的势力及于此地后，这些土匪武装慑于日寇的淫威，赶紧认贼作父，投降了日军。朝罗巴特尔就任后，将其统编为两个团和一个山



炮兵连，计1 300人左右。这支伪军所用武器多来自匪贼之手，装备既杂且劣。它的任务，是在博克图、布西一带担任援助日军镇压自己兄弟民族的任务。

（三）兴安北警备军 伪兴安北省地临苏蒙边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苏炳文、张殿九等人发动的呼伦贝尔抗战失利后，日军即着手组织伪军担任伪国境线的警戒任务。1932 年，兴安北警备军成立，司令部设于海拉尔，由乌尔金任警备司令官。乌尔金是从前苏联叛逃回来的布利亚特蒙古军的营长，后在西尼河旗爬升至旗长之位。降于日军后，他以海拉尔的都统公署卫队为基干，又网罗了一批苏炳文、张殿九的余部，编成了两个骑兵团、一个独立山炮连和一个国境警察大队，兵力计1 800人左右。这支伪军由关东军供给武器，装备较好，分驻于哈尔哈庙、海拉尔、吉拉林等地。

（四）兴安西警备军 伪兴安西警备军成立较晚，为日伪军攻占热河省之后始设。1933 年春，关东军挟裹伪军大举进犯热河，巴特玛拉布坦奉命率两个骑兵团指向开鲁、查不干庙、林东、林西等地。驻守这些地区的东北军第十七旅竟没做抗敌打算，稍一接触即投为伪军。事后，该旅的一个团长李守信逐渐掌握了这支伪军，经整编后就成了伪兴安西警备军的基础。伪兴安西警备军司令部设在林西，关东军始命李守信任司令官，后因李守信并未实任，遂又以乌古廷为司令。所辖部队为骑兵两个团和 1 个山炮连，兵力计1 300人，分驻于林西、林东等地。这支伪军装备比较整齐，但都是私马制，军费亦属于长官包办制，除武器弹

药由关东军补给外，其他一切军需品均须自行解决，因而给当地百姓增加了极大负担。

伪兴安西警备军的编成，标志着日本关东军编组伪蒙军的任务基本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伪满军的轮廓大体粗定。1933 年伪满的“疆域四至”底定后，日本关东军为便于统一指挥伪军，责令伪军政部对伪军进行整编。1934 年，伪军政部实施军管区制，把兴安各分省以外的伪军划为 5 个军管区，尚未成立军管区的兴安各分省警备军也按军管区制的标准统一进行了整编。统一编制后，兴安各分省警备军各属有骑兵两个团或三个团，外加一个山炮兵连，每团骑兵 800 名。计兴安东警备军辖兴安骑兵第一团、第二团和一个山炮兵连；兴安西警备军辖兴安骑兵第三团、第四团和一个山炮兵连；兴安南警备军辖兴安骑兵第五团、第六团和一个山炮兵连；兴安北警备军辖兴安骑兵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和一个山炮兵连；总兵力计1 000人左右。

1937 年 3 月，伪军政部总合兴安各省区域设立了兴安军管区，至此，伪蒙军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兴安军管区之下仍区分为 4 个警备军，其编制概要为：兴安军管区总司令部设于郑家屯，司令官由巴特玛拉布坦担任，参谋长由荻野上校代理。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设在通辽，由巴特玛拉布坦兼任司令，所属部队有兴安骑兵第五团、第十团及山炮兵一个连，驻防通辽、开鲁、钱家店一带。兴安西警备军司令部设于林西，司令郭宝山，所辖部队为兴安骑兵第四团、第六团及山炮一连，驻守林西、查不干庙一

带。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乌尔金，所属部队有兴安骑兵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及山炮一连，驻于哈尔哈庙、海拉尔、黑山头一带。兴安东警备军司令部在博克图，司令绰罗巴图尔，所辖部队为兴安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及山炮一连，驻防在博克图等地。此外，在王爷庙的兴安军官学校尚有一个兴安骑兵教导团，归巴特玛拉布坦节制。

在成立兴安军管区的同时，关东军即着手筹备成立兴安师。编组兴安师是关东军对苏备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将伪军的一部分装备成精锐部队，为日军侵苏时充当炮灰。1939 年 3 月，伪兴安师编成，师长由野村登龟江少将担任，驻钱家店，其隶下兵力为：骑兵第二团、第四团、第五团及新编成的骑兵第十二团。以上各团均属甲种编制，每团有骑兵 4 个连、重机枪 1 个连，兵员各 750 人。此外，还有炮兵团、迫击炮团，编制均为 4 个连，每团有炮 16 门，兵员各 600 人。另有汽车队、通信队等，汽车队有汽车 32 辆，兵员 120 人；通信队有无线电台 2 部，有线班 6 个，兵员 200 人。就装备而言，兴安师堪称伪军之冠。至此，伪蒙军可谓进入了鼎盛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1939 年 5 月，诺门罕战争爆发。在这场历时 4 个多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中，伪蒙军大部分都被调往前线，作为两翼配合关东军同苏蒙军作战。结果，日伪军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参加战事的伪兴安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第四团、第五团、第七团、第八团、第十二

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以及临时编成的炮兵团和迫击炮团均遭重创，伪蒙军自此一蹶不振。此后，伪蒙军虽稍有恢复，但实力已大不如前，它的任务只是在关东军的摆布下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直到前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时，它的罪恶活动才告结束。

第六章　东北江防舰队投敌



以1939年发生的诺门罕战事为开端，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军的战斗力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场试探前苏联远东军力的战争中，号称精锐的关东军惨遭重创，而为关东军打头阵的伪满军更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这次惨败促使关东军再次对伪满军施以“军政整顿”。在这次大改编中，伪江防舰队取消了海军建制，改归陆军管辖，名为“陆军江上军”。1943年，日军责成江上军编成海上警防队，驻守大连，主要对付美、苏潜艇对日本商船的袭击。1945年8月20日，前苏联海军抵达哈尔滨，收编了伪江上军的各类舰艇。至此，伪满州国这支唯一的水面部队最终解体。

东北军海军正式组建于1925年冬，由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两部分组成，沈鸿烈受张作霖之命任东北海军总指挥。当时，海防舰队以营口为基地，拥有“镇海”、“威海”、

"定海"、"飞鹏"4舰，原"镇海"舰长凌霄任海防舰队长；江防舰队以哈尔滨为基地，拥有"利川"、"江亨"、"利捷"、"利绥"、"利济"、"江平"、"江安"、"江通"8艘小型炮舰，原"利绥"舰长尹作乾任江防舰队长。此后，东北海军在沈鸿烈的具体主持下，发展较快。1928年5月，沈鸿烈趁日军制造"济南惨案"的有利时机，将山东督军张宗昌控制的渤海舰队纳入东北海军的体系中，东北海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以张学良兼任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海防舰队和一个江防舰队。其时东北海军的具体情况如下：

队别	队长	舰艇名	种类	排水量	速力	驻地
海防第一舰队	凌霄	海圻	巡洋舰	4 300	24	青岛
		海琛	巡洋舰	2 950	19.5	
		肇和	巡洋舰	2 600	20	
		同安	驱逐舰	395	30	
		镇海	练习舰	2 703	12	
海防第二舰队	袁方乔	永翔	炮舰	780	13.5	烟台、长山岛
		楚豫	炮舰	780	13	
		江利	炮舰	550	13	
		定海	运输舰	1 100	10	
		海鹤	炮艇	162	9	
		海鸥	炮艇	170	9	
		海青	炮艇	170	9	

队别	队长	舰艇名	种类	排水量	速力	驻地
东北江防舰队	尹作乾	江亨	炮舰	550	13	哈尔滨
		利捷	炮舰	166	14	
		利绥	炮舰	170	13	
		利济	炮舰	170	15	
		安平	浅水炮舰	250	14	
		江安	浅水炮舰	250	14	
		江清	浅水炮舰	250	14	
		江泰	浅水炮舰	250	14	
		江通	浅水炮舰	250	14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孤意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留驻东北的东北军处于坐以待毙的被动地位。沈阳被日军占领后，驻沈的各军事机构很快解体，人员逃散一空。东北海军司令部也形同虚设，徒具空壳，其所隶下的舰队，海防舰队因驻在青岛、烟台和长山岛，免遭日军的攻击，而江防舰队因地理位置和自身性质的限制，只好滞留在哈埠，静待时局的发展。

日本关东军于 1931 年 9 月下旬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战略据点后，继续北犯，将侵略的战火扩大至黑龙江省。11 月 19 日，关东军攻陷齐齐哈尔。辽、吉、黑三省省会尽落敌手，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它不仅使东北地区原有的军政体系趋于瓦解，而且也使一些动摇观望投机分子更肆无忌惮，逐步走向降日求荣的道路。这期间张学良为应急虽相继指示在锦州和宾县成立了

临时的辽宁省政府和吉林省政府，但终因颓势难挽而无补大局。关东军于1932年1月3日攻陷锦州后，旋即调集重兵北图哈尔滨。在这种情况下，驻留哈埠的东北江防舰队何去何从便成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实，此时的江防舰队代理队长尹作乾投敌的打算早已确定。1931年年末，尹作乾见东北大势已去，舰队饷源无着，更主要的是他个人贪图名利、苟且偷生的心理作祟，开始暗中与日军勾结，委托一日本商人与日本海军联络，转达其投降日军的意图。1932年2月初，日军攻占哈尔滨后，该商人引导日本海军少佐佐佐木来哈接洽，尹作乾甘愿认贼作父，率全舰队投降了日军。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同年4月，伪满军政部公布了“陆海军条例”，规定伪满陆海军均受关东军“指导”，这实质上规定了伪满军作为殖民地军队的附庸地位。翌年5月，“满州国海军江防舰队”正式成立，归海军建制，受日本临时驻满海军部管辖，直隶于伪军政部总长。舰队司令部仍设在哈尔滨，以尹作乾为司令，范熙申为参谋长，日本人伊藤海军大佐任顾问。舰队仍袭旧制，并无变更，共有舰艇6艘，补充队1个，舰艇总吨位2 200吨，兵员500人。

关东军收编东北江防舰队后，立即将其纳入“维持地方治安”的体系中，驱使舰队协助日军讨伐松花江附近的反满抗日力量。为此，它重新规定了舰队的警备事务，把松花江划分为5个防区：哈尔滨至肇州为第一防区，因无重要情况，暂不配备舰艇；哈尔滨到通河为第二防区，利济

舰担负此区防务；通河到依兰为第三防区，江清舰归其调处；依兰到佳木斯为第四防区，利绥舰受其节制；佳木斯到同江为第五防区，江通、江平舰在此巡弋。同时，关东军为了把这支水上部队变成供其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还对江防舰队进行了“改造”。所谓改造，其实主要是进行精神上的奴役教育，向伪满海军官兵输灌日满亲善、一心一德，共同防卫的思想，并处心积虑培养官兵畏惧日本的心理，以使其不致因日军的颐指气使而心存异念。此外，军事训练也有极强的针对性，各种训练都以协助陆上日伪军讨伐抗日军民为目标，因而，封冻期除补充装备外，着重进行与“讨伐”相关的技战术教育，强化训练官兵对舰上各种武器的熟练运用，以备讨伐之时派上用场。

但是，由于松花江沿岸地区地形复杂，丛林密布，加之江防舰队力量弱小，机动能力差，因而这支水上部队助纣为虐与抗日义勇军作战时，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只是在广阔的松花江水面上虚张声势。1932 年 2 月李杜等人在保卫哈尔滨失利后，率部撤往下江地区进行休整。但日军广濑寿助师团和松木直亮师团立即于 4 月尾随而至，向吉林自卫军的根据地依兰进逼。伪江防舰队奉关东军之命抽调利绥、利济、江平、江清、江通 5 舰组成水上运输队，由日本人松井指挥，为陆上日伪军提供后勤供应。5 月中旬，日军决定从水陆两路向依兰发起总攻，伪江防舰队受命担任水路进攻任务，先后参加了攻克通河、德莫立、二道河子的外围战斗。在日伪军的强大攻势压迫下，自卫军被迫继续向东转移。此后自卫军逐渐汇合了宫长海、王德林等

部义勇军，仍然活跃于吉林省东部国境附近的三江地区，声势极盛。1932年9月，日伪政权先后动用6个师团10余个旅团近4万日军和万余伪军，大举压向三江地区，企图彻底消灭三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在这次大“讨伐”中，伪江防舰队除为日伪军承担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外，还担负松花江、乌苏里江江面上的警戒任务，阻止义勇军渡江转移。

伪满江防舰队除协助日伪军“讨伐”抗日军民外，还从事“开拓国境河川航路”的活动。日伪当局此举一是为了向前苏联显示伪满州国在“界河”上的军事存在，二是为了勘察河流的航运状况，以便日本侵略者通过水路掠夺中国东北的富源。1933年8月，伪江防舰队编成三支部队，由龙江进抵乌苏里江，直至虎林，9月间又以新增的大同、利民两舰进抵黑龙江，到达阿尔公河口附近。此前，伪满军政部曾于同年5月派恩民、惠民两炮舰由乌苏里江经松阿察河驶抵兴凯湖，直达其西端的当壁镇，尔后两舰又勘察了穆棱河，驶至密川。这样，使以前认为不能航行的松阿察河及穆棱河等，开始了商船的通航。另外，利民、济民两舰于7、8月间经漠河奇乾吉拉等处抵六卡，济民舰又单独驶入海拉尔河，至8月中旬回到富锦。在伪满建国仅仅3年的时间里，伪江防舰队以几艘破旧不堪的舰艇，航遍了中苏边境附近的各主要河流，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名副其实的水上探路队。

关东军驱使伪江防舰队拓展界河航路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为了从经济上加强对伪满的掠夺，它更重要的考虑还

在军事方面。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其势力也随之延伸至中苏边境，隔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与前苏联远东红军相对峙。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社会主义前苏联视为潜在的头号敌人，其情报机构对苏谋略活动从未停止过。“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引起了前苏联的警觉，前苏联虽然为了自身的利益默认了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但同时它为了防范日本而又大大加强了远东的军事力量，这更使居心叵测的日本关东军坐卧不安。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任务，一是控制伪满州国，保住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大陆政策”的前进基地；二是以前苏联为假想敌扩充军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与苏军开战。不过，当时日军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过分刺激前苏联，只好玩弄掩人耳目的伎俩，打着伪满州国的旗号，派伪江防舰队以探测航路和巡视之名，收集日军所需要的重要情报。

鉴于伪江防舰队的舰艇过于陈旧，兵员不但数量少，素质也较低，不足以完成日军交给的各项任务，从 1933 年起，伪满政权在关东军的指使下开始大规模添造新舰，招募新兵。1934 年 3 月，伪满军政部决定建造“顺天”、“养民”两舰，由日本播磨制造所承造。半年后，新舰在哈尔滨装成下水。与旧有的“利绥”等舰相比，除了排水量都是 300 吨外，“顺天”、“养民”两舰在动力装置、武器配备以及人员编制等方面都胜于前者。利绥等舰以蒸汽机为动力，舰上仅装有 7.5 厘米口径的炮 1 门，捷克式机枪 2 挺，步枪 15 支，手枪 5 支，人员编制 46 人。而“顺天”、“养民”两舰上装有 12 厘米口径的高角炮 2 门，15 厘米口径的

迫击炮 1 门，1.5 英寸口径的双管高射机枪 3 挺，四一式机枪 1 挺，步枪 20 支，手枪 10 支，人员编制计 82 人。并且，“顺天”、“养民”两舰使用内燃机做动力，速度较快，灵活性强，便于机动。此后，伪江防舰队于 1935 年又新增了由日本建造的“定边”、“亲仁”两舰，其吨位、性能、装备及编制基本上同于“顺天”、“养民”。

在建造较大型舰只外，日本还为伪江防舰队建造了一些小型炮艇。从 1933 年开始，“大同”、“利民”、“熙春”、“阳春”、“兴亚”、“兴仁”等 60 吨的炮艇相继下水服役。另外，4 艘 40 吨的炮艇、2 艘 30 吨的炮艇和 10 艘 15 吨的炮艇也相继投入使用。到 1937 年，伪江防舰队旧有的舰艇除“利绥”外，均被淘汰，全部代之以日本建造的新型舰艇。

伪江防舰队补充新兵，与更新舰艇几乎同时进行。新兵从招募、入伍到教育训练，均由舰队补充队具体负责。1933 年 5 月，伪满军政部令江防舰队招募第一批海军新兵，伪舰队司令部派补充队副队长赵竞昌等人赴长春联络，会同军政部舰政课、军事课有关人员到沈阳，借用伪中央训练处，用招考办法录取了 70 名家庭较富裕的高小、初中学生，带回哈尔滨经过集训后分派到各舰上服役。以后，伪江防舰队每年都从伪满各地选募新兵，逐渐更换了原东北江防舰队中的海军兵员，以图通过这种办法把这些不谙世事的青年驯服成忠于日伪政权的得力军人。被招募来的新兵，先在舰队补充队施以一年的教育，然后择其成绩优良者送往日本留学，接受日本海军的教育。至于海军军官的选拔，每年都在日本东京和伪满新京招募有中学卒业学力



者若干人，经考核合格后，先人东瀛高等商船学校就学，毕业后再入日本海军诸学校接受教育，学习期满后均以海军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到伪满海军工作。

当然，能被选送到日本接受教育训练的海军士兵毕竟只占少数，绝大多数都在伪江防舰队内由补充队的日本海军军官直接施以教育和训练。补充队的编制，据曾任过补充队队长的赵竞昌供称，计有队长 1 人，副队长 1 人（日系），轮机少校、上尉、中尉各 1 人，甲板少尉 1 人、准尉 4 人，军医准尉 1 人，日系教员 5 人，军士训练班 20 人，新兵 40 人，旧兵 25 人，共 100 人左右。一般而言，在对海军士兵进行训练和教育时，补充队根据伪司令部制定的方针和计划，把士兵分为新兵、旧兵和军士三种类别，分别进行不同的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术科教育和学科教育两种，前者着重增大士兵掌握基本的海军军事技能，后者则侧重让士兵熟知有关的军械知识及军人行为规范。但从伪江防舰队作为殖民地军队的性质上看，海军士兵所受教育中最具特色的乃是“精神教育”。精神教育是一种思想教育，主要由日本人担任教官，其讲解的内容多是伪满皇帝的“训民诏书”、“敕谕”、“军人誓文”及“日满议定书”，以宣扬“日满亲善提携”、“共同防卫”为主旨，企图从思想上改变官兵的国家和民族观念、直至把伪江防舰队“改造”成没有独立性格的仆从军。

但是，以 1939 年发生的诺门罕战事为开端，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军的战斗力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场试探前苏联远东军力的战争中，号称精锐的关东军惨遭重创，而为关

东军打头阵的伪满军更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这次惨败促使关东军再次对伪满军施以“军政整顿”，整顿的内容主要是缩小各军管区部队的编制，把相当数量的伪军编成所谓特种部队，专职作日军的勤务部队。在这次大改编中，随着日本临时驻满海军部的撤销，伪江防舰队取消了海军建制，改归陆军管辖，名为“陆军江上军”。在此之前，伪江防舰队只受日本临时驻满海军部控制，关东军无权过问，也不受日本宪兵队和伪满军宪兵队的监督。此次改编后，江上军与各伪军管区是同级，直接隶属于伪治安部。同时，在人事变动上，日本海军顾问、教官也一并撤销，改派陆军中佐内田实任军事顾问。尹作乾退役后，伪陆军中将李文龙于 1941 年 2 月被任为江上军司令官。

改编后，伪江上军司令部仍设在哈尔滨，其编制大体如旧。司令部有 8 个处，即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电讯处和训练处。其中，参谋处是司令部的实际首脑部门，由日本人任参谋长，主管用兵作战和教育训练。参谋处下设“人事室”和“健军室”。人事室掌管全军的人员编制、军衔晋升，人员调动、工薪级别和考勤等事项。健军室是特务情报机构，它对内调查官兵的思想动向，对外与关东宪兵队、伪满宪兵队合作，协同搜集情报。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是训练处。因伪满的军官学校不设海军科，训练处就成了江上军补充新兵的培训基地。训练处下设有教导团，共 6 个连，一至四连为甲板科，五连是轮机科，六连是通讯科，每连都有日本人任连长或副连长。

江上军直辖的部队主要有3个团和2个地区队。江上军所属3个团是陆战队，其前身是1937年编成的海军水上作业队。1940年伪满实行征兵后，3个团的编制有所扩大，达到2 600人左右。第一、第三团驻哈尔滨，主要从事浮舟作业的操练；第二团驻富锦，训练操舟及架桥作业。

江上军除直辖“定边”、“亲仁”两舰外，还下设两个地区队。第一地区队驻富锦，队长赵竞昌，主要警备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沿岸。下属舰只共14艘，即“顺天”、“养民”、“熙春”、“阳春”、“兴亚”、“兴仁”6艘炮舰和15—40吨的炮艇8艘。每只60吨以上的炮舰装备有7.5生野、山炮各1门，轻、重机枪各2挺，步枪数10支，并备有观测器材和无线电台等，人员编制计52人。15—40吨的炮艇中，除了40吨的炮艇上装有山炮1门外，其他的炮艇上均无炮，仅装有轻、重机枪、步枪及电台而已。第二地区队驻虎头，队长刘崇褒，主要警备乌苏里江沿岸。隶属有“大同”、“利民”炮舰2艘，炮艇8艘，其每只舰艇的兵力、装备基本上同于第一地区队。这两个地区队的兵员共800人左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州国傀儡皇帝溥仪秉承日本法西斯的意旨，以诏书形式训令臣民，要求举国一致支持大日本帝国进行“圣战”。但到1942年6月，日本海军即在中途岛惨败，此后，它再也无力抵挡美国海军的强大攻势，节节败退，日本的海上运输处于美国海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为保障伪满州国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运输，1943年，日军责成江上军编成海上警防队，驻守大连，主

要对付美、苏潜艇对日本商船的袭击。同时，为防御美国“B29”轰炸机轰炸鞍山，关东军又下令江上军组成驻鞍山高角炮队，由日本人达滕中校任指挥，负责对空射击，保护鞍山钢厂。经此抽调，实力本来就不强的江上军被进一步削弱。

战局发展到1944年，日军败相愈益明显，美军步步向日本本土进逼。当时，日本的大部分兵力都陷于中国战场，难以脱身，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日本军部被迫抽调关东军精锐师团赴太平洋战场作战。结果，关东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为了防止伪满州国内发生不测事件，关东军再次改编了伪满军队，在收缴伪军大部分重武器的同时，加强了对伪军的控制。伪江上军在这次改编中的变化，主要是废除了地区队制度，成立了江上军艇队，组建陆上作业团等。此次改编形成了伪江上军的最后编制。

江上军艇队设有司令部，司令赵竞昌，下辖5个战队，8个艇队，计有60吨的炮舰6艘，40吨的炮艇4艘，30吨的炮艇2艘，15吨的炮艇10艘，共22艘。其余5艘300吨的军舰，有4只归江上军司令部直辖，1只归训练处练习使用。5个战队中，每个战队由两艘舰船组成，具体情况是：第一战队由“定边”、“亲仁”两舰组成，第二战队由“顺天”、“养民”两舰组成，第三战队由“大同”、“利民”两舰组成，第四战队由“阳春”、“熙春”两舰组成，第五战队由“兴亚”、“兴仁”两舰组成。8个艇队中，每个艇队也由2艘炮艇组成。这些舰艇多安插日本海、陆军退役军人，由他们担任舰长或舰长以上的主要职务，其用意不言

而喻，是为了在“战局动荡”的形势下稳住伪江上军的阵角。

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急转直下，日本法西斯已穷途末路，无力回天。1945 年 5 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前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的有关规定，开始向远东集结兵力，准备向日本开战。8 月 9 日，前苏联 150 万大军分三路突入中国东北，关东军的防线顷刻崩溃。11 月，伪江上军司令部奉命令“熙春”、“阳春”两舰出动，抵御苏军的进攻，结果在佳木斯被苏军击沉。14 日，伪江上军第一、第三团和训练处的教导团约2 000人，在一团团长张洪山的率领下发动起义，伪江上军名存实亡。20 日，前苏联海军抵达哈尔滨，收编了伪江上军的各类舰艇。至此，伪满州国的这支唯一的水面部队最终解体。